

中共党史资料

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

23

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中共党史资料

第二十三辑

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

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1987年·北京



中共党史资料

第二十三辑

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

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7.375印张 195千字

1987年9月第1版 1987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46000 册

ISBN 7-80023-015-5 / K · 68

书号11310·48 定价1.65元

国内发行

目 录

文 献

争取持久抗战胜利的几个先决问题……………彭德怀(1)

回 忆 录

我在红三军团的经历(下)……………黄克诚(19)

从大革命失败到六届四中全会期间几件往事的回忆

……………徐彬如(67)

“四·一五”反革命大搜捕的前后……………(67)

参加顺直省委扩大会议……………(76)

在天津从事职工运动……………(86)

一次深刻的历史教训……………(96)

人 物 介 绍

抗日战争时期的叶剑英……………李鹿辉(110)

一、参与国共谈判……………(110)

二、开展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118)

三、在延安参加中央军委工作……………(152)

专 访

何长工谈罗坊会议前后的几个问题……………(173)

专题资料

红一方面军的罗坊会议

.....中共新余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188)

江西省委在湘赣边界秋收起义中的历史功绩

.....陈立明(210)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辖区前后变化的情况

.....李春祥(215)

延安中国女子大学述略曾瑞炎(222)

争取持久抗战胜利的 几个先决问题

(1937年11月27日)

彭 德 怀

一、引 言

神圣的抗日民族革命战争，已经进行三个月了。谁都应该认识，抗日的民族革命战争是一个神圣的伟大的事业。在我们的面前摆着强大的日本帝国主义，我们固然不应过分估计敌人的力量，而致丧失自己胜利的信心；但亦不应轻视敌人的力量，而放松自己的动员与必需的准备。我们需要最高的抗战热情与胜利的信心，我们尤需要有冷静而客观的态度，讲求争取抗战胜利的办法。不幸得很，直到今天，在怎样争取抗战胜利的问题上，还没有举国一致的见解。

三个月的抗战过程，给了我们不少的痛苦的教训。前线暂时局部的失利，固然不足以判断整个抗战的胜败，但是假如我们不以最高的警觉来找出造成这一形势的原因，

检讨出今后努力的方针，那也很容易使抗战走入更困难的状态，使国人走到徬徨悲观莫知所措的地步。找寻争取抗战胜利的方法，比任何时候都要更加迫切了。

前线的暂时局部的失利，并不是由于我前线将士们不勇敢。事实上我将士们的英勇斗争，已为世界人士所称道，即使我们的敌人亦不能不表示惊讶。不少的中华民族的优秀分子，作了壮烈牺牲。失利的真实的原因都在于我们在动员工作上与军事作战的方针和指挥上，暴露了不可忽视的弱点。因此，我愿意提出一些问题来作一番讨论，希望能够引起举国人士和军政当局的考虑。我坚信，动员全国人民参加抗日战争与建立正确的军事作战方针和指挥，是争取抗战胜利必须首先解决的前提。

二、持久抗战的胜利

中国今天的海、陆、空军的力量与物质力量，都赶不上敌人力量的强盛。而且敌人利用了过去不平等条约及军事的侵略，已在我国境内建立了许多堡垒。加之国内交通不发达，兵力调度自然缓慢，且因过去长期内战的结果，以致国防不修，海岸线长，而海军的力量又极微弱。在这样的条件下，要想拒止敌人于国门以外，固不可能，就是要一下把日本强盗赶出中国，也是一个极艰苦的斗争。因此，从持久战中去取得抗战的最后胜利，已成为唯一正确的公论了。

我们在抗战的开始阶段所暴露出来的弱点，并没有丝

毫足以惊讶的地方。只有那些“弱国牺牲论”者、恐日病者，才会拿这种意料中的现象，去证实他们的卑污怯懦的理论；只有那些急性病者，才会在前线局部的挫折下，表现着颓丧的心理。一个具有冷静头脑的国人，一个老成谋国的当局者，是不会为暂时的、局部的现象所迷惑的。

必须清楚认识，敌我力量的对比，决不是一成不变的东西，在持久抗战的过程中，是必然会变化的，我们的力量会逐渐变强，而敌人的力量则会逐渐变弱的。

历史上曾有不少弱国战胜强国的事实。而在战争开始时，一定是弱国的力量远不及强国，但在战争的过程中，弱的国家不断地发挥与生长了自己的力量，终于在持久战中战胜了强大的侵略者。

伟大的中华民族，有着数千年的灿烂光辉的历史，有着最高的文化，有着不愿当亡国奴的四万万五千万同胞，有着无量的蕴藏着的资源，有着充分的条件，必能在持久抗战中，迅速改变自己劣势地位而变为优势地位，最后战胜日本帝国主义。

在持久抗战中，我们能够在宽大的民主政治与改善人民生活的条件下，高度地发挥整个民族的力量。向来被人讥为一盘散沙的中国民众，将会很快地凝固起来，形成钢铁一般的力量。国内的摩擦亦必随之而减弱，全国人民将会各尽所能，坚决拥护领导抗战的政府，争取民族的解放。被压迫、被侵略的国家和民族，往往是在自卫的解放斗争中，生长与团结自己的力量。反之，在日寇方面来说，就会得出恰恰相反的结论。战争愈持久，消耗愈大，侵略者在

战争中得不到被侵略领土的利益，而本国的工商业亦必因战争影响而萧条，人民负担加重，生活日益恶化。同时，由于中国持久的、顽强的抗战，敌军的大量的伤亡，下级军官和士兵的战斗意志日趋疲困与削弱，人民反战情绪增高，广大劳动群众、士兵与中产阶层的不满，必将形成伟大的力量，反对战争，反对军阀、财阀们的统治。他们的斗争，将配合着中国的自卫斗争，从根本上葬送日本侵略者在持久战中。因此，日本侵略者不但不能团结与生长自己的力量，而且只能逐渐地削弱自己，加深本国的矛盾，这不啻是自己在哪里挖掘自己的坟墓。

在经济力量的对比上，同样可以看到持久战中的变化。不错，中国是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是一个多数帝国主义掠夺下的半殖民地，舶来品的大量倾销，遍于全国的走私，使微弱的民族工业日益破产，使今天在抗战中遭遇不少的困难。但是，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另一个发展中的现象。由于战争的状态，海岸的被封锁，洋货进口的减少，也给了民族经济以相当发展的机会。我国是一个原料丰富的国家，假如在抗战中，政府能够及时地施行正确的战时的经济政策，整理与扩大国防生产，发展农村经济，保证战时农产品的自给，禁绝日货，取缔奸商及投机操纵，提倡国货，改良土产，使土产的小企业能在政府的帮助与奖励之下，得到相当的发展，国民经济自能自给而有余，国家收入亦定能增加。倘能并以有钱出钱及没收汉奸买国贼财产作为抗日经费为原则，确立国家发展经济政策，那么支持长期抗战的财政经济问题，是可以得到顺利解决的。反之，

日寇则不然。我们的敌人是一个先天不足的国家。国内的天然资源极其缺乏，农产品不够自给，重工业亦不十分发达。加之因战争的重要，便集中一切企业，生产军需品与杀人利器，对外贸易的入超额必将愈益增多。战争愈持久，敌人愈困难。而我反能在持久战中，发展民族的经济，建立国家的经济基础，以至于完全摆脱帝国主义的羁绊。

在军事上，我们同样可以看到这样的变化。尽管我们今天的军队，在装备上赶不上敌人，战术素养上弱于敌人，但我们能从不断的教训中提高军队的质量，加强战术的素养。不管我们今天的武器如何的低劣于敌人，但我们能从改良军事企业上，以及取得爱好和平的国家的帮助上，改变武器的质量，甚至可以从战斗的胜利中，缴获敌人的武器装备来武装我们自己。这并不是一句空话，不少的例子证明这是完全可能的。我们的力量不断地增强，就是敌人力量的不断地减弱。

在国际关系上，也不会例外。敌人在侵略中国问题的本身上，已经引起了不少国家的反对而形成外交上的孤立地位。假如日寇遇着中国的顽强抵抗，不能迅速吞并中国，而被迫进行着长期的战争，其国际地位之每况愈下，自是意料中的事。相反，我国在抗战开始时，即已取得国际上爱好和平国家的同情与帮助。这证明我们抗战愈坚决，愈有力量，同情的国家就愈多，就愈能提高我国的国际地位。

从任何一方面看，我们只有而且能够从持久战中，改变强弱的现势，最终战胜日本帝国主义。让那些“弱国牺

牲论”者、恐日病者，去散布民族失败主义的空气吧！让那些急性病者去悲观失望吧！我们每一个不愿当亡国奴的中国人，是要坚决地从持久抗战中去取得胜利的！

三、战略与战术

（一）战略的防御与战术的进攻

因为中国并无侵略他国的能力和野心，而完全处于被日寇侵略的地位，我们是为自卫而抗战，所以在战略上是防御的。

但战术上若采取专守防御，是决不能够解决战斗的。因为我国兵器远不如人，国防设备又极微弱，如果采取单纯的防御必然遭致失败的恶果，所以我们在战术上，应尽可能是进攻的，必须时亦采取积极的防御（即攻势防御）。

积极防御的要诀，在于乘敌在运动中或立足未稳时，集中优势兵力，以坚决、勇猛、迅速的手段歼灭敌人，减少敌人空、炮及其它机械化兵种配合的效能。只有在运动战中解决了敌人，打击了敌人，才是达到防御目的的最好手段。防御也是为着节约兵力，用在运动战中消灭敌人的手段。

在游击战争广泛开展的条件下，可以调动敌人，分散敌人，封锁敌人消息，使我正规军得以采取大步前进、大步后退的战术原则，求得运动战的机会。至若单纯的防御，不了解寻求出击的机会，不了解操纵敌人、调动敌人的巧

妙办法，只晓得摆在一个阵地上拼消耗，这无异于帮助了敌人发挥现代技术的威力。须知一个孤立无援的阵地是没有打不破的。

有一位军事家说，中国只要同敌人拼消耗，我死十个，敌死一个，最后我们也可取得胜利。我很佩服他的坚决意志，但从战术的观点上说，我们却完全不能同意这样的主张。战术的要求是要以小的牺牲换大的胜利，因此，我们必须讲求战术和指挥艺术。我们决不是怕牺牲，而是应随时准备牺牲去争取抗战的胜利，但这决不是要把自己消耗于敌人的面前，而是应该怎样去消耗敌人。

（二）战略上以少胜多，战役上以多胜少

中国陆军在数量上比任何国家要多，比日本更要多好几倍。但在质的方面却远不如人，特别在技术方面相差很远，所以在战略方面我们还是以弱抗强。然而在战役或战术方面我们必须求得以强攻弱，即使在战役上自己的力量小于敌人，也要求得从战术上来解决以多胜少的问题。

怎样才能求得以强攻弱的战术原则呢？这个问题很简单。假设敌我都是 400 人作战，这是相等的兵力，我们应该采取进攻的战术，以小部（百人）向敌人积极进攻，吸引敌人主力应战，我以少数兵力钳制敌人的主力，以自己的主力采取迅速、坚决、勇猛的手段从敌侧后突击，首先消灭敌一部。假设首先消灭了敌之 100 人，敌已由均势而变为劣势，则我集中 400 人再以同样手段，最后解决敌人。如此，虽是相等兵力作战，我仍维持战术上的优势。

敌人的长处，主要是技术的优良，我亦避其长而攻其

短，如深入到敌人后方或远后方，在不意的方向突然施以猛袭，一开始就求得白刃战，是避开敌人技术优势的最好办法。

（三）持久的消耗战

中国抗战的胜利，是在持久的消耗战中来解决的。至于为什么要持久？只有持久才能生长力量，才能最后战胜日寇，已于前面谈了大概，现在要说的是持久消耗的问题。

消耗战的主要目的，在于消耗敌人的物力、人力，引起战局的变化，改变敌我的形势。为欲达到长期地消耗敌人的力量，唯一的就发动群众进行游击战争，在敌人后方建立小块小块的根据地，分散敌人力量。此外，就是战役、战术的灵活运用，以己之长，攻敌之短，以战术上的胜利达求战役上的胜利，而决不同敌人拼消耗。

（四）争取主动

主动与被动的问題，战略家与战术家都懂得很清楚，但一到实际运用起来，往往一筹莫展。谁都知道陷于被动，虽握优势之兵力，终不能克劣势之敌人。如能经常保持主动，虽劣势之兵力，亦能战胜强敌。这样的例子，在古今中外的历史中不胜枚举。

我们怎样争取抗日战争的主动呢？前面已经说过，发动群众进行游击战争，在敌人后方建立小块小块的根据地，来分散敌人力量，削弱和疲惫敌人，这是战略上争取主动，造成战役上各个击破敌人，取得胜利的必要条件。同时，指导作战方针上，使用兵力时，主力应用在主要战区

与利于反攻的方向。在战役、战术上，主力应用于主要突击方向，而不应以多数或半数兵力用于防御与钳制方向。在防御时，主力应控制预备队，待机出击。在进攻时，主力应用在主要突击方向，不必多留预备队，以求一举歼灭敌人。以大步前进的战术原则，深入敌人后方，攻敌要害，调动敌人，在敌后方左冲右突，破坏敌人作战计划，争取主动。

但是不幸得很，在华北抗战已往的三个月中，我们完全处于被动地位。敌人向我正面展开进攻时，我军亦机械呆板地逐渐延伸抵抗，竟消耗于飞机、大炮的火力下。今后，应乘敌运动中，给以突然的袭击。总之，在技术弱于敌的军队方面，奇袭、伏击、夜袭胜过正规对战；包围、迂回胜过中央突破；在敌人后方侧翼积极活动胜过正面抵抗。

（五）节约防御的兵力

我国原无坚固要塞，多半是野战筑城。我们的防御，一般在于保卫战略、战役上的重点和经济、政治中心及交通枢纽。在防御配置上，应该是纵深的、据点式的、不整齐的、极隐蔽的和独立自主的。机关枪与火炮应取分散隐蔽、火力集中的原则。工事本身，应避线式的。因为线式的工事，目标大，火力不易交叉，防御不易巩固。工事构筑，应采取圆周形或马蹄形，以班、排为单位，火力能互相交叉、互相支援。各个工事本身要能独立作战，纵深要大，正面要小。这样配置，既可节约兵力，减少牺牲，又不易被敌人突破。且因我正面窄小，易引起敌人向我侧翼包围，容易暴露敌人侧翼。又因我工事是圆周形，敌即使

包抄到侧背，亦能与正面一样发挥防御作用，我守兵并不必因之而恐慌。

我应控制强大突击队（预备队）于自己纵深侧翼之适当地点，待敌向我包围，有暴露侧翼时，即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给以猛烈的突击。工事纵深内控制的预备队，采取适时的配合，施行反突击。这样常常可以收到很大的效果。也只有这样的防御，才能完成防御本身的任务。

（六）统一指挥与机动

统一指挥是战胜日寇的重要条件之一。整个的战略方针和战役计划，须在统帅及战区高级指挥官总的意图下进行。但统一指挥，并不应该限制兵团指挥员之机动。相反，应该发挥兵团指挥员及各级指挥员之机动性。因为前线上的指挥员，常能看破敌人的弱点，了解有利时机。如果束缚在请命、待命范围内，常易失掉最好的机会。一个兵团指挥员只知奉公守法，不图有功，只求无过，这不能说是好的指挥员。

好的指挥员要能够抓住战机，打开战局，积极主动地完成自己的战斗任务。假如自己当面之敌已经解决，而友军方面正在吃紧，则应自动地向炮火、机关枪声猛烈的方向增援。最好寻求在敌侧后方进行猛烈的突击，与友军协同解决敌人，以求得一个战斗或战役全部胜利。如果请命、待命，易失良机，丧失应得的胜利。所以拘守待命，毫无机动的指挥员，不独不能打开战局，造成胜利的条件，他自己也时常陷于被动。譬如山地战，大家知道山地交通不便，联络困难，要求绝对一致的动作，这是非常困难的。我们

常常看到高级指挥员的命令，说山地联络困难，务求协同动作。但怎样才能协同动作呢？有些指挥员把部队摆在进攻出发地，等待友军的联络，互相如此，一辈子也不会协同一致。要想求得协同，只有每个指挥员都根据自己任务和预定计划，以最积极的行动，向着敌人猛烈进攻。只有大家都积极行动，在积极行动中，才能求得一致，求得统一。

四、游击战争

经济落后的国家和民族，要想抵抗帝国主义的军事进攻，必须广泛地开展游击战争，使之成为整个抗战中的重要部分。

什么是游击战争？游击战争的定义应该是群众战争，是群众直接参加抗战的最高形式。至于如何打法，如何行动，那是游击战术的问题。

游击战争的发展，会给侵略者以极大的危害，而对于我主力军的作战，则成为有力的助手。游击战争可以实现迷惑敌人，疲困敌人，阻击敌人，分散敌人的任务，以配合我主力军进行胜利的战斗。敌人深入一步，即被我群众武装重围一层。敌人集中，则以游击战争方式包围他，经常地袭击和扰乱他，断绝其交通运输，封锁其消息，肃清汉奸，实行坚壁清野，使敌人精神上受到重大打击，经济上受损失，消息不灵，接济困难，犹如聋子、瞎子一般。这样使敌疲困起来，麻痹起来，造成我主力消灭敌人的条

件和机会。

怎样才能开展游击战争呢？我的回答很简单，只要有群众，就能够开展游击战争，因为游击战争是群众参加抗战的最高形式。有人把组织游击战争看作一件神秘的事情，而认为自己没有本事去进行这一工作。这种观点，完全是由于他看不见群众与不相信群众的力量所产生的。其实，并没有丝毫神秘的地方。只要你认识到开展游击战争的重要，只要你相信群众的力量，只要你适当地给以推动与帮助（如少数武器等），你便可以号召起广大的群众加入游击队，进行抗日的武装斗争。任何人、任何军队都有组织抗日游击战争的任务，而且任何军队都有这个平凡的本事。

有人把游击队的活动，看成为非常困难的事情。其实，游击队只要有很好的政治纪律，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帮助群众，它不但能够存在，而且能够发展。周恩来同志把游击队和群众的关系，比如鱼和水的关系一样，这是最恰当不过的比喻，鱼在水中必然活跃自如，鱼离开水自然只有死亡。游击队只要具备了群众的条件，再加上巧妙的游击动作，便一定能够在抗日战争中，发挥其非常伟大的作用。

在抗日战争中，我们有着充分的条件在敌人后方、侧翼去开展广泛的游击战争。在那里去坚定群众抗日的意志，给他们以最后胜利的希望，使他们看到前途的光明；在那里去破坏日寇和汉奸的欺骗与活动，组织同胞们的抗日斗争，创造许多抗日的小块根据地，支持与开展整个抗战的局面。在那里是敌人非常薄弱的地方，敌人兵力

很少，只顾前进，侧翼暴露，后方空虚，正给我游击队以大显身手的好机会。我们迫切需要在那里开展游击战争来配合主力作战。我们的游击队在那里必然得到每一个迫近亡国奴命运的同胞的热烈拥护。

游击战争不仅重要，而且具有开展的条件，今天在华北的抗战中，已成为迫切而实际的中心任务了。关于游击战术的问题，已有专书论及，这里也没有详说的可能。毛泽东同志曾经发明了一个有名的十六字的游击战术原则，即“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①。这一原则虽是十年前的发明，但在今天的民族革命战争中仍然是用得着的。

游击队作战的基本原则，最忌被动应战，而须绝对的独立自主，操纵敌人。十六字的游击战术原则，便是完全以处处居于主动为原则的。游击队的指挥，要机断灵活，胆大心细，当打则打，不能打则跑，这完全要靠指挥者精细审慎，瞬息决断了。至于其他关于游击战术的细小动作，本无不变的成法，那更须要指挥者去灵活的运用与大胆创造。

五、民众运动与全民抗战

（一）痛苦的回忆与宝贵的教训

一个国家的生命，系之于全国人民身上；一个战争的

^① 十六字的游击战术原则即十六字诀。是毛泽东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初期制定的游击战争的基本原则。以后中国革命战争各个时期的作战原则，基本上都是在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胜败，也系之于人民的背向。

中华民族能否从持久的抗日战争中，求得自己的独立、自由和解放，完全在于能否动员全国一切人力、物力，为争取抗战胜利而进行顽强的、不疲倦的斗争。

三个月来的抗战中，证明了全国民众拥护政府、拥护前线将士的热烈程度。可惜，在现行政策之下，民众依然没有取得参加抗战的各种机会，也没有采取适当的政策去动员全民族的力量，以致蕴藏在群众中的极丰富的战斗力量，依然没有大大地发挥出来，使今天的抗战，始终停止在单纯军事防御的阶段，而并未能掀起全面的与全民族的抗战。

有些人直到现在还未能从华北抗战、上海抗战的痛苦经验中找出自己的教训。始终没有认识到单纯军队抗战，可以招致重蹈阿比西尼亚的覆辙^①的危险，所以至今还不愿意开展民众运动，还不愿意在民权自由、民生幸福和民族解放的三民主义的国策之下，启发人民的最高的民族意识和国家观念，动员他们为抗日战争的胜利而奋斗。这样的人，不管他们在主观上是如何的坚决抗战，但在客观上他们还没有离开民族失败主义者营垒。

为什么前线的炮火打得这样激烈，并且有了部分的挫折，竟还有人不愿去推动发挥全民族的伟大的战斗力量呢？我想除了那些完全看不见群众力量的瞎子和素以摧残

^① 1935年10月，意大利开始武装侵略阿比西尼亚（现称埃塞俄比亚），1936年5月完全占领了阿比西尼亚，使之成为意属东非的一部分。

群众为荣耀的人们外，还有一些人存在着惧怕群众的心理。

民众的力量真是可怕的吗？民众是天生的造反者吗？这真是杞人忧天^①的想法。不错，压迫者是要惧怕被压迫者的反抗的，被压迫者忍受不住压迫时也是要反抗的。可是今天的中国怎样呢？压迫者侵略者是日本帝国主义，整个中华民族每一个黄帝子孙都是被压迫的。我们的政府也正在领导全国反抗我们的侵略者，除了汉奸以外，人人对抗日政府拥护之不暇，还有谁会反对抗日政府呢？不错，在抗战过程中，贫苦人民要求适当地改善他们的生活，使自己得有余力献给国家，这是合理的要求，这对于抗日战争有利，并不致减少政府的收入。即对于富有者，也不过在合理负担的原则下，少得一点租息，却在整个民众抗战胜利之下保持了自己的身家，而不致为日寇所侵占。试问改善人民生活，又会对于政府、对于富有者有什么害处呢？

真正害怕中国民众的力量的，是日本帝国主义，而不应该是中国政府和富有者。阻碍与压迫民众参战的运动，只有利于日本的侵略，而使民族的生命遭受危害。动员与发挥民众参加抗战，只会提高政府的威信，增强抗日的力量，使持久的抗战具有坚实的基础。也只有这样的全民族的抗战，才能最终战胜日本帝国主义。

^① 杞人忧天：《列子·天瑞》里说，杞国有个人，担心天要崩塌下来他将无处存身，因此愁得觉也不睡，饭也不吃。后来就用“杞人忧天”比喻不必要的或无根据的忧虑。

我们不在于消极地批评这些严重的现象，我们只希望这些现象能够得到及时纠正，使痛苦的回忆变为宝贵的教训，今天的教训变成将来的胜利。

（二）持久抗战与全民动员

我们已经指明，只有坚持持久的抗战，才能最终的战胜敌人。要进行持久的抗战，就要在抗战中动员一切人力、物力，团结与生长民族的力量，高度地发挥民众抗战的热情，建立正确的战略和战术，转变敌我力量对比的现势。而这一切的关键，则在于我们能否真正实现孙总理的民族独立、民权自由与民生幸福的三民主义。

长期的战争，无一不要民众的动员。前面已经从战略、战术上以及发展游击战争的重要性上，说明动员民众的重要。现再就人力物力的需要上，来补充这一问题。

有了民众的动员，前方的人力可以得到如意的补充。军队作战的人力消耗是很大的，加上我们还需要组织更多的新的军队，才能应付战局开展的需要，这就非要全民族的动员不可。所以由募兵制转为征兵制，是非常迫切的需要。但是，要实行征兵制，必须要在宽大的民主政治与改善人民生活的条件之下才有可能。宽大的民主政治，可以提高国家的威信和人民爱国的观念；人民生活的改善，可以使服兵役者无家庭的顾虑，能坚决地为自己的祖国、为自己的利益而战斗。强迫抽派或征调的军队，是无法支持最顽强的战斗的。反之，在民主与民生的纲领的实施中，人人将自动地、踊跃地奔上前线，家中的父母妻子也将热烈地鼓动自己的丈夫、儿子上前线。这样的军队，质量要好

得多，战斗力要坚强得多，与人民的关系要密切得多。

有了民众的动员，可以增加后方的生产，特别是军需工业的生产，保障战争需要源源的供给，可以使军队得到民众无量的帮助，如搬运粮食，救护伤兵，铲除汉奸，侦探敌情，帮助带路，封锁消息等等。

重复地说，给民众的自由和生活，是动员民众参战的前提。全民的动员，是持久抗战胜利的保证，即使在军事上遭到某些不利，只要我们依靠全国民众的力量，就可以变不利为有利。至若一切企图只用强迫命令的方式，不顾民众的生活与要求的动员，不但不能收到好的效果，而且会使民族走到不堪设想的地步。

（三）军民关系

军队与民众打成一片，相互影响，相互合作，是保证战争胜利的重要因素。

军民关系之好坏，决定于军队本身之有无严格的纪律，以及每个军人有无爱护人民的观念。假如一个军队能有严肃的纪律，每个官兵对于人民，能够做到买卖公平，态度和蔼，虽在极困难、极混乱的环境中，不乱拿民众一点东西，那这个军队必然得到广大民众的拥护，取得人民的帮助。反之，纪律坏的军队，虽然有时可以从民众身上去满足自己的欲求，使民众徒唤奈何，但是一遇困难，他便会得不到群众丝毫的帮助而无法解决。

这一时期，特别在战地中，某些军队的纪律之恶劣，对人民利益之极端的不加顾恤，我不愿加丝毫的批评。我只诚恳地热烈地希望这些部队的长官，加以严格的注意，

勿使因为军队缺乏纪律而致民众失望悲观，增加敌人欺骗的作用。某军队经过某村后，群众很愤怒地说：“日本人来也不过这样吧！”请听群众的怒声呵！

六、几句结语

我们提出了在持久抗战中敌我力量对比可变性，我们指明了抗战的胜利的前途。但这一切决不是命定的，胜利的前途也不是从天而降的，而完全依靠于我们自己的努力。

战争越打越紧急，华北战争的影响，使整个抗战处于困难的地位。假如我们能够克服这一时期在战术和指挥上，特别是在民众动员上的弱点，我们是能够迅速克服这些困难，取得胜利的。

时机愈加紧迫了！我们已经暴露的弱点不能再存在了！建立正确的方针，不能再迟缓了！今天放在全国同胞身上的责任是拥护、推动与帮助政府和领袖，从困难中去求得民族的独立、自由和解放！

（本文原载1937年《解放》第1卷第25期）

我在红三军团的经历(下)

黄 克 诚

1933年1月，蒋介石调集重兵，对我中央革命根据地
进行第四次大规模“围剿”。担任主攻任务的敌人中路军，
以陈诚为总指挥，采取“分进合击”的战略，兵分三路向我
进犯，妄图消灭我红军主力于黎川、建宁地区。

这时，毛泽东同志已经离开了红军。但“诱敌深入”，
在运动中寻机歼灭敌人有生力量的战略战术，已在红军中
深入人心。开始，周恩来、朱德同志指挥红一方面军隐蔽
地向北运动，寻机歼敌。根据曾希圣同志破译的敌台密码，
我们对敌军的指挥调动了如指掌。而敌人进入苏区之后，
由于群众封锁消息，对我军的行动毫无所知。我红一方面
军主力进至南丰、南城、金溪、贵溪一带地区之后，在上
清宫抓住了敌周浑元的第五师。1933年1月5日，我集中
红一、红三、红五三个军团的兵力，一举将该师全歼，俘
敌旅长周士达以下2000余人。上清宫是道教祖师张天师居
住的地方，张天师住室里到处张挂着古字画，都是历代
名人的手笔。我们在那里住了三天，一张字画未曾动过。

这时，中共临时中央已从上海迁入中央革命根据地。
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局命令红一方面军进攻敌人重兵设防

的南丰城，企图以此来破坏敌人的“围剿”计划。陈诚获悉我军围攻南丰的情报后，一面令南丰守军毛炳文的第八师据城固守，一面令其所属各纵队迅速向南丰驰援，企图合围红一方面军主力于南丰城下。

南丰城高且固，守敌实力较强。担任主攻任务的我红三军团，在彭德怀同志的指挥下，先后两次奋勇强攻南丰城，均未奏效，我军伤亡不小。第三师师长彭鳌亲临前线视察敌人城防，不幸中弹牺牲。彭德怀同志见两次强攻未克，今又折损大将，心中十分不快。加之陈诚正督率优势兵力迅速向我进逼，彭德怀同志乃向周恩来、朱德同志建议撤南丰之围。此时，敌援军正沿永丰、宜黄向我苏区边缘东进，增援南丰。红三军团遂改强攻为佯攻，主力与红一军团一起转移至宜黄、乐安之线以南，侧击东援之敌。经两天的急行军，红一方面军主力进至广昌以西的东韶、洛口、吴村地区，埋伏在敌行进必经之路两侧的大山树林之中，待机歼敌。敌左翼援军由罗卓英率第九、第十一师自宜黄南进，右翼援军李明的第五十二师和陈时骥的第五十九师自乐安分两路南进，对我军的行动毫无察觉。2月27日，敌第五十二、第五十九师行进至黄陂以西的桥头附近，我红一方面军主力对该两师之敌突然发起猛攻，将敌行军纵队拦腰截成数段。经两天激战，全歼该敌，敌五十二师师长李明被击伤后毙命，第五十九师师长陈时骥被生俘，并俘敌官兵16000余人，缴枪15000余支。

敌左翼第九师（师长李延年）、第十一师（师长肖乾）继续由宜黄经东陂、甘竹向广昌进攻。我军在结束桥头战

斗之后，移兵黄陂、东韶一线，隐蔽集结待敌。3月20日，敌第十一师进至草台冈、徐庄一线。21日拂晓，我军突然向该敌发起攻击，经一天激战，歼敌第十一师五个团，敌师长肖乾被击伤，并歼敌第九师一个团，共俘敌官兵8000余人，缴枪7000余支。这一仗打得相当艰苦，我军的伤亡也很大。彭绍辉、洪超两位同志就是于此役被打掉胳膊的。这一仗打完之后，敌人的第四次“围剿”就被粉碎了。

第四次反“围剿”中，红一方面军在周恩来，朱德同志的指挥下，沿用毛泽东同志确定的军事方针，打了几个胜仗，吃掉敌人近三个整编师，缴获了大批武器装备，特别是缴获到相当多的轻机枪，改善了我军的装备。在此以前，我军只有重机枪，没有轻机枪，而国民党军队中每个连配备有三挺轻机枪。第四次反“围剿”胜利之后，我军每个连队才开始配备起两到三挺轻机枪。打这以后，李德来到中央苏区直接指挥作战，红一方面军就再也没有打过好仗了。

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后，整个形势对我们非常有利。九一八事变，一二八事变相继发生，全国抗日运动蓬勃发展。在中央苏区，我军不仅连续粉碎了国民党军队的三次大规模“围剿”，而且相继将苏区内的许多白色据点打掉，使中央苏区联成了一片。我军经过三次反“围剿”作战，虽然受到一些消耗，但不到三个月时间，就补充发展起来了。胜利地粉碎了敌人的第四次大规模“围剿”，使国民党军队再次损兵折将，遭到惨败。然而，中共临时中央自上海转移到中央苏区之后，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主张受到了进

一步的排斥，并最终取消了毛泽东在党内和红军中的领导职务，毛泽东被迫离开了红军。同时，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局把过去中央苏区的正确的方针、政策当作右倾机会主义加以批判，推行一整套“左”的方针、政策：原来红军的三大任务只剩下打仗一项了；土地政策、工运政策、城市政策、商业政策等都是“左”的一套。这样一来，不仅丧失了发展苏区和壮大红军的有利时机，而且在苏区内造成了赤白对立，给红军带来了许多意想不到的困难。过去我们可以从赣州、吉安等地把盐运进中央苏区，这时候不行了。中央苏区吃盐却成了大问题。国民党加紧对中央苏区实行封锁固然是一个方面的重要原因，而另一方面，我们实行过“左”的政策，把私商这条线也割断了，等于自我封锁起来，结果连盐也没有吃了。当时兄弟部队见面时，能要到一点盐，算是很大的收获了。军事上的分兵作战和瞎指挥，则使红军连连受挫，逐渐削弱，以致丧失机动作战的能力。所有这些，都是当时的“左”倾冒险主义给革命造成了巨大危害。

八、大湖坪整编和东方军入闽作战

第四次反“围剿”之后，红一方面军奉命开至永丰、乐安之间的大湖坪进行整编。在行进途中，红三军团政治部主任贺昌不慎坠马，跌断了腿，被送往瑞金后方医院治疗，我被任命为红三军团代理政治部主任。

1933年6月，红一方面军到达大湖坪进行整编。由于

部队受到削弱，各部均进行了缩编。红一军团编了第一、第二两个师。红三军团编了第四、第五两个师。红五军团只编了一个第十三师。地方部队编了三个新的师，即兴国模范师、瑞金师、宁都师（即少共国防师）。不久兴国模范师被编入红三军团，为第六师；宁都师（少共国际师）编入红五军团，为第十五师。上述这八个师，就是当时中央红军的主力。不久，袁国平同志回到红三军团任政治部主任，我被调到第五师任政治部主任。经大湖坪整编后的红三军团各师、团的主官情况是：

第四师（由原红五军的三个师缩编成）师长张锡龙，政委彭雪枫，政治部主任李井泉。

第五师（由原红七军和红二十一军缩编成）师长寻淮洲，政委乐少华，政治部主任黄克诚。

第六师（由兴国模范师编成）师长曹德清，政委徐策，政治部主任曹其灿。

第四师辖第十、第十一、第十二三个团：

第十团团团长胡浚，政委薛华立（后为杨勇）；

第十一团团团长邓国清，政委吴宗太（后为张爱萍）；

第十二团团团长谢嵩，政委钟赤兵（后为苏振华）。

第五师辖第十三、第十四、第十五三个团：

第十三团团团长李天佑（后为黄镇），政委毛贲虎（后为余均、王光汉）；

第十四团团团长黄冕昌，政委田丰；

第十五团团团长白志文，政委张凯（后为罗元发）。

第六师辖第十六、第十七、第十八三个团，只记得团长的名字分别为王松青、李寿轩、刘纯。

过去，主力红军作战，地方部队和赤卫队配合，主力红军的补充和扩大，也主要依靠地方部队升级和俘虏敌军。大湖坪整编之后，主力红军削弱了，兵力也不充实，加之军事指挥上连连失误，基本上没有打过好的仗，俘获很少，部队得不到补充。地方上虽然相继又组建起一些新部队，但不是用于充实主力红军，而是另外编了几个军团（即红七、红八、红九军团）。同时又把活动于赣东北地区的红十军南调中央苏区集中。表面上看起来主力红军编制扩大了，由原来的三个军团增加至六个军团，但实际上是摆空架式，徒有虚名。从我们党的历史上看，凡是推行“左”倾路线的时候，总是把肥皂泡吹得满大，虚张声势，干那种自欺欺人的蠢事。其结果，无不以使革命事业遭受巨大损失而告终。当时在干部政策上，片面强调红军骨干应是工人出身的“无产阶级分子”，在所谓“改造和充实各级领导机关”的名义下，原来赞成和拥护毛泽东同志主张的干部有些被调离了主力红军。临时中央对第四次反“围剿”胜利后的形势缺乏实事求是地分析，同时把李德捧为军事指挥上的权威。他们不从实际情况出发，于大湖坪整编之后，决定红一方面军分离作战，实行“全线出击”、“两个拳头打人”的战略，将红一方面军分成两部分：一部分以红一军团为主（后称中央军），在抚河、赣江之间作战，负责看守中央苏区的北大门；另一部分以红三军团为主称东方军，入闽作战。企图在两个战略方向上同时取胜，进而夺取抚

州、南昌等中心城市，以实现革命在江西和邻近省区的首先胜利。

东方军以红三军团总指挥彭德怀兼司令员，红三军团政委滕代远兼政治委员（不久滕代远调任中央军委武装动员部部长，由杨尚昆接任红三军团政治委员），于1933年7月东方军孤军东进，先在福建连城之朋口地区击溃敌第十九路军区寿年部的第七十八师，并歼其一部，乘胜追击了100余里，占领了连城、清流、归化等县城。第五师奉命到归化消灭白色据点，在泉上镇采取爆破的方法炸开了一个大土围子，歼灭了敌卢兴邦部一个团及反动民团武装千余人。这时我患痢疾，病得相当厉害。卫生队长因没有药，就给我灌肠，弄得我全身瘫软，走不动路，但仍然坚持随部队行动。不久搞到一只鸡，加上一点洋参须子熬了一锅汤，吃了之后，体力开始慢慢恢复过来。

部队旋即进至闽江流域的延平（今南平）、顺昌之线，经沙县下武夷山，进至夏茂镇，搞扩军、筹款。夏茂镇比较繁华，商品也很丰富，我们在这里筹集到不少物资。

离开夏茂镇之后，第五师在闽江南岸，第四、第六师在闽江北岸，夹江而下，先攻占了洋口，又经沙县之沙溪口、王台，进逼延平城下。第四、第五师一部进至延平、福州之间一线。在延平打了一场恶仗，我军伤亡很大。第十三团政委毛贲虎于此役牺牲，由余均继任团政委。不久余均又牺牲，由王光汉继任团政委。王光汉同志后来在反五次“围剿”作战中在江西牺牲。几个月之内，第十三团损失掉三个团政委，战斗之艰苦可见一斑。红一方面军历来

作战都是协同配合，集中相对优势兵力消灭敌人，所以屡战屡胜。经验证明，红一、红三军团分离作战，就打不好仗，就要吃亏。这次东方军入闽作战三个月，基本上没有打过好仗，部队受到很大的损失和消耗。当时，蒋介石已在部署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五次大规模“围剿”。红一方面军分离作战的结果，不仅未能取得预期的胜利，反而丧失了进行反第五次“围剿”准备的宝贵时间。

九、参加第五次反“围剿”

1933年9月，蒋介石纠集100万军队对红军和革命根据地进行第五次大规模“围剿”，其中直接用于进攻中央苏区的兵力在50万以上。此次“围剿”，敌人吸取前四次失败的教训，采取持久作战和堡垒主义的新战略，企图逐步压缩我革命根据地，然后寻求红军主力决战，最后达到消灭红军，摧毁革命根据地的目的。9月下旬，敌北线部队已自临川、南城、贵溪等地向我中央苏区进犯，并侵占黎川城。敌重兵压境，临时中央急令东方军返回北线，收复黎川，以实行“御敌于国门之外”、“不失寸土”的错误方针。

入闽作战三个月的东方军未及休整，即由闽北西返，经将乐、建宁、泰宁向黎川前进。当部队进至黎川东北之洵口，不期与敌赵观涛的第六师第十八旅遭遇。彭德怀同志机动指挥红三军团，将该敌全歼，生俘敌旅长葛仲山。这是第五次反“围剿”中取得的一个意外的序战胜利。按照毛泽东同志指挥作战的经验，打完一仗之后，部队要进行

必要的休整，养精蓄锐，再寻机歼敌。但此时临时中央完全听命于军事顾问李德的瞎指挥，命令已相当疲惫的红三军团立即向黎川以北敌人的巩固阵地硝石镇进攻。硝石位于南城、南丰、黎川之间，守敌兵力很强，而且敌在南城、南丰、黎川均驻有重兵。当红三军团奉命进至硝石附近集结后，发现我军已钻入敌堡垒群纵深之中，完全失去机动余地，且将受到四面之敌重兵夹击，处境非常危险。彭德怀同志当机立断，没有组织部队强攻，连电中央，经中央同意，取消攻打硝石的计划，才使红三军团撤离险境。

红三军团离开硝石之后又被李德命令远离苏区，去攻打位于抚州附近的浒湾。进驻浒湾之敌徐廷瑶的第四师，系由原张发奎部改编的广东部队，战斗力很强。待红三军团赶至浒湾，守敌已建立了巩固的阵地。激战两天一夜，我军遭受很大伤亡，只好撤出战斗。浒湾没有攻克，临时中央便怪罪下来，要追究部队指挥员的责任。他们不好对战功卓著的彭德怀同志直接进行追究，便把肖劲光同志拿来顶罪，将肖劲光撤职，开除党籍，并交付审判。我所在的第五师有一个团政委麦农本也被当作替罪羊撤职，并被处死。其实，浒湾没有打下来，完全是上边瞎指挥的责任，与肖劲光、麦农本等同志毫不相干，处理肖劲光、杀掉麦农本，实在是天大的冤枉。当时我是第五师政治部主任，有关打仗的事情我很少说话，均由师长寻淮洲、政委乐少华同志决定。以后彭德怀同志说我要滑头，不帮助出主意。其实，那个时候我说话根本不起作用，而且上上下下恐怖气氛很浓，稍不慎说了人家不中意的话，就可能被整掉，让

你永远缄口。

从硝石、浒湾两次战斗的指挥上，我明显地预感到红军的前途不妙了。过去红军作战，前线部队有很大的机动性和主动权，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明知道会吃亏，就决不蛮干。可现在不同了，不管大仗小仗，统统由上边制定作战方案，下达具体作战命令，部队在执行中不允许有一丝一毫的机动。本来是按照上边的命令行事，但仗没有打好时却要追究下边同志的责任，真是咄咄怪事。李德指挥军队完全照搬德国军事学上那一套，毫不顾红军当时的具体情况，不考虑敌强我弱的特点，一味搞所谓正规化，打阵地战，与敌人拼消耗，红军怎么能吃得消？李德今天命令部队去攻打这里，明天又命令部队去攻打那里，又不集中使用兵力，结果，哪里也吃不掉，白白疲劳、消耗了部队。

浒湾战斗中，第四师政治委员彭雪枫负伤，回到瑞金后方医院治疗，派我到第四师任政治委员，时在1933年11月。第四师师长张锡龙，是四川人，曾毕业于莫斯科步兵学校，军事素质很好，又有一定文化水平。他的枪法非常好，可以抬手用枪击中飞起的麻雀。他每天早晨五点钟起床学习，精力相当充沛，工作起来从不知道疲倦，打起仗来勇敢顽强，是位难得的好指挥员。第四师原政治部主任李井泉这时已调到后方工作，上边派了一位工人出身的吕振球同志任师政治部主任。吕是从莫斯科回来的，是位好同志，但就是文化程度太低，工作能力差，又缺乏经验。过去他没有作过连营团的政治工作，一下子来当师政治部

主任，工作起来很困难。原第五师师长寻淮洲、政治委员乐少华接替肖劲光同志任红七军团军团长、政治委员；由李天佑同志接任第五师师长，陈阿根同志任师政治委员。陈原是上海的工人，也是刚从莫斯科回来的，工作还比较踏实，不那么主观。后来在第五次反“围剿”的一次战斗中牺牲了。原在红三军团政治部任宣传部长的邓乾元，这时调任第五师政治部主任。原第五师参谋长张翼（即我在教导营时的营长）调任第四师参谋长。

我到第四师工作不到半个月，进占黎川之敌的一个师向黎川以南20华里处的团村进犯。彭德怀同志指挥红三军团对进犯之敌发起反击，以猛打猛冲的战术，将敌人击溃，随即尾敌追击。第四师师长张锡龙一打起仗来就一个劲地往前边冲，我因为视力差，需要费很大力气才能追上他。我们两个人跑了一气之后，停下来一看，已经跑到第一线步兵那里了。这时敌人已退到一个寨子里据守，我们就部署兵力准备攻打这个寨子。我和张锡龙同志来到阵地前边察看地形，选择攻击点。在我们侧面不到1000米的一座山头上，驻有一股敌人，但我们当时并没有发觉。我们两个人举着望远镜看地形，又是站在高处，被侧面山上的这股敌人发现了。敌人用机枪对准我们扫过来，一颗子弹正好打中了张锡龙同志的头部，子弹从张锡龙的头部穿出之后又打掉了我的眼镜。眼镜一掉，我就什么也看不清了，我蹲下身子去摸眼镜。我的手刚触摸到眼镜，还没等捡起来，就听到张锡龙同志在一旁发出呼噜呼噜的声响。我摸到的眼镜已被子弹打坏，忙掏出身上一付备用的眼镜戴上，定

睛一看，张锡龙同志已牺牲了。这位英勇的红军指挥员，就这样为革命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

团村战斗开头虽然将敌人击溃，但是红三军团孤军无援，终未能吃掉敌人这个师，而我们自己却伤亡了几百人。

1933年11月20日，国民党第十九路军联合一部分反蒋势力，发动了“福建事变”，成立了福建人民政府。这样一来，打乱了蒋介石的“围剿”计划，蒋介石不得不从“围剿”中央革命根据地的主力部队中，抽出一部分兵力去镇压“福建事变”。这对红一方面军粉碎第五次“围剿”无疑是一个非常有利的时机。当时，毛泽东同志曾主张红军主力突进到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皖赣地区，将战略防御转变为战略进攻，迫使敌军回援其根本重地。这样，既可以粉碎敌人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围剿”，又可援助“福建人民政府”。彭德怀同志也曾建议集中红军主力向闽浙赣边区进军，依托方志敏、邵式平同志创建的革命根据地威胁南京、上海、杭州等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心脏地区，支援第十九路军发动的“福建事变”，推动抗日救亡运动，破坏蒋介石的第五次“围剿”计划，可收一石数鸟之效。但这些正确的建议均未被临时中央所采纳。彭德怀同志又建议红军尾随敌人调动的部队打，既可以消灭敌人一部分有生力量，又可以给第十九路军以战略上的配合。临时中央仍不予置理。在蒋介石重新调整其部署，集中对付第十九路军的情况下，临时中央继续实行分兵作战的错误方针，将红一、三军团分开行动。红一军团被调至黎川、泰宁之间，进攻敌人的

堡垒线，与敌拚消耗；红三军团再次被调至福建去攻打沙县。沙县城由国民党新编第五十二师卢兴邦部两个团驻守。红三军团采取挖坑道爆破的方法，炸开城墙，奋勇突进城内，全歼守敌。继之，七军团又乘胜攻占尤溪县，缴获了卢兴邦的一座兵工厂，并且搞到一大批盐。红军战士兴高采烈地把缴获的大批物资和机器搬运回瑞金。这是红三军团在第五次反“围剿”中打的第二个胜仗。但这只是在战术上取得的局部胜利，对全局并无多大影响。卢兴邦所部系地方杂牌部队，蒋介石的嫡系主力部队并未受到损伤。

蒋介石平定了“福建事变”之后，重新集结兵力向中央革命根据地大举进攻。这时，临时中央由进攻中的冒险主义变为防御中的保守主义，命令红一方面军处处设防，节节抵御，实行阵地战、堡垒战，以堡垒对堡垒，搞消极防御。并提出实行“短促突击”的战法，以支持这种消极防御的方针。

红三军团奉命从闽北西返，在黎川与泰宁交界处的山地地带，与红一军团会合。第五次反“围剿”打了一年多时间，这是红一、三军团首次会合。兄弟部队的战友们相见之下，感慨万端，心里有许多话要说，但又说不出来。红一军团的同志向我们要盐。林彪见了我头一句话就问：“有盐没有？”过去红军每人每天还有五钱盐吃，第五次反“围剿”时，前线部队每人每天勉强能吃到八分盐，后方则无盐吃。我们将在福建沙县、尤溪缴获到的盐分给红一军团一些，红一军团将防御阵地移交给我们之后，又奉命离去。我们在这一带山地与敌人对抗了个把月时间，被迫放弃阵地，撤

到南丰、广昌以北地区，继续与敌人对抗。敌人搞堡垒政策，遍地是堡垒，我军无法攻得动。一仗打下来，就是一大片伤亡。第五师第十三团政委王光汉就是在这一带牺牲的。

1934年4月中旬，敌人集中兵力进攻广昌。红一、三军团奉命在广昌一线固守。这时李德亲临前线指挥，在广昌与敌军决战。开始，敌军发动进攻，我军奋起反击，将敌军击退。但在敌军后面一两千米处就是堡垒群，敌人钻进堡垒里，我们就无法可施。就这样，敌军从堡垒群里轮番出击，并用炮火猛烈轰击我军阵地，敌人的飞机也在空中投弹扫射。敌我双方反复拚杀，整天炮声隆隆，枪声不断。同敌军搞堡垒对阵的结果，虽然也杀伤了一些敌人，但红军总拚不过在数量上和装备上都占绝对优势的敌军。我军伤亡日增，仗打得越来越艰苦。红三军团从福建沙县回师黎川时，我曾对彭德怀同志说：“照这个样子打下去，红军要被搞垮的，一点出路也没有。你现在讲话还能起点作用，是不是你向中央建议请毛泽东同志出来指挥，或许可以扭转危局。”彭德怀同志听了之后，没有讲话，我再向他说，他仍表示沉默。到广昌战斗时，彭德怀同志也实在忍不下去了，对李德的瞎指挥公开表示不满。广昌战斗后与李德见面时，彭德怀说李德是“图上作业的战术家”，并骂李德“卑鄙无耻”，“崽卖爷田心不痛”。李德听后暴跳如雷，就与彭德怀对骂，互不相让。

在广昌苦战了18天之后，固守广昌的计划不得不被迫放弃。红三军团奉命向广昌以南撤退，依然是处处设防，

搞阵地防御，几乎每天都在打仗，有时一天要打几个仗。自5月初广昌失守以后，又一直打到9月，从未间断过，每次战斗我军总是处于被动挨打的境地。蒋介石从德国买进来的波夫式野炮，杀伤力相当大，天天在敌人飞机、大炮的疯狂轰击下与敌作战，我军伤亡之重可想而知。这一时期打的几个主要战斗有高虎垌战斗、万年亭战斗、驿前镇战斗等。每次战斗打下来，部队都是伤亡一大堆，又无法得到补充，尤其是干部伤亡很大，使部队的元气大伤。广昌战斗时，第六师政治部主任曹其灿牺牲。万年亭战斗时，第五师政治委员陈阿根、红三军团卫生部长何福生牺牲。在从驿前镇撤退时，第四师参谋长张翼叛逃。张翼是江苏阜宁县凤谷村人，日本士官学校的留学生，在日本时就加入共产党。他叛逃到蒋介石那里后，蒋介石没有重用他，他又投靠了张学良。后来，他在洪泽湖一带拉起一支武装，被国民党编为一个旅。抗日战争时期，我率八路军一部分主力挺进苏北后，国民党苏皖战区副总司令兼江苏省主席韩德勤知道张翼过去在红三军团与我共过事，怕他又有反复，投靠我军，就将他杀掉了。

这个时期每天行军打仗，上边也不召集开会了。我对红军的前途非常担忧，又没有发表意见的机会，内心很苦恼。当时党内的政治空气仍然很紧张，我也不敢贸然提意见，只好在下边发发牢骚，骂骂街。我曾说过“短促突击，红军送死”一类的话。有人把我这些话向上边报告了，军团一位领导同志就劝我不要乱讲话，倒没有处分我。

第五次反“围剿”整整打了一年的仗，参加的大小战斗

不计其数。红三军团除了在洵口、沙县两次战斗中打了胜仗之外，其余的仗都没有打好。单就打仗来讲，这一年多来，红军指战员确实是经受了前所未有的锻炼和考验，不会打仗的学会了打仗，没有战斗经验的取得了经验。可是，由于整个军事战略方针上的失误，红军越打越削弱，根据地越来越缩小，几乎断送了红一方面军。最后在苏区无法立足，不得不被迫放弃中央革命根据地开始了艰苦的长征。

十、参加长征

1934年9月底，红三军团从驿前镇战斗撤回于都。博古来到红三军团，在团以上干部会议上作了一个报告，声称要转移阵地，动员部队突围。但并没有讲明要转移到何处。这时《红色中华》上发表了张闻天同志的署名文章《一切为了苏维埃》。从博古的报告和张闻天的文章中，我觉察到中央已打算放弃中央苏区，有向外线转移的迹象。于是，我急忙赶到部队医院里去，动员伤病员立即出院，随部队转移。当时红三军团的伤病员约有10000余人，他们对部队马上准备向外线转移一无所知，绝大多数伤病员不想和不能出院，只有少数同志归队了。记得当时和我一起回前线的伤病干部中，有甘渭汉、张震、钟伟等同志。那些没有跟部队转移走的伤病员，后来全部损失掉了，大部分是被敌人杀害了。就这样，红三军团从于都出发，开始了举世闻名的万里长征。

中央革命根据地参加长征的主力部队，除了红一、红

三、红五军团之外，还有红八军团和红九军团。长征开始不久，在抢渡湘江战役中，红八军团因损失严重而被编散，余部在贵州黎平编入红五军团。红八军团军团长周昆在抗日战争初期，曾任八路军第一一五师参谋长。平型关作战后，周昆回了一次延安。在其返回部队路经西安时，领取了第一一五师的军费四万元法币。当时的法币尚未贬值，还很值钱。记得当时在山西买一整匹棉布只要三块法币。周昆携款潜逃，以后就不知去向了。

长征开始时，主力红军的编队情况是，红一军团为一路，红三军团为一路，左右齐头并进。中央纵队在红三军团之后跟进。红五军团作为全军的后卫，走在最后。我们第四师作为红三军团的先头部队，走在最前面。张锡龙同志牺牲之后，由洪超同志任第四师师长，我仍任该师政治委员。洪超同志是湖北人，十几岁就参加红军，曾参加过南昌起义，是位身经百战的指挥员。一路上，第四师逢山开路，遇水架桥，为后续大部队开辟前进道路。我们离开于都后，先向南疾进，首先遇到的是粤军陈济棠部的阻击。我军在信丰一带将陈济棠所部击溃后，迅即占领了固陂，于10月22日突破了敌人设置的第一道封锁线。洪超师长不幸于此役牺牲，张宗逊同志继任第四师师长。

固陂战斗之后，红三军团西渡赣江，经南康、崇义，越过五岭山脉，进至湖南汝城，又与湘敌何键部队接上了火。我军经英勇冲杀，将敌人构筑的堡垒封锁线突开了一道缺口，于11月6日通过了敌人的第二道封锁线。部队继续西进，红三军团于11月11日在郴县、宜章间突破敌人的

第三道封锁线后，又经郴县、桂阳、嘉禾、宁远、道县，过永安关，进至广西界首。一、三军团先头部队于11月27日突破敌人的第四道封锁线，控制了界首至觉山铺间的渡河点，为后续大部队顺利通过湘江创造了有利条件。我军一进入广西境内，湘、桂两省敌军分路向我猛扑过来，妄图夺回渡河点。桂系敌军集中兵力对我进行堵截，湘敌何键部队对我紧追不舍，我军处于敌人前后夹击之下，战斗越加激烈、艰苦。红三军团全力对付桂敌。白崇禧的桂军战斗力相当强，红三军团主力首先在灌阳一线与桂敌激战，我军遭到很大伤亡，第五师参谋长胡震、第十四团团团长黄冕昌相继牺牲。红一军团的部队原来防守在界首之湘江北岸，现在要转过头来对付湘敌，就把界首的防务移交给红三军团。当灌阳战斗打得正激烈之时，我奉命赶到界首红一军团司令部，接受红一军团的防务。林彪向我交待了任务和敌军的情况以后，我问林彪，我们是否仍照红一军团这样在湘江北岸布防？林彪说不行，要过江在南岸构筑防御阵地，阻止桂敌侧击，以掩护主力和中央直属纵队通过湘江。待张宗逊同志率第四师来到界首，我们就按照林彪的吩咐在湘江南岸靠近山麓布防，与桂系部队打了一场恶仗。这一仗一直打了两天两夜，异常激烈。第十团团团长沈述清牺牲，师参谋长杜中美即前去接任该团团团长，指挥战斗，不久，杜中美也牺牲。当我军主力和中央纵队于12月1日全部通过湘江之后，我就对张宗逊师长说：“我们的阻击任务已经完成，应该指挥部队迅速撤退。”张宗逊同志因为还没有接到上级的撤退命令，就说不能撤。我说：“现在

不撤，拖延下去想撤也撤不走了，我们会被敌人全部吃掉的。”张宗逊同志执行上级命令十分坚决，但缺乏灵治性，执意要等待上级下达命令才肯撤。我看任务既已完成，情况又相当危险，若再迟疑，将招致全师覆灭。当时红军部队中，政治委员有最后的决定权。我对张宗逊同志说：“你指挥部队迅速撤离，去追赶主力，一切由我负全部责任。”这样，张宗逊同志才勉强把部队撤走，使第四师得以保全。当时红五军团的第三十四师（其前身系在福建组建起来的红十二军），就在湖南境内被敌人截住而损失掉了。

界首一战，我军遭到重大伤亡。中央红军开始长征以来，沿途受到敌人的围追堵截，迭遭损失，其中通过广西境内时的损失为最大，伤亡不下两万人。而界首一战，则是在广西境内作战中损失最重大的一次。桂系白崇禧的部队不仅战斗力较强，而且战术灵活。他们不是从正面，也不是从背后攻击我们，而是从侧面拦腰打。广西道路狭窄，山高，沟深，林密。桂敌利用其熟悉地形的优越条件，隐蔽地进入我军侧翼以后，突然发起攻击。而我军既不熟悉地形又缺乏群众基础，所以吃了大亏。

我军过了界首之后，进入山地行军，沿途仍不断遭到桂敌的截击。在两渡桥战斗中，由于我军抢先占据隘口，此次桂敌侧击未能得手。接着又在龙胜（今资源）县境之两河口，与桂敌激战两天。此役打得也相当艰苦，我们又受到不小的损失。当时我军守在山上，敌人从山脚下硬往上攻，遂成混战状态。我军一个排被敌人包围后，全部被缴械。我打了一辈子仗，这是唯一的一次亲眼看到我军一

个整排集体被敌人缴械的场面。我军主力离开两河口之后，张宗逊师长仍然坚持固守在山头上，未接到上级命令之前，不许部队后撤。我再次强勉他指挥部队撤离险境，并让师政治部主任张爱萍同志带领一支部队先撤走，我们随后跟进。那时如若不走，后果也是不堪设想的。

两河口战斗之后，我军翻越了几座高山，摆脱了桂敌，进入苗族聚居地区。苗区居民的住房，是用木头搭起的小楼，四周用木柱支撑，底层是空的，上边住人。我们一来到这里，人疲马乏，感到非常疲劳。我爬上一座小木楼，倒头便睡。待到半夜，木楼突然火起。我被惊醒之后，已被大火包围。楼内浓烟呛人，什么也看不清。我费了好大力气才摸索着下了楼，但眼镜放在楼上的桌子上，被大火烧毁了。

我军在广西境内大约共走了十来天，绝大部分时间是在紧张的战斗中度过的。桂系部队的侧击战术，很令人恼火。我们不得不随时提防他们的侧击，以致在这十来天当中，很少睡眠。我有时抽空打个盹，就算是休息了，搞得神经非常紧张。直到离开广西，进入湖南、贵州境内，摆脱开桂敌的纠缠，才得以睡上个安稳觉。

我军离开广西后即进入湖南通道县境，继之进入贵州黎平。这时主力红军已折损过半。毛泽东同志力主放弃原定的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计划，改向敌人力量比较薄弱的贵州前进。毛泽东同志先同王稼祥同志交换意见，并提出需要认真考虑军事路线的是非问题，得到了王稼祥同志的赞同。接着，毛泽东同志又说服了张闻天等其他几位

中央主要领导同志。这样，中央政治局于1934年12月18日在黎平召开会议，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在川黔边建立新根据地的决议》。会议认为，“过去在湘西创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决定在目前已经是不可能的并且是不适宜的”，正式决定中央红军改向遵义为中心的川黔边地区挺进。黎平会议使中央红军避免了陷入绝境，并为后来的遵义会议奠定了基础。

我们第四师在黎平未作停留，向西经剑河、黄平，于1934年12月底进至瓮安县，并在瓮安度过了1935年元旦。部队经过长途跋涉转战，体力消耗相当大。过元旦时我曾千方百计地想设法搞到一点好吃的东西，让战士们过新年时稍许改善一下伙食。结果连一点豆腐也没能搞得到，当时心里真不是滋味。这年元旦的窘迫景状，使我后来许多年都不能忘记。

1935年1月1日，中央政治局在猴场召开会议，决定北渡乌江，并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重申了创建川黔边根据地及向川南发展的战略方针。红一、三军团等主力红军在瓮安会合后，即着手北渡乌江的准备。红一军团在右，红三军团在左，齐头向乌江边进发。红一军团路近，首先抢渡乌江天险。待红三军团渡江时，就没有打仗，顺利通过。红一军团突破乌江后，即直扑遵义，于1935年1月7日攻占遵义城和桐梓。红三军团则进至遵义以南的懒板凳（南白镇）、刀靶水一带，一边休整部队，一边打土豪、扩军。当时大家都盼望着早日进入四川，因为进入贵州以后，感到这个地方太贫穷，

部队在这里难以立足和发展。

1935年1月中旬，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扩大会议。周恩来、王稼祥、张闻天等多数同志在会上支持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意见，批判了博古以及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严重错误，通过了《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决议”指出，敌人第五次“围剿”未能被粉碎的主要原因，是以单纯防御代替了决战防御，以阵地战、堡垒战代替了运动战。“决议”还从正反两个方面总结了红军反“围剿”战争的经验教训，肯定了毛泽东同志在领导红军长期作战中形成的基本原则，决定立即恢复过去红军作战的基本原则，保持红军的高度机动性，以便粉碎敌人的新围攻，创建新苏区，争取革命战争的新胜利。会议决定取消三人团，增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遵义会议以后，根据这次会议的精神，中央政治局常委进行了分工，由张闻天负总的责任，以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军事指挥小组，全权指挥军事。我没有参加遵义会议，是会后听的传达。我对在最危急的关头解决了军事路线和军事指挥问题，重新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红军中的领导地位，心中非常高兴，感到中央红军又有了希望。可是，我对这次会议只谈军事路线而不谈政治路线问题不能理解，尤其是对没有明确确立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而深感不安。当时我虽然没有讲出来，但这个问题在我的脑子里考虑了很久也未得到解决。直到后来红一、四方面军会合又分离，同张国焘分裂主义作斗争的过程中，我才认识到，遵义会议上毛泽东同志把问题处理得非常得体，表现了他的雄才大略和政治远

见。假使遵义会议上提出解决政治路线是非问题，短时期内肯定解决不了，形势又不容许长时间争论不休，久拖不决。当时面对的主要问题是战争，解决军事路线问题是当务之急，刻不容缓。另外，暂时不谈政治路线是非，只解决军事路线问题，也便于为原在中央执行错误路线的同志所接受，有利于党中央的团结一致。事情的发展，证明了这样做确实是英明之举。后来张国焘搞分裂，党中央的同志形成了一个坚强的整体，团结一致同张国焘的分裂主义作斗争；而张国焘则完全陷于孤立，其阴谋分裂党和红军的企图终未得逞，使红军又一次转危为安。至此，我对遵义会议只解决军事路线问题而不谈政治路线是非的处置方法心悦诚服，脑子里再也不纠缠这个问题了。政治路线的解决，是在七年之后的延安整风运动中，那时才具备了解决这个问题的一切条件，因此，解决得非常彻底，使全党全军达到空前团结一致。

中央政治局遵义会议的召开，是长征以来迈出的艰难而关键的一步。这一步的迈出，是我们党和红军发展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使广大指战员在迷茫之中看到光明，受到了鼓舞，增强了信心。回顾长征所走过的这一段路程，是有许多教训值得记取的。当初中央作出放弃中央革命根据地这一重大决策时，是比较仓促的。事先缺乏认真的计划、部署和思想组织准备。这样大的事情，不仅没有向中央苏区的人民群众作必要的交待和解释，就连红军广大指战员也心中无数。部队几乎是刚从火线上拉下来，就仓促上路。出发时，像搬家一样，什么东西都想带着走，

使得部队臃肿不堪，步履艰难，后来不得不忍痛丢弃在路上。像瞿秋白、何叔衡等一批名声很大、在白区很难立足的同志，却没有随主力红军行动，让他们留了下来，结果纷纷遇害牺牲。当时留在中央苏区的部队约占中央红军总数的三分之一，亦属没有必要。留下来领导坚持苏区游击战争的人选也欠周密考虑。其中项英同志缺乏作战经验，陈毅、贺昌同志负伤未愈。这三位同志都不是江西本地人。本地有作战经验、与群众血肉相连的领导人，都在几次肃反中被杀掉了。这样，就使中央苏区在坚持游击战争过程中遇到了极大困难。留在中央苏区的红军部队后来受到了重大损失，贺昌同志牺牲，项英、陈毅等同志转移到苏区与白区交界地区才得以保存下来。闽西的情况稍好一些，那里的领导人张鼎丞、邓子恢同志都是本地人，他们对龙岩、永定家乡一带的情况非常熟悉，在人民群众中生根立足，使闽西这块革命根据地得以坚持下来，并且保存了有生力量。此外，长征选择走广西这条路线也是一个失策，使我军一开始就陷入腹背受敌的险境，损失了大批有生力量。当时我军若以一部分兵力经湖南中部佯攻长沙，吸引湘敌，而我军主力则可从衡阳插过湘鄂西，与贺龙同志的红二军团会合。这样就可以避开桂敌，并使我军在湘鄂西根据地取得休整时机。然而，由于遵义会议之前这一段，红军的指挥权控制在李德的手中，以致有如此重大的损失。

这里还需要补述一个问题。在主力红军开始长征之前，中央曾先后派出两支先遣部队先行出发，以期调动和牵制

敌人的兵力，为主力红军的战略转移开辟道路。首先出发的是以红七军团（军团长寻淮洲、政治委员乐少华）组成的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于1934年7月自瑞金先向福建挺进，经长汀、大田、尤溪、水口、直逼福州近郊，继而转战闽东、闽北，向浙江挺进。11月初，北上抗日先遣队进入闽浙赣边根据地，与方志敏、刘畴西领导的红十军会师后，奉命组建红十军团，以方志敏任军政委员会主席，刘畴西任军团长，乐少华任政治委员。11月中、下旬，红十军团分两路向浙皖边和皖南行动，同绝对优势之敌苦战两个多月，损失严重。1935年1月底，红十军团在返回闽浙赣边地区时，被敌人合围于怀玉山地区而散掉。这支北上抗日先遣队经半年远征，一路与敌苦战，虽然消灭了一部分敌人，但并没有达到大量调动和牵制敌人之目的。最后自己陷入敌人重围之中，经顽强战斗，终因寡不敌众，弹尽粮绝，指战员大部壮烈牺牲，方志敏同志不幸被俘，后在南昌英勇就义，寻淮洲同志亦在战斗中英勇牺牲。红十军团余部由参谋长粟裕、政治部主任刘英率领，突出重围，转战至浙南，后与叶飞同志所部会合，才得以保存下来。红十军团政治委员乐少华在突围中负伤，自行离队回到浙江家乡，直到抗日战争爆发，才重新出来到了延安。乐少华到达延安不久，就赶上整风审干。解放战争前夕，他被派到东北搞基层工作。后来又听说要审干，他怕再次挨整，因而产生了恐惧心理，遂自杀身死。刘英同志后来担任了浙江省委书记，在抗日战争时期被国民党中统特务抓捕杀害。

另一支先遣部队是1934年8月从湘赣边根据地出发的红六军团，军团长肖克，政治委员王震，以湘赣省委书记、中央代表任弼时为军政委员会主席。红六军团在湘赣边根据地南线的衙前、五斗江之间突围后，向湘西挺进。经两个多月的转战，于10月下旬到达黔东，与贺龙同志的红二军团会合。红二、红六军团在贺龙、任弼时等同志的率领下，继续向湘西发动攻势，以策应中央红军长征。后来，红二、红六军团创建了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以后红二、红六军团合编为红二方面军，以贺龙为总指挥，任弼时为政治委员。

遵义会议以后，中央决定移师北上，拟在泸州上游的兰田坝、大渡口、江安一线北渡长江，进至四川西北部创建新的根据地。为了实现这一意图，红三军团率先出发，向土城、赤水方向前进。宿营时，担任掩护任务的第五师突遭黔敌王家烈部袭击，使部队受到一些损失。第五师师长李天佑因此而被撤职，由彭雪枫接任第五师师长。第五师旋与军团直属队一起行动，由第四师担任掩护任务。当时敌王家烈部队紧紧咬住我军不放，我们边行军边打仗，还得寻找吃的东西。每前进一步，都需要付出很大代价。由于张宗逊师长负伤，第四师即由我一个人负责指挥。当时最大的困难是没有地图，需要花费很大气力侦察地形，摸索前进的路线。后来我们集中杨勇、王平同志的两个团向尾追之敌发动了一次猛烈反击，将敌击溃。王家烈的部队战斗力不强，但爬山的本领极高。我们将其击溃之后，他们跑得飞快，我们追了好一阵子，也没有追上。但经过

这一次反击之后，敌人不敢紧紧追赶了，只是远远地跟在我军后边跑。

1935年1月下旬，中央红军主力集结于赤水河边的土城东皇庙，与川军刘湘部队打了一仗。此役由红一军团担任主攻，我们第四师的部队部署在土城以东30华里处待敌。当时张宗逊师长已负伤住进卫生所，我又赶上害病躺在担架上。适逢朱总司令前来督战，看到部队疲惫不堪的样子，朱总司令非常恼火，对我大发了一通脾气。土城这一仗没有打好，我军受到一些伤亡。中央红军旋即西渡赤水河，向叙永、古蔺前进。这一路上尽是大山，满山遍野的桔树，枝头挂满熟透了的桔子，也不见有人采摘。我军经过川南进至贵州的扎西（今威信）时，刚刚过了春节没有几天。根据中央军委1935年2月10日关于缩编的命令，中央红军集结在扎西进行整编。红一、红三军团均取消师的建制，各缩编为四个团。红三军团奉命将两个师部撤销，全军团共编为四个团：原第四师的三个团分别改编为第十、第十一、第十二团；原第五师缩编为第十三团。缩编后各团的主官情况是：

第十团团长张宗逊，政治委员黄克诚，参谋长钟伟剑，政治部主任杨勇；

第十一团团长邓国清，政治委员张爱萍，政治部主任王平（后任政治委员）；

第十二团团长谢嵩，政治委员钟赤兵（娄山关战斗负伤后，由苏振华接任），参谋长孔权；

第十三团团长彭雪枫，政治委员李干辉（后为张爱

萍)，政治部主任黄春圃（江华）。

扎西整编后，编余干部被派到川南游击队工作。川南游击队队长名叫王涛，井冈山时期曾给朱德同志当过警卫员，后来部队开展反流氓习气时被清理掉了。王涛回到家乡以后，在川南拉起了一支武装，模仿红军游击队开展活动。中央红军长征到达川南时，王涛与红军取得了联系，并要求给予支援。于是，扎西整编中编余的几百名干部就到了他的游击队里去。记得红三军团派去的编余干部有原第六师政治委员徐策以及何宗周、曾春鉴等同志。中央红军离开以后，川南游击队被敌人消灭了，派去的干部都牺牲了，而这个王涛则叛变投敌了。

当时，湘敌集结重兵对我军进行追堵截击，并加强了沿长江两岸的防御。鉴于此种情况，中央决定暂缓执行北渡长江计划，改在川滇黔边实行机动作战。当各路敌军追踪而至并迫近扎西时，中央红军突然掉头东进，向敌人力量薄弱的桐梓、遵义地区进攻，于2月18日东渡赤水河，是为“二渡赤水”。这样，敌军主力即被甩在川南。当我军进至桐梓时，黔敌王家烈的部队已在娄山关占据制高点，对我军进行堵截。我军遂于2月26日对娄山关发起猛攻，以红三军团担任主攻：第十团攻敌左翼，第十二团攻敌正面。第十团首先突破敌左翼阵地，将守敌压下关去，并尾敌猛追了五六十里。不久第十二团也突破守敌正面阵地，敌人被迫退守关后一线阵地。我军再次发起猛攻，将敌击溃，并一直尾敌追至遵义城下，于2月28日凌晨再次攻克遵义城。我自从在苗寨木楼上烧毁了眼镜以后，就没有眼

镜戴了，行军打仗非常困难。尤其是与黔敌王家烈的部队作战，常常是要跑很长的路追击敌人。该敌一击即溃，但跑路快得很，我们总是追不上。娄山关和遵义两次战斗，虽然将敌人打败，但缴获不大，我们自己受到了不小的伤亡。第十二团政治委员钟赤兵和参谋长孔权在娄山关战斗中负了重伤，腿被打断。当时部队没有麻药，钟赤兵同志硬是咬紧牙关锯掉了一条腿。卫生部门决定将一批不能随军一起行动的重伤员就地寄养起来，其中包括钟赤兵和孔权同志。钟赤兵听说要他离开部队就地寄养，说什么也不肯留下来，谁来说服他都不听，并且还拔出手枪来要拚命。这样，只好把他放在担架上抬着走。由于他年轻，身体强壮，体力恢复得很快。过了不久，他就可以骑马了，用一条腿翻上翻下，跳跃自如，一直坚持随军到达陕北。孔权同志当时留下来寄养，以后就与部队失掉了联系。全国解放以后，我突然接到孔权同志的来信，知道他还活着。他在信中表示，虽然身体残废了，但还可以作点力所能及的工作，要求组织上考虑分配他作点工作。我把他的信转给有关部门以后，组织上安排他担任遵义纪念馆的馆长。第二次攻打遵义时，红三军团参谋长邓萍不幸牺牲，这是红三军团一个重大损失。邓萍同志是四川富顺人，黄埔军校毕业生，很早就参加了革命活动。平江起义前，党派他到国民党第八军独立五师第一团（时彭德怀任该团团长）作兵运工作。他先在彭德怀同志的团里当文书，实际上是负责该部党的工作。平江起义后，他历任红五军军长、红三军团随营学校校长、红三军团参谋长。邓萍同志是一位

很优秀的共产党员，牺牲时年仅27岁。他牺牲后，红三军团指挥员一直很怀念他。

中央红军再次攻占遵义之后，蒋介石调来敌吴奇伟、周浑元两个纵队向我进攻。我们第十团奉命向敌人发起攻击，一举攻下两座山头。不久，敌人又组织兵力反扑，我军被迫退了下来。接着，我们再次发起攻击，又将这两座山头上的敌人赶了下去。敌人仗着人多武器好，不断地组织反扑，敌我双方在山上山下反复攻夺，战斗进行得异常激烈。第十团当时有2500多人，善于打硬仗。我们乘敌人新的反扑被打退之机，组织部队勇猛追击。团长张宗逊和参谋长钟伟剑同志看我没有眼镜，跑路很困难，就让我带领少量部队守在山头阵地上，他们两个人率领第十团向溃敌猛追。当敌人发现我军的兵力并不多，便稳住阵脚，重新调整部署，向我追击部队反攻过来。因敌人兵力占绝对优势，攻势很猛，我第十团顶不住了，吃了很大的亏。张宗逊同志再次负伤，腿被打残，钟伟剑同志英勇牺牲。这时我身边只有两个班的兵力，用一挺重机枪守在一座山头上。敌人象潮水般压了过来，情知不妙，便对身边这两个班的战士们说：“我们一定要守住阵地，决不能后退一步！我们连续打退了敌人的数次进攻，坚持了两个来小时。但敌人仍轮番向山上冲锋，攻势越来越猛，情况已相当危急。恰在这时，陈赓同志率干部队赶到，接替了我们据守的山头阵地防务。陈赓同志告诉我说，红一军团已包抄了敌人的后路，敌人很快就会被打败。不大一会儿，我就发现敌人的阵脚大乱，纷纷溃退。我赶忙从山上下来，去收拢部

队。在山底下我见到林彪后只说了一句话：“好险啊！”林彪说：“你们当初守住山头就是了，不应该去追击。”并说：“当时红一军团已向敌人侧后包抄过去，我军已化险为夷；陈赓到了你那里时，敌人的败局已定。”说话之间，果然敌人已全线崩溃，林彪当即派一支部队去追击敌人。我建议他应多派些部队去追击。林彪说：“全线溃败之敌，已无斗志，我有少量精干部队追歼即可解决战斗，无需动用大部队。”就这样，溃敌一直被我军追到乌江边上，大部就歼。这次战斗，共歼灭和击溃敌人二个师又八个团，俘敌3000余，是中央红军长征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打乱了蒋介石的“追剿”部署。

我进了遵义城之后，找到一些报纸翻看，看到方志敏、寻淮洲、刘伯坚等同志的照片都登在报纸上。湘鄂赣省委书记陈寿昌、军区司令员徐彦刚同志牺牲的消息也登在上边。这时，我才得知留在中央苏区的红军部队损失严重，许多领导人或被俘或牺牲，而项英、陈毅等同志的情况则不明。看到这些令人痛心的消息后，我深为红军的安危担心。我当即找到一位领导同志谈心，讲了我的看法。我说，老根据地已被敌人摧残殆尽，主力红军又受到重大挫折，剩下的部队已经不多了，当前保存革命力量十分重要。应该尽量避免与敌人打硬仗，因为红军再也经不起消耗了。必须与敌人作战时，要注意掌握时机，作通盘考虑，并应找出打开新局面的办法来，等等。由于我长期以来就被批判为右倾，在这次同领导同志谈话中可能有些问题没有讲透，表达得不够清楚，因而反映上去以后，引起了误会。领

导上怀疑我缺乏信心，认为我不适宜继续担任领导工作了。于是，便把我调离所在部队，回到军团司令部赋闲。我这个人不愿意闲着没事干，就恳求领导分配我点工作。不久，任命我为军团司令部侦察科长。

中央红军离开遵义之后，进至鸭溪停留了两天，中央政治局开会决定继续向西行动。在这里，我认识了陈云同志。继之，部队经仁怀到达茅台，于3月16日再次西渡赤水河，是为“三渡赤水”。敌人为阻止我军北渡长江，又纷纷向川南调动兵力进行堵截。为进一步调动敌人，打乱敌人的部署，中央红军又于3月21日东渡赤水河，是为“四渡赤水”。旋即从敌军空隙中插过，向南疾进，渡过乌江，经息烽、修文，直逼贵阳。当时蒋介石正坐镇贵阳指挥“追剿”红军，我军突然逼近贵阳，使得蒋介石惊慌失措，急忙调集兵力进行堵截。在敌人尚未判明红军意图以前，中央红军已于4月9日从贵阳以东越过公路，向云南疾进。我军通过贵阳、龙里之间的公路时，曾与敌接触。当时红军子弹极缺，打仗非常困难，因此不敢恋战。先由红三军团在后面掩护，中央纵队和红一军团通过之后，再由红五军团掩护红三军团通过。红五军团的子弹更少，与敌稍一接触，就拚命向南奔跑，将红三军团的队伍也给冲乱了。我从未见到过红军部队象这样混乱地向后奔跑，一气跑了几十里，才好不容易将部队收拢住。随后，我军乘虚占领了贞丰、兴义等滇黔交界的几座县城，摆脱了尾追之敌，我军才得以停下来稍事休整补充。我已经半年多的时间没有戴眼镜了，这时才设法找到了一付眼镜戴上，尽管不大

合适，但总比没眼镜戴好得多。

我们离开贞丰、兴义后，部队即向西进入云南境内，红三军团抢先占领了沾益、寻甸。在沾益火车站我们缴获到一批待运的宣威火腿，正好解决了部队的给养补充。蒋介石发现中央红军已进入云南，急忙调兵遣将保卫昆明。我军却折向西北，乘虚直抵金沙江畔，兵分三路渡江。红一军团在东，红三军团在西，刘伯承同志率中央先遣队和干部团在中间。东西两路因没有找到渡船，未能过渡，中间一路于5月3日晚偷渡成功。刘伯承同志过江之后，找到当地保长，又搞来一批船划过南岸，红三军团和红一军团才次第过渡。至5月9日，中央红军全部渡过金沙江。至此，摆脱了数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

中央红军渡过金沙江之后，即进入到川南地区。红三军团随即奉命包围了会理城，对会理守敌川军刘文辉所部发起强攻。结果城未攻克，我军徒遭很大伤亡。本来我军可以绕过会理直接北上，不必要攻打会理城。决定强攻会理，是一个失策。我军被迫撤围会理，就在会理附近驻下。5月12日，中央在会理附近召开了一次会议，毛泽东同志在这次会上对刘少奇、林彪、彭德怀等进行了严厉地批评。因为在此之前，林彪曾写信给毛泽东，要求由彭德怀来指挥部队。刘少奇则是因为在贵州时，曾向中央建议，他认为革命正处于低潮时期，应该改变方针，不能再在贵州一带打圈子。我曾经同刘少奇同志在一起交换过看法，彼此意见颇相吻合。毛泽东同志批评这种观点是对革命丧

失信心，是右倾机会主义。

会理会议之后，中央红军继续执行北上计划。部队进至会理以北的德昌县时，红三军团召开会议，根据中央会理会议精神，着重批判部队中的右倾机会主义思想。会上不便对彭德怀同志直接点名批判，便把我拉出来狠批了一通。

中央红军在继续北上途中，很好地执行了党的民族政策，顺利地通过彝族区，先头部队于5月24日晚占领了大渡河南岸的安顺场。5月25日，杨得志同志的红一团选派敢死队抢渡成功。但由于水深流急，缺少渡河工具，在追敌日益迫近的情况下，大部队迅速过渡已不可能。乃决定留少许部队在安顺场继续渡河，主力则沿大渡河右岸北上，渡过大渡河的部队亦沿左岸前进，两路夹江而上，直取泸定桥。红军沿途击溃拦阻的敌人，于5月29日晨占领了泸定桥大渡河右岸桥头。是日下午4时，红一军团的红四团选派敢死队，冒着敌人密集的火力，强行越过铁索桥，攻占了左岸桥头堡，并就势攻入泸定城。红军后续部队紧跟过桥，迅速击溃守敌一个团，占领了泸定城，并与由左岸北上的红军部队会合。至6月2日，中央红军全部胜利地渡过了天险大渡河。随即进至雅安，攻占天全，于6月8日突破敌芦山、宝兴防线，占领芦山、宝兴县城。部队在这一带作短暂停留，准备过雪山。这一带气候寒冷，前一段因天气暖和，我把皮大衣丢掉了，感到非常后悔。这时还有的同志为了轻装，要丢掉皮大衣，我力劝他们不要丢，过雪山时用得着。如果早知道要过雪山、草地，部队的服

装、粮食、食盐等预先准备充足一点，在雪山、草地的牺牲就可能大大减少。但此时已来不及了。

我们爬的第一座雪山是夹金山。这座山看起来并不算高，海拔只有三千多米，但爬起来却感到非常吃力，个个气喘吁吁，每移动一步，都很困难。当地居民曾对我们讲，这山顶上有神灵，很少有人能过得去；爬山时不能讲话，更忌讳高声呼叫云云。由于我们刚刚进入藏民区，吃的东西还算充裕，体力消耗还不大。所以在过夹金山时，部队并未受到多少损失。

翻越夹金山之后，就完全是藏民区了。这时，红四方面军正由岷江地区分路西进，其先头部队在红三十军政治委员李先念率领下，攻占懋功（今小金）。6月12日，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之先头部队在达维附近胜利会师。至16日，中央红军全部到达懋功地区，两大主力红军会师。此时中央红军只剩下两万余人。

中央红军和毛泽东同志在红四方面军中有很高的威望。但是，这次两大主力红军会师时，由于中央红军大大削弱了，不仅人数不及四方面军多，而且服装不整，人疲马乏。红四方面军的一些同志一见这种情形，大失所望。当时红四方面军正处于鼎盛时期，兵力有八九万，人强马壮枪多。张国焘则不再把中央红军放在眼里了。根据当时的形势，中央决定继续执行北上方针。而张国焘却力主向青海、新疆或西康等偏远地区退却。为了统一思想，中央政治局于6月26日在懋功的两河口举行会议，于28日作出了《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该决定指

出：“我们的战略方针是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在运动中大量歼灭敌人，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中革军委据此制定了《松潘战役计划》，确定两个方面军乘敌军尚未集中之际，迅速夺取松潘及其以北和东北的道路，以利两大主力红军向北发展。张国焘在会议上表示拥护党中央的北上方针，会后却出尔反尔。他借口所谓“统一指挥”和“组织问题”没有解决，故意延宕红四方面军的北上行动。张国焘提出的这两个问题，进一步暴露了其心怀叵测。他所说的“统一指挥”问题，实质上是想乘机吞并中央红军，由他担任红军的最高领导者；所谓“组织问题”，是他企图逼迫中央从红四方面军中补选四名政治局委员，以实现其最终攫取党中央最高领导权的野心。中央鉴于当时的实际情况，为了加强两大主力红军的团结，于7月18日任命张国焘为红军总政治委员。21日，中革军委决定以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为红军的前敌总指挥部，由徐向前、陈昌浩分兼前敌总指挥和政治委员，叶剑英任参谋长。同时将中央红军的红一、红三、红五、红九军团依次改为第一、第三、第五、第三十二军；红四方面军的第四、第九、第三十、第三十一、第三十三军的番号不变，实行统一指挥。但是，张国焘见中央未予理采他的所谓“组织问题”，也没有完全按照他的意图解决红军的统一指挥问题，便继续阻挠中央的战略方针和战役计划的实施，致使红军失去了北出松潘的有利时机，而陷于十分不利的境地。博古曾当面批评张国焘自恃兵多枪多，目中无人，骄傲自大，无组织无纪律。但张国焘对此根本听不进

去。

两河口会议之后，我们又翻过一座雪山，到达卓克基。卓克基是藏民区的一座大镇子，镇子上有一座很大的庙宇，庙里有成千上万尊大小不等、形状各异的铜佛，但整座镇子里却找不见一个老百姓。因为在红军到达之前，藏民吓得跑光了。部队在卓克基未作停留，继续北上，经过梭磨，又翻越了一座雪山，进至黑水、芦花地区。部队在这一带作了短暂休整，一方面搞粮食，一方面打通芦花与红四方面军之间的通道，以便红四方面军顺利通过。这一带藏民居住的房子，是用石头砌成的三层小楼，楼下养牲畜，中间一层住人，顶层摆设经堂。我们来到这里以后，到处找不见一个当地居民。藏民纷纷躲到深山密林之中，或守候在据点里窥视红军的一举一动，偶尔还朝我们打冷枪，放冷箭。我好容易才找到一位藏民，通过翻译同他谈话，并招待他吃饭，再三向他讲道理、解释，以打消他的对立情绪，请他帮助红军筹集粮食以便过境。但是费了许多口舌，他就是不通，只有两句话：“不行！”“你们赶快离开这里，否则我们只有打！”由于得不到当地群众的支援，我们只好找到什么吃什么。我们设法弄到一批青稞，但水磨芯子被藏民破坏掉，无法磨面，就只好发动战士用手搓脱粒，然后把青稞粒炒干了吃。这时候我已经从侦察科调到教导营任政委，教导营长是彭绍辉同志，吴信泉同志任特派员。本来我们无需在黑水、芦花一带多停留，如果抓紧备足干粮，迅速北上过草地，大家的体力还可以坚持，过草地时就不致于那样艰难。但是，由于张国焘闹分裂，我们在这

一带滞留了一个多月时间，食物吃尽，身体拖垮。吃了炒青稞，再喝雪水，很难消化。尤其是肠胃不大好的人，吃下去之后，又原样排泄出来，拉肚子的人越来越多。直到8月上旬，我们才离开黑水、芦花，又翻过了一座较大的雪山，名叫沙窝山。这座雪山与夹金山差不多高，山势也不算陡，可就是爬不动。因为大家的体力已相当衰弱，只能勉强挣扎着往上爬。每爬行一步，都相当吃力。谁要是放任自己停下来休息一下，就再也动弹不得了。所以，大家互相勉励，尽量不使自己停留下来。尽管如此，仍然有不少同志没能坚持住，倒在路旁，就再也爬不起来了。一路上死亡相继，尸体比比皆是，惨不忍睹。

翻过沙窝山，就进入毛儿盖。由于夺取松潘的作战计划遭到张国焘的破坏，为了贯彻北上的战略方针，中央政治局于八月初在毛儿盖附近的沙窝召开会议（史称毛儿盖会议），通过了《中央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重申了两河口会议所确定的战略方针，对张国焘进行了耐心的批评教育，决定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继续经草地北上。但张国焘仍百般加以抵制。中央乃决定将红一、四方面军混编成左右两路军，兵分两路北上。徐向前、陈昌浩、叶剑英率红四方面军的第四、第三十军和红一方面军的第一、第三军（即红一、红三军团）为右路军，张国焘率领红四方面军的第九、第三十一、第三十三军和红一方面军的第五、第三十二军（即红五、红九军团）为左路军。中央随右路军行动，从毛儿盖地区出发，向巴西、斑佑地区前进；红军总司令朱德、总参谋长

刘伯承随左路军行动，从毛儿盖南下卓克基再向阿坝地区前进。

我们右路军从毛儿盖出发过草地，徐向前、陈昌浩、叶剑英同志率红四方面军的两个军走在前边，红一、红三军团的部队和中央机关随后跟进。在草地里走了大约个把星期的时间。茫茫草地，一望无垠，遍是水草沼泽，人迹罕至。在草地里行军，一不小心，就会陷入泥沼之中，愈陷愈深，人马俱没。草地里的气候变化无常，时而狂风大作，时而暴雨倾盆。休息时，只能就地而卧或坐着打盹。当时有一块油布用树枝架起来遮遮风雨，就算是极好的条件了。起初几天，吃一把炒青稞，喝一口冷水，还可以填饱肚子。后来食物断绝，只能靠野菜充饥。再后来连野菜也难得吃上，饥饿和疾病威胁着每一个人的生命。许多身经百战的英雄好汉，在战场上没有倒下去，却倒在了草地里，默默地死去。在艰难的跋涉中，死亡越来越多，尸体一路不断。记得有一天晚上休息时，突然风雨交加，气温骤降。用树枝架起的一块油布既遮不住风雨，也挡不住寒冷，大家只好在暴雨淋浇之下，过了一夜。还有一次，部队正在淌水过一条河，又突降暴雨，河水猛涨，急流滚滚，不少的人被大水冲走吞没。就这样，数不清的红军战士或陈尸草地，或葬身于激流，为革命英勇捐躯。

部队好不容易挣扎着出了草地，进入阿西、巴西地区，才找到了吃的东西。但当地藏民悉数跑光，到处找不见一个人。8月29日，徐向前同志率部在包座与敌人打了一仗，全歼企图堵截我军之敌胡宗南部第四十九师，并攻占了上

下包座，打开了通向甘南的门户。这时，我军本可以稍事休整后继续北上。但是，张国焘却加紧了分裂党和红军的罪恶活动，无理地要求中央及右路军退返草地，回到他所在的阿坝地区。中央急电张国焘速率左路军出阿坝向右路军靠拢，以便继续北上，并告诫他左路军滞留阿坝地区将有危险。张国焘一意孤行，顽固地对抗中央的北上方针，拒绝向右路军靠拢，并提出红军南下川康边的计划。张国焘又险恶地密令在右路军的陈昌浩乘机挟持中央和右路军南下。当时任右路军参谋长的叶剑英同志立即携张国焘的密电向毛泽东同志及党中央作了报告。党中央在巴西召开政治局紧急会议，研究对策，决定率红一、红三军团迅速脱离险区，先行北上，并再次电令张国焘“立即率左路军向斑佑、巴西开进，不得违误。”当红一、三军团迅即离开阿西、巴西地区之后，陈昌浩执意要按张国焘的命令派部队去追击，当即遭到徐向前同志的坚决抵制。徐向前同志义正词严地说：“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这才避免了一场红军之间的自相残杀。

当时红军大学随中央和红一、三军团行动。红军大学的教育长李特，是红四方面军的干部，学员中也有不少是红四方面军的同志。李特见红一、三军团单独北上，而徐向前、陈昌浩所率的红四方面军的两个军没有与中央一起行动，便要带领红军大学的学员向后边撤走，脱离右路军。为此，在红大学员中发生了激烈地争吵，有的主张随中央一起行动，有的主张南下回去找红四方面军。当时我们教导营担任全军的后卫，掩护主力北上，并负责收容掉队的同

志。我见李特他们要往回走，就劝说他们应当跟随中央北上，告诫他们南下没有出路。但李特根本听不进去，执意要南下。彭德怀同志得知这一情况之后，赶来指着李特的鼻子大骂他是反革命，并说要枪毙他。毛泽东同志的态度则非常从容镇静，对红四方面军的同志说：“我们先走一步，你们随后再跟上。”在形势非常严重、困难的情况下，毛泽东同志表现了一个革命家顾全大局的宽阔胸怀，对张国焘采取说服教育，耐心等待的方针，以求团结红四方面军的广大指战员。

我们在川甘边界翻过了最后一座雪山，到达拉界。部队在拉界休息的时候，毛泽东、彭德怀同志坐在一起，筹划着下一步的行军路线。最后确定部队沿白龙江前进，红一军团在前，红三军团殿后，次第进到俄界。9月12日，党中央在俄界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听取了毛泽东同志《关于与四方面军领导者的争论及今后战略方针》的报告，作出了《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该《决定》指出，张国焘公开违背中央的指令、分裂红军的行为是绝对不可容许的。“决定”号召红四方面军中全体忠于党的同志，团结在党中央周围，同张国焘的右倾机会主义和军阀主义倾向作坚决的斗争，以巩固党和红军。中央同时还电示张国焘，要他改正错误，率部北上。但张国焘却顽固地坚持其错误主张，并擅自命令左路军和右路军中的第四、第三十军南下川西南，企图在川康少数民族聚居区建立根据地。

俄界会议之后，中央决定将中央红军主力整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兼政治委员，

叶剑英任参谋长，王稼祥任政治部主任，杨尚昆任政治部副主任。陕甘支队辖两个纵队，原红一军团改编为第一纵队，由林彪任司令员，聂荣臻任政治委员，朱瑞任政治部主任，袁国平任保卫局长。原红三军团改编为第二纵队，由彭雪枫任司令员，李富春任政治委员，肖劲光任参谋长，罗瑞卿任政治部主任，张纯清任保卫局长。这次整编时，红三军团的第十三团拨给了红一军团，编入第一纵队建制。我所在的教导营编入军委纵队（也称第三纵队），由叶剑英任司令员，邓发任政治委员。

部队开始整编时，上级拟派我担任第二纵队政治部组织部长，因当时有位领导同志说我反对整顿纪律，历史上一贯右倾，不合作领导工作，因而作罢。说我反对整顿纪律，确有其事。那是在红军出了草地之后，中央派红一军团的几位领导干部到红三军团工作。红三军团在彭德怀同志的言传身教下，始终保持着艰苦朴素的本色，尤其是在长征途中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上下一致，官兵平等，领导的伙食和士兵一样，共同过着艰苦的生活。从红一军团过来的领导干部，有时在一块改善改善伙食。三军团有些同志就对他们这种作风看不惯，有些反感，下边的干部战士有时填不饱肚皮，就常常发点牢骚，讲些怪话；还有的同志饿得受不了了，偶尔违反群众纪律，偷吃群众的东西，也是有的。部队中发生的这类情况，本来是属于教育问题，有些还是情有可原的。但是，从红一军团来的领导同志却把这类问题看得过于严重，认为这是对革命丧失信心的表现，因而提出来要在红三军团整顿纪律和审查干部，对那

些被认为问题严重的人甚至要采取处死的办法予以惩罚。我当时对此提出了反对意见。我说，某些干部战士表现得情绪不高，发牢骚，这与领导者平时教育不够有关系，同时有些领导同志脱离群众，不能以身作则，对下面有影响，不能够完全责怪下边的同志。个别同志偶尔违反群众纪律，固然是不对的，但还是应以教育为主，不能采取处死的办法来对待。我们刚刚走出草地，大家已经被拖得精疲力竭，目前的情况仍然十分困难，马上进行整顿纪律和审查干部的工作，是很不适宜的。由于我提了上述意见，领导就认为我不可靠，不适宜担任领导工作，更不能带兵。所以，部队整编后，就让我担任军事裁判所所长。

部队离开俄界继续北上，翻越了岷山，向岷县方向前进。9月18日，我军又乘胜占领哈达铺，进入甘南。至此，我们才最后走出了藏民区。我们自5月中旬进入藏民区以来，就始终见不到一个老百姓，这对于一向同人民群众血肉相连、情如鱼水的红军部队来说，不免有些孤独之感。现在看到遍地都是老百姓，大家如鱼得水，高兴的心情实在无法用语言来形容。哈达铺的街上卖东西的很不少，记得当时一个馒头卖到五角大洋一个，虽然是太贵了点，但我看到经过长期饥饿折磨的红军指战员能买到吃的东西，可以饱餐一顿，还是高兴得不得了！

尤其令人高兴的是，在哈达铺可以看到报纸。从报纸上得知刘志丹、高岗等在陕北开辟了一块红色根据地，建立了人民政权。正是“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这真是一个突如其来的大喜讯，大家高兴得都跳了起来。这时，中央政治局在榜罗镇召开会议，正式决定以陕北作为领导中国革命的大本营。于是，中央遂率部向陕北挺进。陕甘支队加军委纵队这时只剩下近万人，另外红五、红九军团还有二三千人，正随左路军行动。我们从江西出发长征，艰苦跋涉两万多里，一路上连共产党的支部都很少遇到过，真没有想到会在陕北遇到一块革命根据地，这无异于绝处逢生，使大家受到极大的鼓舞。陕北革命根据地当时并不大，陕北红军也比较弱小，且处在国民党的“围剿”之中，要不是中央红军长征到此，陕北革命根据地要想坚持下来也是很困难的。然而，正是这块不太大的革命根据地，此时却起了关键性的作用，使中央红军得以站住脚跟，休养生息，重整旗鼓，为日后创建红色的首都、抗日的圣地，奠下了基石。刘志丹等同志的不朽功绩正是在这里。高岗后来犯了错误，但他协助刘志丹创建陕北根据地的功劳，是不应该抹杀的。

部队由于在哈达铺休息时间太短，体力消耗尚未得以恢复，所以，在向陕北进军途中，掉队的人一路不断。部队政治保卫机关则认为掉队与情绪不振作有关系，怀疑掉队的人会投敌叛变，于是，又采取残酷的惩罚措施。我当时任军事裁判所所长，上级机关把那些掉队的人抓起来交给我审判处理。我实在不忍心下手处理这些同志。记得当时有一位姓周的管理科长，以前在战斗中被敌人打掉了一只胳膊，因为在过草地时丢掉了几名伤兵，这时也被抓起来交付审判。我去找纵队司令员彭雪枫讲情。恰巧碰到政

治部门的两位领导同志，他们见我替被交付审判的人讲情，就把我狠狠地训斥了一顿，说：“你还当过师政治委员呢，连这点小事都处理不了，真不中用！”这样一来，我这个裁判所长自然就不起作用了，以后有关审判处刑的事情就不找我了。前次我因为反对整顿纪律和审查干部，已经使某些领导同志对我产生了极不好的印象，这次我又不愿意执行审判处理掉队者的指令，更引起了他们的反感。一位领导同志曾经毫不客气地说：“象黄克诚、吴溉之这样的人，年龄大了，干不了什么工作了，当个红军战士也不够格。”听了这个评语，我便不敢再讲什么话了，只得小心翼翼地随着队伍行军，生怕掉队而遭到处理。

部队继续向陇东高原前进，蒋介石调集胡宗南所部和东北军、西北军沿路对我进行堵截，我们只好一边与敌作战，一边行军。10月初在白羊城打了一个胜仗，歼灭了张学良东北军一部。随后，我们翻过六盘山，继续前进。这次行军走了很远的路才停下来宿营。我虽然疲劳已极，但还是咬紧牙关挣扎着往前走，直到夜里11点钟赶到宿营地才安下心来。幸而我当时年龄并不算大，刚三十出头，在窑洞里休息了一夜，第二天又能随队行军了。10月19日，我们到达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吴起镇（今吴旗县城），看到陕北红军张贴的标语和苏维埃的布告，感到十分亲切、兴奋。这时，敌人的一支骑兵追踪而来，我军组织了一次反击，将敌人击溃，还俘虏了一部分。我第十团团团长黄珍于此役牺牲。至此，中央红军主力历时一年，纵横11个省、行程二万五千里的长征，宣告胜利结束。此时中央红军主力只

剩下6000多人。

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之后，得知原鄂豫皖苏区的红二十五军在程子华、徐海东等同志率领下，已于同年9月到达陕北，与刘志丹同志领导的陕甘红军会合后，合编为红十五军团，徐海东任军团长，程子华任政治委员，刘志丹任副军团长兼参谋长，高岗任政治部主任。中共中央北方局（华北局）派朱理治、郭洪涛同志作为中央代表，已先于红二十五军来到陕北。当时的陕甘边和陕北根据地正处在外有敌军“围剿”，内有肃反扩大化造成的危险局面，刘志丹、高岗等一批干部被关押审查。至11月初，陕甘支队与红十五军团会师后，中央及时纠正了陕甘根据地肃反扩大化的错误，释放了刘志丹、高岗等一批受迫害、被拘捕的干部。中央决定将陕甘支队与红十五军团合编，恢复红一方面军的番号，由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兼政治委员。原红一、红三军团合编为红一军团，红三军团的番号从此正式取消。合编后的红一军团由林彪任军团长，聂荣臻任政治委员，左权任参谋长，朱瑞任政治部主任。部队整编后，于11月21日进行了著名的直罗镇战役，全歼东北军一〇九师，彻底粉碎了敌人对陕甘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为党中央把全国革命的大本营放在西北的任务，举行了一个奠基礼。

部队整编取消了红三军团的番号之后，我先被任命为军委卫生部长。两个月后，又调任红军总政治部组织部长。我在红三军团的战斗岁月，是永远难以忘怀的。无论是在残酷的反“围剿”作战中，还是在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艰难跋

涉中，红三军团先后有一大批同志为革命捐躯，他们的英雄业绩和光辉形象，永远激励着我献身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而义无反顾。在这里还使我想起红三军团中许许多多的无名英雄，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默默无闻地工作，奉献着自己的一切，往往需要克服许多难以想象的困难。尤其是在长征途中，最辛苦的要属以下三类人员：一是司务长、炊事员、后勤人员和医务人员，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他们负责给全军找饭吃、找药品，搞供给，医治护理伤病员等，所要付出的代价是不难想象的；二是侦察、测绘人员，部队行军作战，他们总是提前行动，千方百计探索行军路线，宿营时他们要测绘地图，不能马上休息；三是电台、电讯人员，他们要随时随地架线、拆线，发报、收报，始终忙个不停。若没有上述这些同志异常艰苦的工作，部队简直是寸步难行，更不要说同敌人作战了。这些同志虽然在一般情况下不直接参加对敌作战，但全军每一个战斗、战役的胜利，都有他们一份特殊的贡献。因此，称他们为无名英雄，他们是当之无愧的。

红三军团是一支战功卓著的英雄部队。在彭德怀同志的率领指挥下，这支英雄部队从她初创时期就以能打硬仗、打恶仗而闻名于全军上下，逐渐锤炼出所向披靡、无坚不摧、百折不挠的硬骨头作风。在五年多的艰苦转战中，红三军团涌现出许许多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在她那绚丽夺目的战旗上，洒满了无数先烈的热血。这些都是用笔墨难以尽述的。我的回忆，只是从一个侧面展现这支部队艰难曲折的战斗历程，从中可见一支人民军队艰苦创业、由小

到大、由弱到强的足迹。于此，当能体味出我们今天的胜利来之不易，需要加倍地珍惜。

(1986年8月)

从大革命失败到六届四中全会 期间几件往事的回忆

徐 彬 如

“四·一五”反革命大搜捕的前后

1926年3月20日，蒋介石制造了中山舰事件。这是蒋介石国民党右派争夺领导权向共产党进攻的信号。

中山舰事件发生时，我刚担任中山大学（以下简称中大）^①总支书记不久，很多内部情况，特别是黄埔军校的情况，我都不大了解。据说，3月20日清晨三四点钟，蒋介石突然宣布戒严，扣留了中山舰，逮捕了代理海军局长李之龙，调集大批军队包围了省港罢工委员会、省农民协会以及周恩来的住宅等地方。不仅收缴了罢工委员会的枪支和省农民协会农民自卫军的武器，而且还逼迫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的所有共产党员全部退出第一军，连苏联顾问团的住宅区——东山，也遭到军队的包围，守卫士兵的枪支也被缴了械。与此同时，蒋介石大耍反革命两面派手法，表示中山舰事件是“误会”，并于3月25日给国民党军事委员会递了呈

^① 中山大学的前身是两广高等师范，后改为国立广东大学，1926年改为中山大学。

文，假惺惺地要求处分，说中山舰事件“起于仓卒，其处置非常，事前未及报告，专擅之罪诚不敢辞”，以欺骗群众，掩盖事实真相。

对待这次中山舰事件，我们党内意见很不一致。有人主张反击，有人主张退让。当时陈独秀等人害怕统一战线的破裂，主张妥协退让，同意撤退在国民革命军中的共产党员，放弃无产阶级在革命军队中的领导权。毛泽东和陈延年等人是主张反击的。陈延年就对我们说过：“不能再让了，再让就不得了了。蒋介石会得寸进尺的。”陈独秀听说陈延年对处理中山舰事件持不同意见，便让周恩来单独去上海向中央汇报情况。据说陈独秀听了汇报后，对陈延年等人的主张很不满意，认为广东的党已经不听中央的指挥了。周恩来返回广州后，粤区区委立即召开会议，由他传达中央和陈独秀的意见。我参加了会议。记得中央的意见主要就是八个字，即“包而不办，退而不出”。陈延年等对这种模棱两可、界限不清的提法仍表示有意见，认为既包就不能不办，既退又怎么不出呢？不久，中央先后派张国焘、瞿秋白和彭述之等人到广州推行中央的路线，他们是奉陈独秀之命，来对付以陈延年为代表的粤区区委的。

4月3日，陈独秀在《向导》上发表了《中国革命势力统一政策与广州事变》一文，公开地称赞“蒋介石是中国民族革命运动中的一个柱石”，从而更加助长了蒋介石篡夺革命领导权的野心。1926年5月，蒋介石在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提出了“整理党务案”，规定共产党员在国民党中央党部、省党部、特别市党部任执行委员的人数不得超过

全体执行委员的 1/3；共产党员不得担任国民党中央各部部长；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须交出全部的名单等。针对“整理党务案”的问题，粤区区委于 5 月 23 日发表宣言，对右派蒋介石等破坏国共合作的企图提出强烈的抗议。号召革命势力团结起来，打倒反革命的分裂阴谋。对交不交共产党员名单的问题，粤区区委内部有过激烈的争论。赞成交名单的主要是党中央派来的一些人，反对的是陈延年等人。争论的结果，主张开名单的人占了上风。首先由黄埔军校开了名单，接着我们中大总支也开了名单。但是，我们没有把中大全部党员的真实姓名都开在名单上，有一部分开的是假名字。后来，国民党右派集团叛变革命后，中大特别党部改组委员会列送应处置的共产党分子名单（即通缉令）上，共有 400 多人的名字，其中学生党员有陈辅国、毕磊、徐文雅^①、吴炳泰、叶浩秀、区梦觉、潘考鉴、莫沧白、柯辉萼、夏占先、陈永丰和郭信坚等，教授党员有熊锐、王若怡等。教授许德珩，虽不是党员，也列上了黑名单。这份名单中虽然有真名有假名，还有重复的，但有些共产党员名单确是我们提供的。

北伐开始前，对于谁当北伐军总司令，我们党内有过很大的争论。我参加过党内的活动分子会议。开始时，很多人不同意蒋介石担任北伐军总司令，大部分同志同意李济深当总司令，因为他的态度比蒋缓和些。反对蒋当总司令最激烈的是黄埔军校的人。在我党还没有确定同意谁当

^① 即徐彬如。

总司令以前，黄埔军校教官高语罕首先在黄埔军校公开喊出“打倒新军阀”的口号。他虽然没有点出蒋介石的名字，但大家都知道他指的是谁。高为此事还受到党内的批评，说他不分时间、场合，过早地暴露了党内的秘密。黄埔军校的学生党员，绝大多数也是坚决反对蒋介石当总司令的。粤区区委对怎样才能搞好北伐，由谁担任总司令的问题，经过反复研究，最后同意蒋介石当总司令。区委决定后，立即在东皋大道省农民协会召开扩大的活动分子会议进行传达。参加这次会议的有二三百人，主要是黄埔军校的代表。其他如工会、青年团、学委会和妇委会等团体都有不少代表参加，我也参加了。记得这次会开了很长时间，从当天晚上7点钟开始，一直开到第二天清晨4点多钟。会上发言的人很多，首先是鲍罗廷做报告。他的报告很长，中心内容是讲北伐军总司令非蒋介石担任不可的种种理由。对他的报告，有些人表示同意，有些人表示不同意。有一位年轻的工会代表在会上发言说：“蒋介石是个野心家，他当了总司令，我们在座的人就有被砍头的危险。”接着黄埔军校的代表发言，表示支持这位青年的意见。最后是陈延年讲话。他首先表示同意那位青年工人的意见，然后又表示赞成蒋介石当总司令。他谈了两面，指出有两种可能性，两个前途：一个前途是，如果我们的策略正确，掌握得好，蒋介石当上总司令，可以形成各阶级联盟的政权，我们的力量就会得到很大的发展；另一个前途，假如我们搞得不好，蒋介石就要砍我们在座的这些人的头，中国必将陷入悲惨的境地，重新走向黑暗的道路。

蒋介石当上总司令后，表面上还不敢公开提出反共。因为他的反革命力量还不够强大，有些地方还需要依靠共产党。蒋介石为了表示和黄埔学生一样，故意穿上黄埔军校学生的服装，即穿短裤，穿草鞋和打绑腿。他胸前经常戴着“校长蒋中正”的白牌子，常到中大礼堂讲演。他常说：“谁反共谁就是反革命，谁反共就砍谁的头”。又说：“我听孙总理的。总理临北上时，把我叫去了，当面对我说：‘你是主张什么的？你要是主张听我的，你就要听鲍顾问的。我走后，鲍顾问就代表我，不听鲍顾问的话，就等于不听我的话’，”等等。蒋介石真是一个好话说尽，坏事做绝的两面派。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终于暴露出他的反革命真面目，在上海指使反动军警，袭击上海工人纠察队，占领总工会，疯狂逮捕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公开叛变革命。紧接着，4月15日，广东国民党右派也发动了反革命政变，到处进行大搜捕。大批的共产党员和工农群众遭到血腥的屠杀。

“四·一五”政变时，陈延年等均不在广州。因为从1927年3月中旬起，陈延年、苏兆征、邓中夏、彭湃等便先后离开广州前往武汉出席中共“五大”去了。粤区区委的工作，临时指定由赖玉润、穆青、刘尔崧、李森、周文雍和杨殷等共同负责，由粤区区委秘书长赖玉润负总责。3月下旬，广东的形势已非常紧张。对国民党反动派要搞政变，我们事先是有估计的。粤区区委曾召开会议，专门部署了应变措施，决定各部委设秘密点，负责人晚上要到秘密点住宿。但是会上虽然部署了，由于党的警惕性不高，不少

党员有麻痹思想，因而应变措施并没有认真贯彻。有的同志执行了几天，因对国民党存有幻想又怕麻烦便停止了。直到上海“四·一二”政变后，才预感到问题的严重性，又开始通知党的领导同志搬家或进入秘密点住宿，但是执行的仍不彻底。例如肖楚女当时因病住在东山医院，对他的应变措施就考虑得不够周到，以为在医院里可能会安全些。我采取的措施是临时由二楼学生宿舍搬到三楼教授宿舍许德珩的房间内（许已离开广州到武汉去了）。我原来住的房间搬去几位新党员：一个是夏占先，另一个是金仲华，再一个我忘记名字了。毕磊^①的警惕性更差，住在他原来的房间一直未动。“四·一五”当天，我和毕磊还在校外开了一天的会，到晚上11点多钟才回校。谁也没有估计到当天晚上就会出事。我们临分手时，还把第二天的活动商讨了一番，然后才回到各自住的地方去。我刚入睡不久，大约夜间2点多钟，广州警备司令方鼎英奉命派出大批军警开始了全市大搜捕，白色恐怖笼罩全城。金仲华慌慌张张跑上楼来告诉我说，国民党的军队冲进了中大，并包围了二楼的学生宿舍，夏占先被捕了。叫我赶快想办法躲起来。我也听到楼下右派学生头目和军警一起在嗥叫抓人，来不及穿外衣，立即跑到隔壁王若怡教授的房间里。王一见我那个样子，忙对我说，他的房内不安全，因副校长朱家骅认识他，知道他是共产党员，于是当即把我带到另一位教授的房间去。这位教授刚到中大不久，叫甚么名字我记不

^① 广州学生联合会和中山大学学生联合会负责人之一，中共党员。

清了，只记得他是刚从上海商务印书馆来的，和郑振铎相识。他对我很同情，答应设法保护我，让我躲进他的蚊帐内，装成睡觉的样子。出去时，故意把房门从外面锁上。第二天早晨，这位教授买回来很多吃的东西。他告诉我说，现在是“清党”，敌人的军警到处搜捕共产党人，肖楚女、毕磊、刘尔崧、李森和“中大”教授熊锐等被捕了。学校的老师和同学被捕的已有二三百人，全关在学校的图书馆内。他回来不久，又出去打听消息，到当天下午二、三点钟才回来。他一进门便告诉我说，今天下午，鲁迅等为营救被捕学生，冒雨回校，在大钟楼校务会议室召开会议，商讨营救被捕学生的事。会议遭到朱家骅的反对，未能取得预期的结果。鲁迅当即愤怒地离开了会场，表示对反动派迫害青年的罪行的严正抗议。他又说，在大街上还听到我被捕的传闻。

在这位教授的掩护下，我化装离开了学校，并很快的接上了组织关系。

脱险后，我秘密的住在学校外面。从此中大总支书记改由吴炳泰接任了。大约过了四五天，我和任卓宣分别得到通知，去武汉参加党的五大，因他和我都是中共五大的代表。他化装成卖药的商人由粤汉铁路去武汉。5月初，我化装成商人乘船去上海。后来听说，黄埔军校教官孙炳文是和我同乘这条船去上海的，他坐的大餐间在船上遇见了褚民谊。褚告了密，孙一到上海便不幸被捕，后牺牲在上海。我坐的是统舱，又化了装，没有被敌人发现，二三天后，平安抵达上海。在码头上，我顺利地 and 交通员张宝泉接上了关系。

张宝泉安排我住在一个秘密的地方，约住二三天，中央总交通霍步青才带我去北四川路安填坊见陈延年。陈延年此时任长江局书记，领导江苏，浙江和安徽等省工作。他见了我便说：“中共五大已经快结束了。你不要去武汉了，就留在上海工作吧。”第二天，总交通又带我到安填坊去见周恩来，陈延年和饶来杰（化名朱道）也在场。周恩来此时正在负责组织中央军委。饶来杰任上海军委书记，并参加中央军委工作。在中央军委工作的还有王尔琢。周恩来问了我一些广州的情况后，当即决定留我在中央军委工作。并指派我和王尔琢继续做争取李明扬的工作。我们党派人做李明扬的工作，从大革命时期在广州时便开始了。北伐前我在广州时，曾协助周恩来对李明扬的部队进行过改造工作。因李明扬是我的同乡，又有点亲戚关系，我的侄儿徐学曾当时就在他的部下任军需处主任。周恩来利用了这个关系，派我和我侄儿去做李明扬的工作。李原是赣军司令。后来，他的部队改编成国民革命军第三师，李任第三师师长，属国民革命军第三军，归朱培德领导。周恩来原提议派我去当该师的党代表，粤区区委不同意，改派王尔琢任三师党代表。北伐前夕，组织北伐军东路先遣军时，白崇禧任先遣军总指挥，李明扬任先遣军司令。为了加强先遣军的政治思想工作，我们党特地由黄埔军校选派了四十五六个学生党员（原计划选派50个），去先遣军任团、营、连的党代表。在李明扬的部队里，我党的力量很强，共有六七十个党员。徐学曾任政治部党的支部书记。先遣军的进军路线是经浙江到上海。当北伐军进军到浙江桐庐时，

我侄儿不幸牺牲，李明扬也负了伤，改由王尔琢代理指挥。他的军事才能出众，带领军队很快地攻进了上海。当时正是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的时候，王尔琢曾派军队支援过起义的工人。

先遣军出发前，蒋介石命令李明扬把他率领的东路先遣军中的共产党员名单全部开出来。李明扬没有完全照办，只把一些公开的共产党员开了名单，对原来赣军中老的秘密党员并未开名单。“四·一二”前夕，蒋介石秘密打电话给李明扬，命令李把他军队里的共产党员按名单全部扣押起来（其中特别点了王尔琢的名），听候处理。李接电话后，立即通知王尔琢等几十位共产党员赶快离开军队，而且还发给每人一份路费，给王尔琢2000元，其余的人有发500元的、300元的。清党开始时，蒋介石向李明扬要人。李推托说：“没有抓到共产党员，是打电话时有人偷听了。”弄得蒋介石哭笑不得，只好作罢。李明扬放走的共产党员都是开过名单的公开党员，没有开过名单的秘密党员，经过重新安排，仍留在军队里继续进行活动。

我刚到军委工作不久，周恩来有急事要去武汉，商讨组织东征军到江西讨伐蒋介石的问题，因路费一时解决不了，便派我去找李明扬想办法。我见到李后，说明周恩来要去武汉，缺少路费，请他帮助解决。他见到我很惊奇，以为我在“四·一五”广州清党时牺牲了。他毫不迟疑的当时就交给我500元现大洋。回来后，我把钱交给了朱道。路费解决了，周恩来去武汉后二三天，王尔琢也奉命去了武汉。不久，周恩来打电报到上海，让我也去他那里。他当时跟

随东征军已经到了河南驻马店。临行前，我去找陈延年商量怎样走的问题。当时他正在党的秘密机关开会。他要我走津浦路，转陇海路，经河南郑州，再去驻马店。谈完话，我走出楼房，就看见楼门外面有人鬼鬼祟祟在活动，不像平常的来往行人。怕出事，便赶快向外走，碰见了王弼，我向他示意有情况。他发觉后，没有再上楼。我回到住处，总交通霍步青正在等我，说陈延年等已经被捕了，让我赶快离开上海。

我去驻马店，除了去找周恩来外，还随身带去一份重要函件，即国民革命军李明扬、赖世璜、熊式辉和周凤歧等几位师长响应武汉政府东征的秘密信。他们一致表示拥护东路军，讨伐蒋介石。我在去驻马店的途中，得知武汉国民政府汪精卫集团公开地叛变了革命，大肆捕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了。我便不能再去驻马店，几经辗转又回到了上海。在上海码头遇到总交通霍步青，接上了组织关系。这时中央农委刚成立，急需干部，不久，我去中央农委工作，又开始了新的战斗生活。

参加顺直省委扩大会议

1928年10月，我随陈潭秋离开上海去天津。我们是乘船去的，坐的是官舱。同行的有四人：潭秋、徐全直（潭秋的爱人，她怀抱着两岁多的幼儿）、田杏梅（湖北蕲春人，詹大权的爱人，时詹已去天津工作）和我。在海上航行时间较长，我和潭秋谈论了许多问题，诸如对中国革命

的前途、有关北方党的情况、对陈独秀和陈延年父子的看法以及对刘少奇的看法等等。潭秋对刘少奇很敬重，说刘是老实人。我们谈论最多的是关于北方党的问题，因为我们这次去天津的主要任务是为整顿北方党和召开顺直省委扩大会议做些准备工作。我们临离开上海的时候，李立三曾对我们说：北方党目前比较乱，党中央在莫斯科已经研究过了。准备召开顺直省委扩大会议，任务是传达中央六大精神和整顿北方党的组织。中央决定派周恩来去天津主持顺直省委扩大会议，因为他对北方的情况比较熟悉。你们先去筹备，做些准备工作，为整顿好北方党的组织，开好省委扩大会议创造些条件。

在此以前，我对北方党的情况知道得非常少，只是这次在船上听潭秋向我介绍了一些，但有些问题，他也谈不太清楚。据他说，北方党的问题比较多，也比较复杂，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大革命失败后，特别是1928年上半年，由于北方局的领导人彭述之等犯了错误，领导机构被解散，多数基层组织处于瘫痪状态，这是造成北方党比较混乱的主要原因。另一个原因是由于闹经济问题。在国共合作的武汉政府时期，北方国民党（实际是共产党在领导）的党费预算是由武汉政府提供的。大革命后期，北方有几位老的国民党中央委员，如李锡九、江浩和于树德（他们都是共产党员）等，看到国民党可能要起变化，便趁国共尚未分裂之机用国民党的名义把这批经费全部从银行里提出来，转到北方局的名下。北方党的经费来源过去主要依靠第三国际的支援，大革命失败后，第三

国际的经济支援被迫大大减少。因此，北方有许多地方党的经费来源发生了恐慌，有些意志不坚定的党员，在白色恐怖下发生动摇。这些人不仅组织纪律涣散，並带头闹经济问题，要求平分国民党这批经费。彭述之作为北方党的领导人，对此问题的处理，不是从积极教育党员提高觉悟，努力克服困难入手，而是借口事关重大不敢作主为理由，进行搪塞和拖延时间。加上彭述之强调个人工作特殊，过着非常豪华的生活：他住的是高级宾馆，吃、穿任意挥霍，这就更加激起许多地方党组织的强烈不满，致使后来终于发生了分裂。分裂的具体情况我不太清楚，听说保南、保北成立了第二省委，京东也成立了反省委的组织。两派闹得非常厉害，使北方党一度陷于混乱状态。

到1928年六、七月间，省委对于如何改造顺直党曾作了长时间的讨论，最后报告中央，请求中央派员来帮助整顿。1928年6月底，中央巡视员陈潭秋到河北视察工作。潭秋将顺直党的情况及时向党中央作了汇报，並提出了处理顺直问题的具体意见，即《关于顺直党现状的报告》和《顺直省委党务工作报告》。党中央根据潭秋的报告，决定成立中央处理顺直问题特派员机构，指派陈潭秋、刘少奇和韩连惠三人为特派员。为了便于掩护和联系工作，曾一度从这三人的名字中各取一字（或字的谐音），称“谭少连”，作为省委的代号，代行省委职权，领导北方党的工作，并负责筹备召开顺直省委扩大会议。此时，省委所辖地区除河北省外，还包括山西的太原、陕西的西安、山东的烟台等地区 and 河南、热河、察哈尔等省。

1928年7月，北方党在中央特派员陈潭秋、刘少奇主持下，召开过一次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北平、天津、唐山、玉田、遵化、乐亭、张家口、石家庄、正定、晋县、隆平、献县等地党的负责干部15人，铁路总工会、省委及中央特派员参加会议者7人，旁听者4人。会议首先传达了中央关于召开顺直省委扩大会议的决定，接着听取并讨论了省委关于顺直政治经济状况的报告、顺直省委党务工作的报告。会议通过了《顺直目前政治任务决议案》、《党务问题决议案》、《职工运动决议案》、《农民运动决议案》等。会议临时决定改组省委，推举正式委员11人，候补委员3人。并推选常委7人，负责处理省委各项日常工作。后经中央批准，由中央委员韩连惠任省委书记，刘少奇、陈潭秋二人以中央特别处理顺直问题专员的名义常驻顺直省委，以加强中央对顺直省委的领导。上述有关北方党的片断情况，是在船上潭秋和我交谈的。

1928年10月中旬，我和陈潭秋抵达天津。到码头接我们的是省委秘书处郭宗鉴。这时北方局已经撤销，组织部和宣传部亦不存在，只有一个秘书处，下面设有办公室、油印科等办事机构。当时分工：韩连惠任书记，刘少奇管组织，陈潭秋管宣传，詹大权在秘书处。我到天津后在秘书处工作，同郭宗鉴一起住在机关里。陈潭秋带着爱人住在英租界一个居民区内。

我们到的第二天，潭秋便带我去见刘少奇和韩连惠。接着潭秋向刘少奇、韩连惠等人传达了李立三介绍的中共六大会议精神和中央关于召开顺直省委扩大会议的决定。

並一起研究了会议的准备工作。

当时各地保存下来的党组织，河北省有保南、保北等特委，另有北平市委、唐山市委，下面还有些县委，如遵化县委、丰润县委等；山东有淄博、济南等特委，烟台地区的军队中也有党的工作。此外，陕西西安、山西、热河、察哈尔等地也有党的组织。为了配合会议的筹备工作，决定出版一个党内刊物——《出路》，意即北方党的出路。该刊的第一期于1928年11月16日出版。陈潭秋写的发刊词（一说刘少奇写的——整理者注）。这个刊物是油印的，是技术科武竞天刻写的。周恩来（笔名伍豪）、刘少奇（笔名肇启）和陈潭秋都在《出路》上发表过文章，我也写过一篇。这个刊物的战斗性很强，内容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对顺直党的出路和怎样改造顺直党进行辩论，澄清对顺直党的认识，提出对整顿顺直党的正确意见；二是论述有关党的组织原则问题，向党员进行组织纪律和党的基本知识教育。另外还有些阐述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文章，鼓舞和启发党员群众的斗争勇气和革命意志。所有这些，对于提高党员的政治觉悟，加强党的组织观念，坚定革命信心，认清革命前途都起了积极的作用。该刊共出版了五六期（一说出版了13期——整理者注），1929年8月31日停刊。“文化大革命”中天津大学的人向我调查情况时，我从他们那里还看到了《出路》的第二期。他们说是从保定地区倒塌的房屋墙壁中发现的，不知现在保存在何处。

我初到天津，主要任务是参加顺直省委扩大会议的筹备工作。陈潭秋的工作作风踏实、认真，要我们多从调查

研究入手。他强调先清理和阅读材料，后到基层去调查。潭秋把有些特委、中心县委、县委给北方局的报告，让大家传看，了解情况。因此，这期间我看了许多地区送上来的报告。如保南、保北、直南（大名府一带）、京东（包括唐山、玉田、丰润、迁安）等地的。其中有些报告写得很有水平，给我的印象较深。从这些报告中看，在大革命时期，北方党的工作还是做得很有成绩的。虽然有些党组织遭受到几次的大破坏，但当时的北京、保定和张家口等地的党组织依然有相当的基础，在津浦线，平汉线、京奉线也有一定的基础。

我们看了一段时间的材料后，便决定分头到基层去跑一跑，调查一些实际情况，以便进行研究。当时，河北省是这样划分地区的：从天津起，沿津浦线附近，叫直南特委，包括沧州、大名等地；沿平汉线分保南、保北特委；平绥线从北平到绥远，包括北平市委在内；从北平以东沿京奉线叫京东地区，包括唐山、玉田、丰润、迁安、滦县、秦皇岛等地。据此，我们进行了分工。一共分成四路：第一路是去保南、保北、直南等地，这个地区的基础好，工作比较扎实，决定由陈潭秋去。第二路是去京东，调查重点是唐山、玉田、丰润、迁安等县，刘少奇对这些地方比较熟悉，决定由他去。第三路是去北平、张家口和平绥路一带，是派我去的。第四路去津浦沿线沧州、大名等地，是韩连惠（他是沧县人、原是津浦线的铁路工人）去的。

大约10月下旬，我到了北平，到车站接我的交通是女师大的达素娥。她带我去见了北平市委书记李培良。接上

关系后，李培良向我介绍了北平党的情况。他说：北平还有不少党的基层支部，北大有支部，西直门火车站也有支部，女师大有小组。李培良为了让我能全面的了解情况，先是介绍大革命时期保存下来的个别的上层人物和我交谈，然后再让我参加一些基层的支部会。我开始参加的是北京大学的党支部会，这个支部有30多位党员。我前后去那里参加过几次支部会，发现他们中间有些党员的思想相当混乱，“左”的右的情绪都有。以后，李培良又带我到工厂去了解情况，到过西直门车站，参加过铁路职工的支部会。这个支部有十几位党员，表现都不错。12月初旬我由北平返回天津。

1928年12月20日左右，陈潭秋接到上海打来的秘密电报，说周恩来受党中央的委派，从上海乘船来天津传达“六大”会议精神和领导召开顺直省委扩大会议。要派一位恩来熟悉的同志去码头迎接。原来决定派刘少奇去接，因他临时有事不能去，潭秋便改派我去码头迎接。潭秋向我交待了恩来化装的特征和接头的暗号。我于当天下午3点多钟便去码头等候。约4点多钟，一艘从塘沽直接开进天津市海河码头的轮船缓缓的靠了岸，在下船的人群中，走着一位留着八字胡，头戴礼帽，身穿长袍和黑缎子马褂的“富有商人”，我一眼便认出来他是周恩来，他也很快地认出了我。一见面，他说：“你也在这里，什么时候来的？”我说：“刚来不久，比你先来两个月。”

在附近饭馆吃饭后，我陪恩来先到长春旅馆（现滨江道117号）去见“交通”。这里是党的秘密机关，不少参加扩

大会议的代表住在这里。以后我送恩来到日租界一家高级宾馆的二楼楼上的套间里住下,约定好第二天我们去汇报。第二天上午,我带领韩连惠、少奇、潭秋、张昆弟和郭宗鉴等人到恩来住处,向他汇报北方党的工作和顺直省委扩大会议的筹备情况。经研究决定,扩大会议定于12月下旬召开,並进行了分工。大会的政治报告由周恩来负责起草,主要传达“六大”会议精神,会议其他文件由陈潭秋主持起草,我参加这项工作。组织、人事和代表资格的审查工作,由刘少奇负责,詹大权协助。关于参加会议的代表名单问题,刘少奇提了个名单,陈潭秋也提了个名单,周恩来提出,参加过“六大”的北方党的中央委员均可参加会议。此后,我们一面积极起草文件,一面研究参加会议的代表名单。开始提出参加会议的代表大约有五六十人,恩来的意见是以40人左右为宜,人多了容易暴露。经反复研究,最后确定代表43人,除“六大”北方党的中央委员外,其他代表只有30人。去掉的代表有河北省某些特委和县委的领导人,原北方局组织部、宣传部的同志也去掉了一些。

1928年12月底,顺直省委扩大会议在天津正式召开。大会会场是由郭宗鉴、詹大权等负责安排布置的,地址在法租界内张庄大桥兴义里附近的两排平房里。这是上海地产公司新盖的房子,尚未住人。附近有个澡堂,不远的地方还有个教堂。参加会议的人员,除“六大”北方局的中央委员和顺直省委委员外,地方代表有直南的郝清玉(大名人,农民)、张兆丰,保属的阎廷弼,京东的李运昌,还有唐山的老鞠怀、王德政和李静。王德政是从苏联回来的华工,

是唐山的代表。李静是唐家庄矿的代表。老鞠怀去过法国，当时是唐山、天津的交通员。后来，老鞠怀和李静都叛变了。此外，北平、天津、石家庄、张家口等地党的负责干部也参加了会议。代表都是经过周恩来最后批准的。

大会由周恩来(代表党中央)、刘少奇、陈潭秋负责主持。首先由周恩来作了长篇的政治报告，传达了中共六届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接着他指出：此次会议的总方针是贯彻中共六大路线，即“积蓄力量，以待时机，争取群众，开展斗争，迎接革命新的高潮。”並强调指出：要贯彻党的“六大”精神，实行“六大”的路线，必须肃清过去政治上的一些偏向，因为这些偏向都是与“六大”的总精神和路线绝对不相容的。在会上，刘少奇根据顺直党的情况作了几次重要讲话。陈潭秋也在会上讲了话。会议大约开了五六天(一说三四天——整理者注)才结束。当时，大家对北方党的看法有些分歧，潭秋认为北方党有基础，同南方相比较，白色恐怖对党组织的摧残和破坏並不十分严重，主要问题是党的上层领导闹不团结。他肯定的多些，看法比较全面。刘少奇认为，北方党有些党员严格讲不够党员条件，本位思想比较严重，不顾党的利益，闹经济问题，闹分裂。其他代表对北方局的工作也提出了一些批评意见。周恩来基本同意潭秋的看法。大会根据“六大”决议的精神，结合顺直党的具体情况，通过了一些重要决议，其中有《顺直党的政治任务决议案》、《顺直省委党务问题决议案》、《顺直省委职工问题决议案》、《顺直省委农民运动决议案》、《顺直省委青年运动决议案》和《顺直省委妇女运动决议案》等。所

有上述决议案，在通过前，均由周恩来作了审阅。大会最后进行了选举，正式成立了顺直省委。

1929年1月10日（一说11日——整理者注）晚7点多钟，周恩来在天津佛照楼主持召开了省委第一次常委会议。出席的人不多，我也参加了。会上进行了分工：韩连惠任顺直省委书记，陈潭秋任宣传部长，我协助他工作，张慕陶（又名张金钊、金刃）任组织部长，郭宗鉴任省委秘书长。会上因张慕陶的问题发生很大争论，有几位代表坚决反对张慕陶当组织部长，认为此人作风不正派，爱吹牛拍马和假积极等。对此，周恩来作了些解释和说服工作，最后大家才算勉强通过了。会上还决定刘少奇调离北方，去上海工作，彭真去莫斯科学习。于此同时，还宣布成立了军事委员会、职工委员会、农民委员会和妇女委员会等组织。并任张兆丰（中共六大后补中央委员，曾作过冯玉祥部下的师长）为军委书记，郝清玉为农委书记，张昆弟为职工委员会书记，秦兰英（张昆弟的爱人）为妇委会书记。

原计划还要恢复天津市委的，但是，周恩来考虑再三，认为以暂不恢复为好。他建议可先成立区委，把天津划为几个区，由省委直接领导，这样便于开展工作。

1929年1月中旬，刘少奇离开天津去上海中央工作。不久，周恩来也回上海去了。周恩来在天津时，我曾向他汇报过在天津出版党内刊物印刷困难的问题，他答应回上海后想办法解决。不久，中央便派毛泽民到天津来了，也是我去接的。同毛泽民一起来的还有他的爱人钱希均（细君）、孩子和毛主席的侄子毛远跃。毛远跃就是派来负责印

刷的。他们来到天津后，我领他们同省委技术科负责人纪廷梓接了头。没过多久，他们便租到了一所房子，办起了地下印刷所。这个印刷所起过很大作用。当时不仅承担印刷省委机关刊物《北方红旗》的任务，而且还翻印了许多上海出版的中央机关刊物，如《布尔什维克》和其他党内秘密文件等。

顺直省委扩大会后，省委根据中共六大的决议精神和顺直省委的决议，选派了一些干部分头到下面去传达和贯彻会议精神，同时积极地开展整顿和恢复各地党的组织的工作。经过一段努力，不少地区党的工作得到不同程度的恢复和发展。于此同时，党的干部也逐渐得到了充实。先是党中央从上海派来一些由苏联回国的留学生，有胡锡奎、王鹤寿等，以后又由别的省市调来了一些干部。记得由山西来的有薄一波、张友渔、李予昂（又名李遇安）等，由西安来的有乔国桢、刘天章等。薄一波被分配到军委工作，张友渔和李予昂分别派到伪天津市政府和公安局里从事秘密工作，刘天章派到天津《商报》任主编。当时乔国桢分配什么工作我记不清了，后来，我调到天津河北区任区委书记时，他同我在一个区里工作。

在天津从事职工运动

1928年12月底，即顺直省委扩大会议快要结束的时候，周恩来代表党组织号召青年知识分子党员到基层，到工厂去开展工作。我响应号召，要求第一批下去。经省委批准，

被派到天津小刘庄裕源纱厂去组织下边区区委。

当时，省委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决定暂不恢复天津市委而先恢复区委。我记得一共有五个区委，其中三个区委的名称至今我还记得，即：以小刘庄裕源纱厂为主的下边区委，以恒源纱厂为主的河北区委，以西楼五村为主的河西区委；另外两个区，一个以佟家楼裕大纱厂为主，一个以市区租界为主，区委的名称已记不清了。

和我同去小刘庄的有韩玉蓉（后改名韩钟秀）。她原是河北保定女子师范的学生，1924或1925年入党，是北方党早期的共产党员，后由保定调到北京，在李大钊同志领导下工作。1926年党送她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8年和王鹤寿等一同回国。她被分配到顺直省委宣传部工作，刚从上海到天津，适逢恩来发出号召，在她的要求下，省委批准她去下边区，和我同行。

下边区委成立时，我（当时名徐文雅）任区委书记，韩玉蓉任宣传部部长，李鸣秋任组织部部长。

不久，玉蓉不愿留在机关工作，要求到工厂车间劳动。经研究，同意她去裕源纱厂做工。这时我正好也在裕源纱厂和裕大纱厂做恢复党组织的工作，常同玉蓉在一起商讨工作。由于两人志同道合，在不断的接触中，逐渐地建立了感情，后经彭真介绍，我们结成了夫妻。

我们在工厂，一面参加车间劳动，一面以工会名义在工人中开展工作。当时工厂有两个工会，由共产党领导的工会，工人们称“老工会”，也叫赤色工会；由国民党领导的工会，工人们称“新工会”，也叫黄色工会。傅懋公（即

彭真) 曾经是老工会的领导人, 很多工人对他很崇敬。当我们初到工厂的时候, 一些老工人就向我们打听傅懋公的消息, 询问他的情况。我们经常碰到人问: “您是和傅懋公一起的吗? 是老工会的吗?” 当回答说“是的”时, 他们就显得非常亲热。有一次, 我遇到几位石家庄大兴纱厂的老工人, 他们也向我打听傅懋公的情况, 足见彭真在工人中的影响之深。我把这些情况向陈潭秋作了汇报, 并建议他向中央写报告, 请求中央同意彭真先不去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 暂留天津工作。潭秋说, “彭真去苏联学习是恩来代表党中央作的决定, 现在提出留下他恐怕不合适。这样吧, 张慕陶快要到天津了(他参加‘六大’后正从苏联回国途中), 他是组织部长, 由他向中央请示比较合适。”张慕陶来后, 我们又向他说明了上述意见, 请他向中央提出请求, 同意暂留彭真在天津继续工作。他当即给上海党中央发了电报。不久, 中央来电, 表示同意。于是, 顺直省委决定, 彭真和靳子涛(即金城)均留在天津市区工作。他们活动的主要地方是裕源纱厂和裕大纱厂。彭真不但把过去同他有过关系的老工人介绍给我们, 还帮助我们做恢复工会的工作和党组织的工作。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 恢复了党的工作, 发展了一二十个新党员, 成立了支部, 其中有一个党员还被推荐参加我们区委的工作。

到1929年上半年, 不少工厂党的恢复工作搞得很有起色。经过整顿, 先后恢复或重建了一些支部。可以说整个河北省党的工作, 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恢复和发展。但是, 正当恢复工作顺利开展的时候, 中央某些领导人又搞“左”

的政策，还派来一位特派员——袁炳辉到天津来贯彻。这位特派员是青年团的，为人跋扈，是个十足的“钦差大臣”。他一来便命令顺直省委搞公开的罢工斗争，而且还要求搞总罢工。我们对他采取的对策是：你开会我们听，你走后仍按原计划进行。他的一套做法，实际上当时在工厂里也不易行通，有些老工人很反对。记得天津裕源纱厂有两位工人领袖，一个叫刘思通，一个叫张凤文，他俩在大革命时期参加过多次的罢工斗争，比较有斗争经验，对这位特派员的做法表示过不同意见。但是后来他们顶不住袁炳辉的压力还是屈从了。

我们为了应付起见，开始也搞了几次小型的经济罢工，有些罢工斗争还取得了一定的胜利。但是袁炳辉不同意我们这样搞法。他认为罢工时机已经成熟，要求大干，要搞公开的总罢工。对此，陈潭秋、彭真和我都不同意他的看法。我们认为工厂的组织工作刚刚恢复，群众基础还比较薄弱，如果搞公开的罢工斗争，不但胜利的把握不大，而且还容易暴露自己的力量。可是袁炳辉完全不考虑客观的实际情况，一意孤行。他为了推行他的那一套“左”的东西，竟撇开我们，以中央名义，直接到工厂去布置罢工斗争。我得此消息后，立即去陈潭秋住处，向他汇报袁炳辉在工厂的活动情况。我们一面谈工作，一面用玩麻将做掩护。后来时间晚了，我没有回工厂，当晚便住在潭秋那里。第二天，袁炳辉在裕源纱厂的一个工房里召开罢工动员会议。开会的时间定为当天上午9点，要求全体党、团员和工会代表都要参加，并通知陈潭秋和我也要准时参加会议。因

为我们俩头天睡得太迟，早晨起来晚了，加上潭秋又有早晨洗澡、修脚的习惯，所以耽误了些时间。快9点多了，我们俩才赶到小刘庄附近。刚到那里，我便发现有公安局捕人的囚车停在村子外的路旁边，当即告知潭秋：“你看呀，那边停了一辆囚车，可能要出问题。”他听了不以为然。我说：“我有经验，在上海遇到过几次敌人搜捕我们的同志，都是将囚车停在一旁，然后去捕人。这一带地方你不熟悉。你跟着我走好了。”我们向前走了不远，便发现迎面来了一群人。我赶快让潭秋装着买烟先到附近一个小铺里去躲一躲，然后，我一个人又继续向前走。没走多远，便看见李鸣秋了。他走在这一群人的前面，身两边各有一个彪形大汉。那时逮捕人，一般都是两个巡警挟着一个人走。我一看这种情况，知道一定出事了，赶快返回小铺子里，拉着潭秋从另一条路溜走了。潭秋因为两眼高度近视，他什么也没有看见，所以我拉他走时，他还将信将疑，不知道出了什么事。等我们回到机关，不大一会，“交通”跑来告诉我们：裕源纱厂的党组织被破坏了，捕走了不少同志。李鸣秋、袁炳辉、刘思通和张凤文等均不幸被捕了。潭秋听了后，感慨地对我说：“你的眼睛真狠，看得真够准的了。”

从此以后，我不便在下边区工作了，因为一方面我所工作的基层组织遭到了破坏，很多同志被捕；另一方面，这地区有很多工人认识我，不易隐蔽，容易出事。经组织决定，让我暂留省委机关负责一些事务性的工作。

1929年三四月间，开滦五矿（由唐山、赵各庄、林西、马家沟和唐家庄五矿组成）的工人，因向资本家要求增加

工资和改善待遇遭到拒绝，举行罢工斗争。为了加强对罢工的领导，顺直省委决定我以顺直省委特派员的身份到唐山参加领导这次罢工。我是和小吴（南开大学学生）同去的。张昆弟和吴雨铭也先后被派到唐山去布置过罢工斗争：张昆弟做工会工作，吴雨铭做青年团工作（吴后来叛变了）。

新顺直省委成立前，唐山市委书记是刘毅，湖南人，到过苏联，同刘少奇比较熟悉。在安源工作时，当过安源煤矿党的书记，曾领导安源路矿工人进行过斗争，在顺直省委扩大会议上因托派问题被撤职了。新的省委决定派原北平市委书记李培良为唐山市委书记，并派郭大姐（郭隆真，大名人，后在青岛壮烈牺牲）到唐山任市委秘书。我到唐山时，刘毅还没有离开，但已经停止工作了，我代表顺直省委对他的问题做了处理并打发他去上海。

开滦五矿工人是有斗争传统的。特别是唐山南厂，是个制造火车车箱的大厂，党的工作基础好，老党员多，党的支部和党的生活都比较健全。这个厂南方的工人较多，大都来自上海和广东等地，工人文化程度也较高，一般都有小学程度，有的还是中学生。这里建党很早，出了许多干部，在全国各地工作。赵各庄的党组织也比较强，有几十个党员。其次，唐家庄和林西党的组织也有发展，党在群众中有相当威信。唐山是工人运动比较先进的地区之一，我们党很早便开始重视这一地区的工人斗争。听说在1923、1924年间，邓中夏、赵世炎等党的领导同志都曾先后到过唐山从事革命活动，指导工人斗争。

我到唐山时，罢工已经发动起来了。最先发动的是唐家庄、林西和赵各庄。这次罢工主要是经济斗争，即要求增加工资和改善待遇。那时，国民党黄色工会在唐山工人中还有很大影响，他们企图夺取这次罢工斗争的领导权。刘毅任唐山市委书记时，反对做黄色工会的工作，主张赤色工会独立活动。新的唐山市委不但主张大力组织和发展赤色工会，而且还主张利用黄色工会，争取参加进去做分化瓦解工作，夺取它的基层组织，使之成为掩护我们公开活动的场所。我们的具体做法是：一面揭露帝国主义和中外资本家对工人的残酷剥削和政治压迫，以提高工人的政治觉悟；一面揭露国民党黄色工会对工人的欺骗、敲诈和勒索等行为，教育工人认清只有赤色工会才是真正代表他们利益的。经过我们做工作，赤色工会的势力日渐壮大，到后来连矿警都畏惧三分。

我和小吴为了深入矿区，接近工人，同矿工们一同住在“锅伙”里。那时矿工们的生活非常苦，在“锅伙”里都是不穿衣服的，卫生条件很差，跳蚤和虱子多极了。矿工们每天除了牛马似的下井劳动外，什么文化生活也没有。矿工上井后经常去的地方就是说书馆。我们考虑这是接近和发动工人的好地方，便和青年团唐山市委书记尹才一（又名尹士修，山西人）商量，决定派小吴去赵各庄说书馆跟一位说书师傅学说书。小吴很聪明，他一面为师傅做些杂活，一面留心听师傅说书，很快地也能说上一段两段了。于是我们通过说书馆，利用小吴说书的机会，来发动和组织工人。经过一段努力，很多工人提高了阶级觉悟，增强

了团结和斗争的决心。到后来在矿工中我们还发展了一批新党员。在这次罢工中，首先发动起来的是赵各庄的工人群众，他们同敌人斗争的决心表现得非常坚决。其次是唐家庄，这个矿老工人比较多，他们对党的感情比较深。记得有位老工人叫王福庆，他和他的老伴帮我们做了很多事。在罢工期间，唐家庄罢工指挥部就设在王福庆家里。那时，由于敌人检查很严，矿井周围不准随便通行，我们向井下散发传单和传达工会指示非常困难，一般人无法完成这项任务。王福庆便让他的老伴领着他们三四岁的小女儿，利用捡煤核作掩护，把传单和工会指示藏在装煤核的筐底下，工人下井时，把传单送到井下去。

在这次唐山五矿罢工过程中，我们不仅利用了国民党黄色工会，领导了罢工斗争，而且还争取了不少工人自动脱离黄色工会，参加到赤色工会中来。在罢工斗争一开始，国民党黄色工会也曾派人参加罢工领导，但是通过我们的宣传工作，工人们的觉悟提高了，很快地便识破了黄色工会领导人的阴谋诡计，不听他们那套虚假的宣传，使他们陷于孤立的地位。在罢工开始时，反动当局曾出动了大批矿警，企图镇压这次罢工，但是，敌人不但没有把罢工斗争镇压下去，反而更加激起罢工工人的斗争决心，使罢工浪潮越来越高涨，迫使资本家方面最后不得不同意谈判，答应工人提出的条件，增加工资和改善待遇。这次罢工斗争坚持一个月左右，“五一”后取得了胜利。

唐山是个比较繁华的城市，当时有“小天津”之称。罢工时我们都在小山接头。我在唐山呆了两个多月，直到罢

工取得胜利，主要任务完成后才离开唐山。

1929年五六月间，天津党组织遭到大破坏后，北方党的工作一度陷于停滞状态。不久，上海党中央派卢福坦（山东籍，工人）来天津恢复党的工作，任顺直省委书记，委员有韩连惠、张金刃、李子芬、郝清玉等。

我在唐山完成任务后，没有直接返回天津，根据顺直省委指示，作为巡视员到京东去视察农村情况。1929年7月，我离开唐山去京东，首先到丰润县，在丰润县车轴山中学（简称车中）住了两个晚上。车中在丰润县城南和唐山市西北一座孤立的小山上，离唐山、丰润等县城均有一段距离，地方比较偏僻，不大引人注目。因此，在白色恐怖严重时，有些共产党员在京、津暴露了身份，不能再继续工作时，便逃到这儿来教书或工作。此时，车中已建立了党支部，书记是一位英文教员，名字忘记了。教员和学生党员有七八个，他们在学生中的影响很大。

丰润、玉田等县的农民运动此时仍有一定基础，因为这一带地方很早便开展过农民运动，像江浩、俞方舟、俞兰田等人，都是当地非常有名的农民领袖。

我到丰润时，京东的吕职仁和叶善枝也在丰润，由他们俩带我到农村去视察。当时有的农村还有党支部，但多数党员的革命积极性不太高，这大概与农民暴动失败有关。我们在农村视察得很仔细，每到一个地方都要住上几天。有时找农民个别访问，有时秘密召开座谈会，询问农村各方面的情况；有时我还向他们介绍革命的有利形势和发展前途，以鼓励他们的斗争信心。

我由丰润到了玉田，又由玉田到了迁安，在这几个县一共视察了二三个月，了解到不少情况。我发现冀东人民受李大钊的影响很深，他们对李大钊非常崇敬和怀念，传说大钊就义时，“天鼓”响了三声。他们相信革命将来一定会胜利的。

1929年八九月间，我从京东回到了天津。此时，顺直省委书记仍是卢福坦，组织部长是李子芬，宣传部长是陈复（国民党陈述仁的儿子）。我被委任为省委秘书长，负责交通联络和行政工作。在省委机关工作不久，由于我的请求，又到基层去开展工作。

1929年10月，我被派往天津河北区任区委书记。负责组织的姓刘，外号叫刘织布，是天津织布厂的工人。河北区管辖的地方主要是从大胡同到小王庄的恒源纱厂一带，其中还包括塘沽地区。此时恒源纱厂已建立了党支部，党的基础比较强。有党支部的地方还有天津织布厂、天津造币厂和天津第一师范等。我在河北区工作期间，曾派黄其光和组织部长刘织布去塘沽开展地下活动和寻找塘沽保存下来的地下党员。他们经过一段艰苦的活动，终于找到了七八个从1924年就在塘沽活动的地下党员。这些党员大都分散在久大，永利和塘沽码头上。永利是党在塘沽活动的中心。后来，我还亲自和黄其光去过塘沽，并在塘沽码头上的一个工棚里召开过地下党员汇报会。会上，听取了他们活动情况的汇报，讨论建立党支部，建立工会、同黄色工会斗争和组织年底闹“花红”等问题。

河北区委的工作重点以小王庄的恒源纱厂为主。我是

和乔国桢一起到区委工作的。我们经常深入到恒源纱厂车间同工人一起劳动，借机和他们接近，交朋友。我们工作一段时间后，工人的斗争积极性有了一定的提高，党在厂内的活动也逐渐得到恢复和发展。到1929年旧历年底，为了提高工人的生活水平，我们发动了一次年终双薪（即“花红”）的斗争。这次斗争主要是依靠工厂委员会，通过赤色工会发动群众进行的。开始是秘密进行，后来逐渐地发展到半公开化，正当斗争顺利进行的时候，由于内部出了叛徒，斗争遭到失败。我也因此于1930年1月19日被捕入狱。敌人严刑逼供，我的腿被敌人压杠子压断了，但敌人没有从我这里得到他们所需要的一点口供。后经党组织营救，我被判了6个月的徒刑，于1930年10月被释放出狱。此时，顺直省委已经改为河北省委，所辖地区仍和顺直省委相同。一天，省委宣传部长陈复代表省委找我谈话。陈对我说：“上海中央已经来电，让你速去上海医治腿伤，工作等到上海再考虑。”于是，10月底我即同我爱人一同乘火车离开天津去上海。

一次深刻的历史教训

1930年10月，我乘车平安抵达上海。车一到站，中央交通霍步青便到车上来接我。他对我的腿伤很关心、问我怎样了。还说：“周恩来已经交待了，先让你在上海治腿，等你腿治好了再分配工作。”这期间，霍步青多次带我去医院，请了一位法国医生给我治腿，包要200元医药费。当时，

我一面治腿，一面过组织生活。我被编入上海中央直属小组，与陈绍禹（王明）等编为一组，组长好像是向忠发。我爱人韩钟秀听说我们同王明编在一组，表示不大满意，因为她在莫斯科和王明是同学，了解他的一些情况。她告诉我：“陈绍禹为人很不正派，喜欢拉拉扯扯，他在莫斯科东方大学任中国留学生支部书记时，曾带头组织宗派集团进行派别活动。”

此时，王明住在上海老闸桥一家广东饭馆亭子间内，我们常在他那里开小组会。我以前不认识他，第一次是霍步青带我去的。在王明处，我见到了博古、向忠发等人，因为我们都编在一个小组。当时，上海中央正处在三中全会反立三路线以后，四中全会召开之前，情况相当混乱。我曾通过总交通霍步青向中央提出反立三路线的意见书，但始终未得答复。

王明在这期间活动比较频繁，主要是反立三路线和散布对三中全会的不满。他曾向我们宣传他如何反立三路线，说三中全会反立三路线不彻底，没有按国际路线解决问题；他强调说，他与共产国际有直接联系，共产国际是支持他的，共产国际对李立三很不满意；他恭维我们有斗争经验，说反立三路线主要要依靠我们这些老同志，他们年青，工作经验少，希望我们多多地发挥老同志的作用等等。王明还透露，鉴于三中全会没有解决问题，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等人准备召开中共中央紧急会议，彻底解决立三路线问题。还说，会议可以到苏区开，也可以到江西庐山开。后来不知为什么改变了。

王明对我的腿伤的医治很“关心”。几次向我表示，他

在上海有关系，他表弟在上海南京路开金器店，如果需要钱，可以请他表弟帮忙。他还说：“李立三对老同志不照顾，周恩来怎么也不关心你的腿？”我当即回答说：“周恩来等领导同志对我非常关心，已经请了一位法国医生正在为我治疗。”对王明说的这些话，我当时仅意识到他是有意地对我表示“关心”，并不认为他还有别的企图。因此，当我爱人几次提醒我，说王明这个人不可靠，千万不要上当当时，我仍认为他理论上有一套，对共产国际情况了解的多，又有共产国际支持，让他参与领导中国革命也无不可。我爱人坚决反对，认为我这种看法不对。她说：“王明这个人很会耍手腕，善于拉一派打一派。他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时，对女同志采用的手腕是拿钱去收买一些人为他工作。”

王明这时正在写“两条路线”，即后来所谓的《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的小册子。我每次去时，他总是——边讲，一边让我看他写的稿子。王明很能讲，讲起来滔滔不绝，理论是一套一套的。后来，小册子写完了，让我谈对他这本小册子的看法，我借口自己理论水平不高和没有认真阅读过，谈不出中肯意见，搪塞几句便过去了。我说：“我们党已有十多年的历史了。大革命时期，我们在广东从事党的活动时，主要强调集体观念和组织观念，从来不讲个人的作用如何。”王明听了，以为我这话是指他的言行而说的，开始对我产生了戒心。后来，我们的小组分开，见面就很少了。

不久，我的腿痊愈。中央原决定我和韩玉蓉一齐去苏

区做工会工作。但是，没过几天，霍步青却来通知我说：“满洲省委书记陈潭秋听说你已出狱到了上海，打电报给中央询问你的工作情况，如果尚未安排，请求中央派你去东北工作，中央已经同意。”我说：“派我到哪里去都可以，我和潭秋很熟，去东北当然好了。”正要准备动身去东北时，霍步青又来通知我说：“中央正在准备召开会议，已通知满洲省委派人前来参加了。如果来不了，便让你代表参加会议。”又说：“你先不要急着去东北，待开完中央会议一块走，传达就省事了。”又过了几天，东北代表唐宏经（东北工人，时任北满特委书记，现名唐韵超）到了上海。有一天，霍步青带他来我处同住，并转告我说：“王明说了，东北代表唐宏经已经来了，徐文雅可以不参加会议了。”当即便将唐又带走了。次日早晨，唐才回来。他一见到我，便先问我和王明熟不熟。我说：“不太熟。前不久，我们一块过组织生活时才认识。”接着他向我大发牢骚，他说：“我到上海已经六七天了。前四五天，没有一个人来和我接头，直到昨天到你这里来以前，交通才通知我去参加会议。我到了会场后，才知道召开的不是中央紧急会议，而是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尤其令人气愤的是，我刚到会场便宣布散会了。实际和未参加会差不多。”他又说：“你知道吗？王明这个人很会耍手腕。他在莫斯科中共六大会议上担任翻译时，整天围着米夫的身边转，一副溜须拍马相，看着令人讨厌。听别人说，这次四中全会就是陈绍禹等人用突然袭击的办法召开的。他们背后的支持者是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等人。米夫等人的目的是想扶植陈绍禹等人上台，以便建立一个完全

听从他们指挥的中央领导机构。会议只开了一天，从头至尾都充满着激烈的斗争。特别是临宣布散布会前，争吵得更加激烈，动椅子，掀桌子，几乎打起架来。最后，会议在米夫等人的操纵下，还是实现了共产国际扶植陈绍禹等人上台的预定目的。”唐宏经的话引起了我的愤怒，越想心情越激动。我曾身受过右倾机会主义、盲动主义、立三路线各种错误领导之害，联想到王明向我所讲过的一些话，开始对王明不满，对四中全会也有些意见。当时我还会见了一些老同志，他们对四中全会和王明等人也有类似的看法，认为党的领导权已经被莫斯科回来的学生夺去，有些老同志被排挤下来了。他们为党担心，认为立三路线本来就够“左”的了，王明等人还指责李立三的错误实质是右，强调应继续揭发立三路线的右。这样下去，将来执行的路线能正确吗？

这期间，罗章龙、何孟雄、李求实等人积极进行反四中全会和王明的活动。到处议论纷纷，传说不一。有人告诉我：“李求实和您一起在广州工作二年，您们熟悉，要同您商谈反四中全会的问题，来旅馆找您几次均未找到。”接着，唐宏经又找我谈。他说：“我已和罗章龙等取得联系，商谈过反四中全会的问题，一致认为我们不能让莫斯科回来的学生来领导中国革命，我们应有自己的组织。”在谈话中，他对罗章龙表示很推崇，说罗反四中全会和王明很坚决。恭维罗又能干又有办法。还说罗章龙等已经联名写报告给共产国际了，要求共产国际撤换米夫等人，重新派代表来中国主持召开中央紧急会议。唐宏经还告诉我说，罗

章龙想约我谈谈。我经过考虑后表示同意。唐遂即安排我和罗章龙会面，地点在上海中南旅馆，在座的有李大汉、何孟雄、李求实、韩连会和徐锡根等人。我到时，他们正在讨论问题，彼此争论得很激烈。他们争论的中心问题是有关四中全会的问题。他们除了坚决反对王明等人操纵召开的六届四中全会外，还对某些代表在会上的表现很有意见，认为这些代表完全不应该支持王明上台。我等了片刻，罗章龙才邀请我同他单独谈话。我们俩谈了近三四个小时。谈的内容很广，涉及问题很多。他首先谈到和王明的关系。罗说：他以前和王明反对立三路线是一致的，两人曾在上海外滩黄浦公园内商谈好的：准备召开中央紧急会议，解决立三路线问题。没想到他们会如此狡猾，竟然搞了个突然袭击，临时宣布召开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使许多到会代表都感到很突然。其次，他说，王明原有一批情报资料，以前常送给他看。后来对他也保起密来，不再给看了。接着，他和我谈了些有关四中全会的情况，所谈内容大致和唐宏经向我介绍的差不多，也是说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等人如何利用职权将王明扶植上了台以及他们如何反对四中全会等等。罗还说，他曾亲自找米夫谈过，反对王明担任党中央的领导职务。米夫解释说：“王明在共产国际工作时间较久，有经验，对共产国际的路线比较熟悉。他虽然对国内的经验少些，但我们相信在领导中国革命斗争中是会得到锻炼的。”罗说，他当即表示反对：“我们不能拿中华民族四万万同胞的命运让他来学习、锻炼。我们自己有人，自信可以领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罗向我夸耀说，不

但在国内有许多中央委员支持他，而且在国外也有人支持他。目前有不少地区的代表反对四中全会：不仅上海和武汉等地区的同志反对，而且苏区来的代表也对四中全会有意见。又说：“党正处在一个非常时期，我们不应听任王明等人的随意摆布，已经在原来持反对意见的中委基础上成立了一个非常委员会。参加的人都写了声明书，表明反对王明等人召开的四中全会。”他劝我也写份声明书，表明态度，支持他们反对四中全会的斗争。我当时向罗表示，自己对四中全会虽然有意见，但是不同意分裂党。因此，我没有立刻写声明书，答应回去考虑一下再说，后来也没有写。我和罗章龙分手时，他动员我要尽早行动起来，并让我和唐宏经迅速离开上海去东北，开展反四中全会的活动。

次日，召开满洲问题委员会，交通带我前往参加，到会的只有关向应一人，会未开成。关同我进行了恳切的谈话，他说：“周恩来正在到处找您，想和您谈谈，并问您是否已经写了声明书交给了罗章龙。”我说：“我还没有写声明书，正在考虑；和罗章龙仅见了一次面，谈了些问题。他动员我赶快和唐宏经一同去东北开展活动。”我还把对四中全会的看法和担心王明等人领导中国革命会把党和革命搞垮等意见一一向关向应谈了。当时他一再劝我不要如此匆忙作出决定，对此问题，应持十分慎重态度，更不要马上急着去东北。最后，他向我提出忠告：“我们这个党不能分裂，要顾全大局，应该以团结为重。您们这些老同志在党内这么多年了，举足轻重，关系甚大，不可轻信别人。”约

我明天同周恩来谈谈。并说：“您们比较熟悉，会对您有所帮助。”可周恩来一直也没抽出时间和我谈话。

关向应和我的谈话在我思想上引起很大矛盾。我正在犹豫不定中，唐宏经由外面返回旅馆。本来召集开会时也有他，他故意不去。他一见到我，便很着急地对我说：“现在反四中全会的同志到处遭打击和迫害。何孟雄和李求实等人在东方旅馆突然被捕，有人怀疑是被人出卖的。我们住的地方和东方旅馆很近，因此非立即离开上海不可。”唐坚决要我和他一同去满洲，并说去东北可以不用介绍信，他有办法，保证无问题。唐还说：“罗章龙已经把我们去东北的火车票买好了，是今天晚上的。他催我们赶快走，并决定由全总交给我们二百现大洋。”就这样，我和唐宏经、韩玉蓉三人带着现大洋坐上火车，匆忙地离开上海去了东北。在车上，我想了很多事情，想了王明的一些谈话和活动、罗章龙说的一些话和关向应的一些话，开始认识到我们这样匆忙地去东北是有些不妥的。我对唐宏经说：“咱们的行动恐怕是有些太快了，连个组织介绍信也没带，怎么能行呢？到了满洲省委，他们不接待我们怎么办？”唐回答说：“没关系，我是代表满洲省委出席四中全会的，他们不会不承认吧。只要他们承认我，您们还怕什么呢。”我说：“现在的情况不同四中全会前了。咱们不可盲目乐观。”唐问我：“您不是也写过声明书了吗？”我说：“我不知道，我没有签过字。”他说：“那天在旅馆里他们给您写的，我是在这以前写的。咱们的态度不是很明朗吗？”我问唐宏经：“罗章龙这个人究竟怎样？”他对罗章龙很忠诚，仍然推崇备至，赞

不绝口。还是我爱人看问题比较客观。她说，“我们这次行动是不符合组织原则的。”唐听后也没再说什么。

我们到达满洲省委所在地——沈阳后，果然没出我的所料，满洲省委只承认唐宏经一个人。说我和韩玉蓉没带组织介绍信，不予接待。他们召集的会议，也不让我们参加。唐宏经在省委扩大会上作了反四中全会的报告后，东北的党就不承认唐宏经了，也不让交通和我们联系了。这一来，我们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因为我们带的钱已经用得差不多了，老住在旅馆内不是办法。于是唐宏经找我和韩玉蓉商量，说他想先回哈尔滨去。因为那里他比较熟悉，开展工作比较方便。相信会有很多同志支持他的。他把我们夫妇安置在一个新的住处后便走了。走之前我们约好了：他到那里工作稍有进展便给我们来信，决定我们是不是也到那里去。谁知他走后，我们在沈阳左等右等，不但没有接到他的来信，而且连他的消息也没有。他走时也没留通信地址，想同他联系也没有办法。此时，我和上海也失去了联系，只有在沈阳坐等他的归来。

这期间，詹大权因个人关系来找我（他是我在广州中山大学时，介绍入党的）。此时，他在满洲省委组织部工作（一说是省委秘书长——整理者注），安排我和满洲省委代理书记刘焜（后改名赵毅敏）会面。会见开始时比较和平，后来，刘焜要我写声明书反对罗章龙，反对非常委员会，承认错误和停止反四中全会的活动。刘还说我是非常委员会的成员。我说：“我承认来东北时未带介绍信在组织上是错误的。但是，我不知道有什么非常委员会，我

也不是非常委员会的成员。让我写声明书，承认错误是可以的，但有些问题必须讲清楚：第一，我完全是为了爱护党，从政治上来认识四中全会的，怎么能说我是反四中全会呢？因此，要求保留我认为四中全会并未解决立三路线实际工作中的问题及四中全会后中央有宗派主义的意见。第二，我同罗章龙过去毫无关系，也不认识。只是在上海时，他约我谈过一次话，别的没什么接触。自我离开上海到东北后再没有联系过。由于我对四中全会和王明有意见，因此，当罗章龙等人反对王明和六届四中全会时，我表示支持过他们。但是，我并没有同他们发生过任何组织上的关系。我和罗章龙之间，对有些问题的看法并不一致，比如，我是不赞成组织分裂和进行派别活动的等等。”当时，我同刘焜争论得很激烈，彼此各不相让，最后不欢而散。

过了几天，他们又来找我，传达六届四中全会后的中央给满洲省委和刘焜的一封信。他们也让我看了信。信上说，开完六届四中全会后，中央原来打算找徐文雅和唐宏经一块谈谈东北的问题，然后，再让他们去东北的。谁知没等谈问题便找不着他俩了。王明明知道我们已经到了东北，但来信却还问满洲省委，唐宏经和徐文雅是否去了东北。说：“如果已经到了，你们应动员他们速回上海继续谈问题。”此时，刘焜已接到六届四中全会的决议，他取出来让我看，我根据决议谈了许多意见。我说：“四中全会决议基本上没有肃清立三路线“左”的思想，我对王明领导的中央能否贯彻正确路线表示怀疑，将来很可能会更‘左’。我要

求从政治上保留意见，承认自己参加了罗章龙反四中全会的活动和未带组织介绍信便与唐宏经来东北进行活动等，实际上是一种分裂党的错误行为。对于如何从政治上保留意见，我们争论了很久。后来刘焜还是接受了我的声明书。刘焜要我立即停止分裂党的活动，速回上海，并答应给我写去中央的介绍信和给我去上海的路费。当时我还不知道唐宏经已经被捕，以为他仍在哈尔滨进行活动。因此我要求去哈找唐宏经商量，争取他能和我一同去上海；或者我们先来沈阳谈清楚某些问题后再去上海。刘焜说，不行。并一再表示我和唐宏经两人的问题，必须分开处理，并说：“假如您坚持己见，一定要去找唐宏经，我们便把您的关系转了。”我自信有霍步青（中央总交通）与我约过的特殊通讯处（即上海同昌车行，车行老板的女儿是霍的爱人。这个点极其秘密，只有少数几个人知道，是专做应急用的，不到万不得已时不准用这个点），他们无法断绝我与党的联系，遂愤然而去。

次日，我到了哈尔滨，没有见到唐宏经。当时接待我的是位女同志，名叫黄玉珍，安排我住在特委机关内。我了解到唐宏经回到哈尔滨后，经过他的活动，有很多同志支持他的观点，起来反对四中全会和满洲新省委，特别是反王明的空气更浓厚，致使哈尔滨的党组织发生了分裂。后来，唐宏经去东满进行反四中全会的活动，途中被捕。我在哈尔滨期间，许多同志来找我谈问题，其中有基层组织的负责人，也有从莫斯科回来的工人，还有商船学校的老冯（冯仲云）等。他们的劲头很足，都是同意老唐

观点的。一致表示反对四中全会和满洲新省委。我当时感到很不安，心情非常沉重。再三劝阻他们无论如何不能闹分裂，要顾全大局。应主动找省委联系，相信有些问题是可以谈清楚和解决的。我说，我来找老唐已经不是继续坚持原有观点了，而是想约他一同回上海去谈问题的。此外，找我谈话的还有老唐认识的苏联人和朝鲜同志，名字都记不清了。他们也是支持老唐观点的。我对他们都做过宣传解释和劝阻工作。我在哈尔滨时，曾到监狱去看望过被捕的几位同志，好象仍是交通黄玉珍领我去的。我在监狱中看到了陈潭秋（被捕时任满洲省委书记）和王鹤寿（被捕时任青年团省委书记）等同志，但是没有看到唐宏经。据了解，当时陈潭秋也是反对王明他们的。我在哈尔滨停留了十天左右，回顾了很多问题。深感这次跟随唐宏经到东北来是一次盲目行动。悔不该当初没有听关向应的劝告和等待周恩来同我谈话，以致造成当前失去组织关系的后果。应深刻的反省，汲取这次历史教训。

我很快返回沈阳，准备找满洲省委再谈。及至回到沈阳，发现满洲省委真的把我的组织关系给断了，与我接头的几个机关均搬了家。我在沈阳失掉关系后，因人地生疏，生活有了困难，开始多方寻找社会关系。因我爱人的二姐韩俊哲（中共党员，1939年到过延安）在北平开了个古玩铺，便写信给她，说明了我们的情况，请求她予以帮助。不久，二姐回信，同意我们来北平，并随信寄来了路费。1931年六七月间，我和爱人离开沈阳来到了北平。

到北平后，本想很快便可找到党的关系，然后再回上

海找霍步青与我们建立的特殊联络点上海同昌车行接关系。没想到了北平，便从报上得知顾顺章已叛变了。敌人还在上海《申报》上大肆宣扬，说在上海同昌车行破坏了共产党的一个很大的地下秘密机关。我们不能再去上海了，只好在北平租间房子暂住和设法找关系。8月，北平、天津的党组织接连遭到破坏，我不敢找党了。有一天，在前门外偶遇李芳其（即李运昌，在辽宁时我们曾会面数次）我向他陈述了自己在四中全会前后和到东北后的活动情况。他告诉我说：“韩连会、廖化平均叛变了，他们都认识您，您在北平很不安全，应设法赶快离开。”这时我妻韩玉蓉已找到社会职业，是托她的老师杨浩然（当时任河北玉田中学校长）找到的，在玉田县立女子师范当教员。于是我很快也去了玉田。在玉田，我仍继续向外找关系。不久，打听到原在李明扬部下工作的王根僧。他原是云南讲武堂的学生，后到黄浦军校学习，大革命期间改造赣军时，经我由黄浦调到李部任参谋主任，并由我介绍入党。他是我党派到李部去的秘密党员，从未公开过。“四·一二”清党后，仍留李部工作。李部进驻上海后，部队改编为江苏省保安队。王根僧被派驻宜兴，任保安队营长。因多年未见面了，不敢贸然从事，我便采用试探性的方法去了封信。不料没过几天，便接到他的回信，并汇来了50元钱。信上说，不久父亲即派人去找他（意即党不久即派人来），约我到他那里去，并答应为我想办法。我怀着迫切的希望和兴奋的心情，于1931年12月间离开玉田来到了宜兴。以后，王根僧将我介绍给军委做兵运工作的谢兹山和陆童生。1933

年，谢兹山从上海来信通知我：关系已经接上，组织上确定我留下来同他们一起工作。

(刘杏芬 朱家谟整理)

抗日战争时期的叶剑英

李 鹿 辉

一、参与国共谈判

1931年九一八事变，特别是1935年华北事变以后，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大举进攻中国，中日矛盾成为主要矛盾，国内矛盾降到次要和服从的地位，国际关系和国内阶级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根据形势的变化，我们党为组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作出了巨大的努力。毛泽东当时指出：全中国人民、政府和军队团结起来，执行抗战的方针、政策，“中心关键在国共两党的亲密合作”。

1936年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为国共两党重新合作建立了一个必要的前提。西安事变发生后，叶剑英赴西安，协助周恩来为贯彻党的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日夜奔忙，作了大量工作。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周恩来、叶剑英、秦邦宪代表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代表顾祝同、贺衷寒、张冲在西安就国共合作的具体问题开始进行谈判。其后，我党在西安七贤庄一号设立了“红军联络处”。党和红军委派叶剑英在这里与国民党联络。叶剑英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周恩来领导下，在各方面的支持配合下，为国共第二次合

作，共同抗日，作出了重大贡献。

芦沟桥事变以后，全国形成了抗日救亡的新高潮。古都西安，在我们党的抗日号召和影响下，继西安事变之后，进一步掀起了抗日的高潮。西安各救国团体纷纷来到“红色堡垒七贤庄”找叶剑英，并且向我党提出了四点建议：（一）向南京及全国请求派部队援助在芦沟桥奋起抗战的二十九军；（二）红军立即作准备增援华北的动员；（三）电贺二十九军芦沟桥的英勇抗战；（四）派人前往华北组织抗日义勇军。叶剑英热情接待他们，仔细询问了情况，对他们的爱国热忱表示十分称赞。

7月9日，叶剑英将西安救国团体的建议报告了党中央。洛甫、毛泽东当天晚上即指示叶剑英：“请答复救国会及各方，他们要求各事，我们都同意，并且正在做，请他们努力在外面与政府、党部及各界领袖协商，迅速组成对付大事变的统一战线，唯有全国团结，才能战胜日本。”

7月12日，叶剑英代表我们党和红军与国民党西安行营第一厅厅长侯成如会谈。

在会谈中侯成如根据国民党当局的授意，以试探的口气向我方提出一个问题。他说：“据南京方面的绝密消息，南京拟将红军部队编入战斗序列，使用于平绥线方面，与傅作义共同作战，但不知红军能否听从调动？”

叶剑英按照党中央、毛主席、朱总司令确定的方针，当即郑重声明：“红军抗日救国主张，国人皆知。华北事件发生，共产党和红军即有通电表示抗日救国。”请侯成如转

致南京当局：“中央红军肯定是接受国防调动及对日作战命令的。”会谈后，叶剑英即把会谈情况报告了党中央、毛泽东、朱德。

毛泽东、朱德完全同意叶剑英的意见，并正式复电表示：竭诚拥护蒋委员长及政府决心抗日，红军主力准备随时服从调动，同意参加平绥线作战，并决定以一部深入敌后。叶剑英将来电转告了国民党政府军政部部长何应钦。何应钦在得到我肯定的答复之后，立即呈报在庐山的蒋介石。同时亦致电叶剑英，表示：“红军使用，在正式战争发动前均不参加，除转电委座参考外，希转前方，并代慰劳。”

但是，与此同时，国民党方面却玩弄权术，何应钦背地里起草了一个关于《第三者使用方面及经路之建议》，突然要求陕北红军，用“一一五师、一二〇师、一二九师番号，一切旗帜、符号、服装均改换，主官亦改名换姓”，秘密经韩城、侯马、大同、宣化、赤城，“向丰宁、承德方面活动”，“迅速使用于战场”。蒋介石也突然饬西安行营主任蒋鼎文电叶剑英，限我军于八至十日内开赴晋绥抗日前线。紧接着康泽也奉蒋介石之命，打电话给叶剑英，叫红军“赶快出兵，不要等候改编了。”

叶剑英对国民党的两面派作法保持了高度警惕。他当时感到国共两党正在谈判，我们党关于国共合作的宣言，国民党还没有同意公开发表，我们党提出红军改编后要设总指挥部，以及正副总指挥的人事安排问题，国民党蒋介石还在讨价还价。在这种情况下，为什么突然限令我军开

赴前线？事实很明显，正当日寇重兵进攻华北，战事吃紧之时，蒋介石、何应钦一再令红军孤军深入丰宁、承德地区，目的就是想借日本侵略军之手来消灭红军。他及时向洛甫、毛泽东提出了关于“对付蒋帮阴谋的建议”。经过我们党的斗争，蒋介石的阴谋未能得逞。

7月17日，蒋介石在全国人民的压力下，被迫于庐山发表谈话，宣称如日本继续进攻，威胁到南京政府，就只有奋起抗战。

叶剑英为了推动国共合作，共同抗日，抓住时机，于7月20日致电洛甫、毛泽东说：中央社发表蒋17日对芦沟桥事件的谈话，确定了准备抗战的方针，极为重要，我党应有表示。党中央、毛泽东很快作了答复，表示完全赞同叶剑英的意见，并且说：拥护蒋谈话通电，准备数日内发出。根据新情况，党中央亦拟发出第二次宣言。

7月21日，党中央正式发布了《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形势的指示》，对芦沟桥事件以后的国内外形势作了正确分析，指出“南京政府与蒋介石对于此次事变表示了前所未有的强硬态度，在军事上亦调动军队向河北、晋绥边境集中增援，并已下令全国准备应战。但是否已最后放弃暂时妥协的企图则尚属疑问。南京亲日派势力，采取隐秘的方式活动着。”《指示》认为事变的发展有两种可能的前途，“或者是发展为积极的抗战，以至发展到全国性的抗战”，“或者是由于冀察当局的让步，由于南京对于发动全国性抗战的迟疑及英法的态度而临时求得妥协。”从而规定“我们的总任务是在争取第一个前途的实现，反对一切丧失任何中

国领土主权的妥协。”叶剑英完全拥护中央这个指示，并且在致党中央、毛泽东的电报中说：“目前应发动全国抗战。只有发动全国抗战，在抗战过程中来团结全国，才能取得民族解放战争全部胜利。”

7月31日，叶剑英与国民党西安行营主任蒋鼎文会谈。蒋鼎文谈到他准备于8月1日乘飞机到南京去见蒋介石，大约在南京停留几天，然后仍回西安，问我方还有什么事情要与蒋介石当面商讨？叶剑英针对蒋介石以收编红军为名，只准红军改编为三个师，由他直接指挥，不同意设指挥机关的企图，当即表示：我军改编约于8月10日至迟15日可以完毕；人事上请先发表师、旅、团长；指挥机关必不可少，需要很快决定，待决定后一同发表，希望蒋介石以大局为重，团结抗战。

8月2、3日，国民党数次从南京打电话给叶剑英，询问毛泽东、朱德、周恩来行止。党中央急电西安，要叶剑英弄清蒋介石的意图。当叶剑英得知蒋介石准备在南京召开国防会议，邀请毛、朱参加时，即急电党中央，对毛主席、朱总司令是否前往参加会议提出重要建议。他说：蒋介石目前的困难是平津沦陷以后，和平绝望，亦无谎可说，他只有抗战，才能维持统治。国防会议的做法是要抗战，要抗大家一起来抗，毛、朱已在被请之列。我想，毛不必去，朱必须去，免为汉奸等人所借口。叶剑英当时面对西安事变张学良将军被扣的严酷现实，从革命全局出发，不得不提高政治警觉，时刻关心着革命领袖的安危，以防万一。“毛不必去，朱必须去”，虽然只有短短八个字，却表

现出叶剑英无限忠诚党的事业，处处为民族利益着想，深思熟虑的两全之策。

8月4日，党中央经过慎重研究，采纳了叶剑英的意见，确定派周恩来、朱德、叶剑英去南京参加国防会议。同时，洛甫、毛泽东向周、朱、叶发出了关于国防问题的指示。

8月9日，朱德、叶剑英（周恩来已在南京）带童小鹏携电台一道从西安乘飞机到南京，参加蒋介石召开的国防会议，同国民党谈判。当时乘坐的飞机，是国民党派的。上飞机以后，发现同机前往南京开会的还有国民党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叶剑英和朱德过去就认识龙云，这时在飞机上偶然相见，彼此握了握手，寒暄了几句。龙云似不便多谈。叶剑英说，我们另外找个地方谈一谈，并且诚恳地希望他能转到抗日统一战线方面来。

到达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派员把朱总司令和叶剑英接到军事委员会办公厅副主任姚琮的公馆住下。接着，周恩来、朱德和叶剑英即按预定日程参加会议，并且参加了何应钦召开的有关方面人士参加的谈话会。

通过会议，和各方面都有了接触，南京党、政、军各界要人以及刘湘、白崇禧、龙云等人都已经见过。周恩来、朱德、叶剑英利用各种机会，大力宣传我党的团结抗战主张，以推动抗战局面的顺利发展。在接触中发现，大家感到南京主战空气浓厚，这是主流，主和者不得人心，不敢公开发表意见。同时，也大体弄清了蒋介石的军事部署。

会议结束以后，周恩来、朱德、叶剑英等即搬到南京

中央路傅厚岗66号一幢二层楼房的寓所里居住和办公。后来，八路军驻南京办事处就设在这里。

八一三事变，日寇大举进攻上海，严重地威胁着美英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利益，中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在东南的统治也无法维持。这时，国民党蒋介石才不得不宣布实行全国范围的抗战。

一次，何应钦请周恩来和叶剑英到他家里吃饭。吃饭中间，蒋介石从庐山打电话给何应钦，何应钦放下筷子去听电话，一边走一边打招呼说：“蒋委员长有电话来了。”他打完电话回到席边，大声说：“报告你们一个好消息，委员长决定抗战啦！”并且做了鼓掌的手势。

8月13日中午，周恩来、朱德和叶剑英根据参加国防会议以及同各方面接触所了解到的情况，正式向党中央提出了《关于与国民党谈判条件的建议》，具体意见主要是：努力抗战，以推动和巩固蒋之抗日决心；立即改编，争取开动；力争发表我党为公布国共合作的宣言；催促发表八路军正副总指挥任命。

接着，中共中央根据形势的发展，颁发了关于与国民党谈判的十项条件给周恩来、朱德、叶剑英的训令，提出两党合作须建立在一定原则上，目前最重要的问题，必须使党和红军放在合法地位。因此要求国民党迅速实现发表我党宣言，同时蒋介石发表谈话；发表边区组织；发表指挥部；立即发给红军以平等待遇之经费和补充器物；承认红军在总的战略方针下执行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等七项条件，以便红军早日开赴前线杀敌。

经过谈判，国共两党达成合作协议。

随后，周恩来、朱德返回陕北，向党中央汇报在南京参加国防会议和与国民党谈判的情况，并且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将在洛川召开的扩大会议。叶剑英则继续留在南京从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并筹建八路军驻南京办事处。

8月22日，国民政府宣布我在西北的主力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按抗日战线的战斗序列，又称为第十八集团军）。

8月25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正式发布红军改编命令，宣布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朱德任总指挥，彭德怀任副总指挥，叶剑英任参谋长，左权任副参谋长，任弼时任政治部主任，邓小平任政治部副主任，下编第一一五师、第一二〇师、第一二九师。改编以后，八路军各师即遵照党中央、中央军委的命令，在总指挥部率领下，东渡黄河，开赴华北前线，对日作战。

9月5日，叶剑英应何应钦的邀请参加国民党政府军政部部务会议，并且在会上作了长篇发言。

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了我党于7月15日交付给国民党的《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23日，蒋介石发表了承认共产党合法存在并与之团结救国的谈话。我们党的这个宣言和蒋介石的这次谈话，宣布了国共两党的重新合作，以国共两党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

1937年9月下旬，秦邦宪、叶剑英遵照党中央的指示，

与国民党代表谈判，商定将南方八省区游击队的主力编为一个军，以叶挺为军长，项英为副军长。10月2日，洛甫、毛泽东致电秦邦宪、叶剑英：“速电项英到南京，告以政策，到宁后并令其来中央讨论”。项英到南京会见了秦邦宪、叶剑英，并于11月7日到达延安，向党中央汇报和请示新四军的组建问题。叶挺也于11月到南京找叶剑英，商谈成立新四军问题，然后转赴延安。经过充分准备，新四军军部于1938年1月6日在南昌正式成立。

随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的实现，正如毛泽东所说的，历史的车轮将通过这个统一战线，把中国革命带到一个崭新的阶段，开辟一个新纪元。

二、开展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

营 救 狱 中 同 志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时，在国民党蒋介石接受的条件中，就有“释放一切政治犯”一项。其后，中共中央在为实现国共两党重新合作而提出的五项要求中，明确要求国民党“释放一切政治犯”。“七七”芦沟桥事变之后，全国人民要求联合抗日、释放政治犯的呼声越来越高。国民党政府迫于形势，于8月份释放了关在南京中央军人监狱的一些刑期较短的政治犯。他们认为重要的政治犯，则不予释放。当时，日本侵略军的飞机不断轰炸南京。在这种情况下，狱中的斗争日益激烈。狱中的政治犯举行绝食斗争，强烈

要求释放。他们提出：我们愿意上前方去打鬼子，不能被关在这里等敌人炸死。

1937年8月中旬，周恩来、叶剑英利用到南京参加蒋介石召开的国防会议和同国民党蒋介石谈判的机会，积极设法营救被关押在南京几个监狱的同志。8月19日，他们驱车来到“模范”监狱。指名要看夏之栩、熊天荆、王根英三位同志。见面以后，夏之栩等心情十分激动。

周恩来和叶剑英问了问她们的情况。

“这座监狱里还关了多少人”？

“大概关了100多人，男的多，女的少”。

当时，周恩来问陪同在一边的监狱长说：“她们出去，要办什么手续？”

他点头哈腰地说：“咳！填个保单，她们就可以走。”

周恩来、叶剑英说：“我们保行不行？”

“你们两位保没有话说。”

随后，周、叶提出要去看望其他同志。那监狱长满口答应。很快，周、叶和大家见面，向大家表示关心和问候，并且简要地讲了讲国际形势和国共合作的问题，同志们又惊又喜，百感交集，难以言状。

周恩来、叶剑英保释出夏之栩等同志，从她们那里又知道另外一些同志关押的地点，就列出名单向国民党当局要人。狱外营救活动和狱中斗争相呼应，一批又一批的政治犯终于相继出狱了。较早被营救出狱的共产党员有黄文杰、王鹤寿、刘顺元、郑绍文等。9月26日，周恩来、叶剑英派黄文杰带上马车，把陶铸、曹瑛、赵希愚、肖桂昌、

顾玉良、周云德、陈曾固等七同志从中央军人监狱营救出来。9月底、10月初，又先后派人把喻屏、陈春林、熊有清、陈霖、何洛等一大批同志从和县临时监狱接出来。就这样，一批批的同志相继被营救出狱。

这批同志出狱以后，经过了解，有的留在办事处工作，有的被送到武汉、上海、延安，有的被派往敌后，他们当中的许多同志以后都担负了重要工作，为党和人民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辗 转 武 汉 、 长 沙

1937年11月11日，上海沦陷。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20日，敌人分三路向南京前进，战况紧迫。

在这种形势下，叶剑英、李克农等作了大量应变的准备。首先在京、沪、粤建立起交通机关，保证一旦南京失陷，我们党在京、沪、粤的交通关系不致中断，并且尽可能争取在敌人占领地区内建立交通机关。同时将从南京国民党监狱里营救出的几百名同志作了妥善的安置和转移。派钱之光等先头人员于19日赴武汉开展工作。布置《新华日报》的人员先赴武汉，并将5000多元的纸张（八百多令），运往陕西。

此时，国民党首府岌岌可危，南京各方面的要人纷纷撤离，一派兵荒马乱景象。叶剑英泰然自若，使各项工作有条不紊地进行。在一切撤退工作就绪之后，即报告党中央和毛主席，于11月下旬由陆路经芜湖转赴武汉。

到达武汉后，叶剑英即投入紧张的工作。为了给党中

央及时提供情况，当好“参谋”，首先就是同社会各界人士接触，观察、分析当时的社会政治动向和战争形势。1937年12月7日，叶剑英把自己了解到的情况和看法报告了洛甫、毛泽东和周恩来。他在报告中说：“目前情况，蒋在南京努力指挥作战，汪等在武汉积极主和……蒋确望苏联出兵，亲日派则怕苏联真正出兵。我们觉得目前形势有利于抗日统一战线的巩固和发展，只有从各方面巩固和发展抗日统一战线支持战争，才能使国民党从亲日派从严重的情况中脱出抗日力量，得到进一步的团结，使战争形势转向胜利。”

自南京沦陷以后，大家对时局和抗战前途，更为关切。各方面的人士，都想找八路军驻武汉代表叶剑英，探听共产党、八路军对于时局的看法。八路军办事处的来往客人络绎不绝。

爱国的进步的人们把八路军办事处看做是黑暗中的一盏明灯，十分爱戴周恩来、叶剑英等同志。1937年12月，一位署名“实甫”的同志在《抗战》杂志上发表文章说：“八路军驻汉办事处会客室是一间小房子，陈设简朴，没有沙发和椅子，仅当中有一茶几，四周放着几把小圆形凳子，进门的右边墙上，挂着两幅五彩的国耻表：一是关于不平等条约的，一是关于丧失国土的，显示着这里是一些为民族解放而苦斗的战士居住的环境。叶剑英很忙。他沉着练达，态度和蔼，谁都看不出他是一个运筹帷幄勇敢善战的人民解放的斗士。”

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处长钱之光后来说：“当时在国民

党统治区，除周恩来同志外，有威望的是叶剑英，他参加筹办过黄埔军校，当过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参谋长兼教导团长，参加过广州起义，他的同事很多，学生很多，四面八方的人都来找他，他在统一战线工作中起了很大作用。他是协助恩来同志领导全面工作的负责人”。

叶剑英在武汉期间，工作确实很忙。一方面，他要经常就扩充我军的编制员额，请领军需、装备、物资等问题，同国民党当局进行谈判；要及时向国民党转报八路军战况，宣传我军对日作战战绩；要广泛交朋友，做国民党军队等方面的工作。同时，他还以极大的热情，高昂的斗志，结合国统区的实际情况，努力从事党的其他各项工作。他公开发表了许多文章和演讲，宣传贯彻毛主席论持久战思想和我们党的全面抗战路线、方针、政策；及时向新四军四支队传达党中央、毛主席关于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发展人民抗战力量的指示，并派一批干部前去加强工作；积极参与在湖北黄安七里坪和武汉大学训练游击干部的工作，亲自去视察和讲话；先后会见过伊文思、马海德、柯棣华、史沫特莱等外国友好人士，宣传抗战，争取国际支援。

1938年6月，敌人发起了对武汉的进攻。9月底，武汉危急，开始撤退。10月初，整个武汉三镇便疏散得差不多了。

10月20日前后，叶剑英在周恩来的领导下，有计划地组织八路军办事处和新华日报分社开始撤离。

10月22日，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只身乘国民党的飞机从

华北前线飞抵汉口，参加蒋介石召开的军事会议，同时，也看看蒋介石抗战的决心和对整个战局的打算和安排。朱德总司令到汉口后，住在鄱阳街一号。他和周恩来、叶剑英多次商谈交换意见。23日，朱德在周恩来和叶剑英的精心安排下，由工作人员秘密护送去汉口机场，乘飞机飞往湖北襄阳，然后转乘汽车经陕西三原，返回前线。周恩来、叶剑英得知朱德已经按预定计划脱离危险区，安抵襄阳，才松了口气。

朱德走后，周恩来、叶剑英和办事处的其他同志也相继离开武汉。

武汉撤守以后，长沙暂时成了国民党军政要员云集的地方。10月底和11月上旬，蒋介石和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各部门长官都集中在这里，陈诚的第九战区司令部也搬到了长沙城东门外。11月初，国民党蒋介石在这里开过几天军事会议，之后，又转移到南岳衡山去了。

周恩来、叶剑英来到长沙，会见了国民党湖南省政府主席张治中，沟通了各方面的联系，参加了军事会议。

当时，广州失守，武汉沦陷。蒋介石在撤离长沙前，召开秘密会议，布置火烧长沙，还美其名为“焦土抗战”，对外则严格保密。

当时在长沙的周恩来、叶剑英不知道蒋介石火烧长沙的计划，但对他企图撤退是心中有数。到长沙之后，即及时指挥八路军办事处的同志和郭沫若领导下的第三厅有关人员，分批撤到湘潭下摄司，然后再撤往衡阳。

到11月12日，国民党军政要员已先后离开长沙，湖南

省府也已搬迁源陵。晚上，叶剑英打电话给张治中，询问敌情有无变化，张治中说：敌人进到岳阳，已经停止进攻，还在汨罗江那边。

深夜12点，八路军办事处撤离长沙的工作基本就绪。周恩来和叶剑英才上楼休息，科长邱南章睡在门口的一间小房子里。

13日凌晨1点来钟，邱南章听到周围炸得乱响，起床一看，到处是一片火海。他急忙下楼查明情况。见几个穿兰布制服的国民党警备队的人，背着枪，提着洋油桶和小火把在烧房子，气势汹汹地说：“这是上边的命令，你们走不走，我们不管。”接着就举起火把来烧八路军办事处的房子。

邱南章冲上二楼，把情况报告周恩来、叶剑英。三个人冲出火海，来到湘江边，只见人山人海，许多人拖儿带女，哭声、叫声、骂声，乱成一片。

后来，周恩来、叶剑英等登上一辆军用卡车，随着人群、车队，慢慢涌向湘潭。随后便和八路军办事处的同志、郭沫若以及三厅的工作人员陆续见面了。当时，大家都在为周恩来、叶剑英同志的安全提心吊胆，心情十分焦急。彼此一见面，好象生死重逢，都很高兴，激动得热泪盈眶。

叶剑英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布置八路军办事处的同志作好搬衡阳的准备，他连水也没有顾得上喝一口，又陪着周恩来拉着郭沫若一同乘卡车，折回长沙。想到现场去查明大火真相，察看灾情。对于共产党员说来，还有什么事

情比救民于水火更重要啊!

火烧长沙，连续几天几夜，大街小巷尽是残垣断壁，没有剩下几幢房屋，造成了一场浩劫。不知道烧掉了多少万户人家！烧死了多少人！百姓怨声载道，外国侨民以及外交人员也纷纷提出质问：“为什么日兵未到，城先烧了？”“为什么纵火之前，不通知外侨？”更有的提出：“周恩来是政府大员，为什么连他都不通知？”蒋介石自知理亏，难逃罪责。于是嫁祸于人，下令将“祸首”长沙警备司令酆悌、省会公安局局长文重孚等三人判处死刑。谓湖南省主席张治中“用人失察，疏于防范”，将其革职留任，责成处理善后，以观后效。

周恩来、叶剑英坚持从团结抗战愿望出发，一方面组织八路军办事处和抗敌演剧队的一些同志返回长沙，投入大火后的善后救灾工作，一方面揭穿火烧长沙的真相，为多年相交的张治中主持公道。这样，不但赢得了广大的社会同情，也使张治中等人深为感动。

在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

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到1938年10月，中国七大城市——北平、天津、上海、青岛、南京、广州、武汉，先后被日本侵略军占领，半壁河山，沦入敌手。湖南省会长沙，在敌人还没有来到之前就被国民党烧掉了。这时，国民党蒋介石把临时大本营搬到南岳衡山。

1938年11月25日，蒋介石在南岳召开第一次军事会议，“检讨”前一个时期的工作和展望第二时期的抗日战争形

势。周恩来和叶剑英应邀参加了会议。

蒋介石在南岳会议上提出：“二期抗战，游击战重于正规战”。决定仿效共产党的办法，在南岳举办游击干部训练班。打电报给我们党中央，要求我党派干部到南岳训练班去教游击战。党中央开会讨论，认为参加举办这个训练班，对于团结抗战，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毛泽东说：去吧！讲我们的一篇道理。当时中央确定由叶剑英负责，带几个人去。

这时，和周恩来一起在国统区从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的叶剑英、正辗转来到南岳衡山、衡阳，并且在衡阳建立了八路军办事处。

1938年12月，叶剑英在工作之余，偕战友攀登上南岳衡山的最高峰——祝融峰。叶剑英站在绝顶之上，天风劲吹，松涛阵阵，览物生情，心潮澎湃，即兴赋《登祝融峰》诗一首：

四顾渺无际，
天风吹我衣。
听涛起雄心，
誓荡扶桑儿。

这力抵千钧的铿锵诗句，充满了对日寇的极度轻蔑和强烈的民族自豪感，也表达了伟大的中华民族坚决打败日本侵略者的心声。

叶剑英接到党中央关于参加举办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的通知，愉快地接受了这一任务。他认为，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必须继续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我们参加

举办游击干部训练班，在游干班大讲毛泽东的一套，大讲游击战争，将对国民党军队产生重要的影响。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式公布汤恩伯为游干班主任，叶剑英为副主任。不久，改由蒋介石兼任主任，白崇禧、陈诚兼副主任，汤恩伯任教育长，叶剑英任副教育长。参加游干班工作的我方人员包括教官、工作人员、武装警卫班，共30多人(对外叫中国共产党代表团)，于1939年2月10日前往南岳。2月15日，游干班筹备就绪，学员基本到齐，即正式开学。

游干班每期训练时间为三个月。军事占训练时间的55%，政治占45%。军事教育以游击战术、游击战斗及爆破技术为主。政治教育以民众运动及游击政工为主。第一期学员1046人，编为8个队。第一、二、三队为各战区送来的军官。第四队为汤恩伯部三十一集团军教导团的一个队，并有少数战区送来的军官。第五队为政治部青年团、红十字会等送来的青年学生。第六队为西安行营赠送的军官与学生及八战区迟到军官。各队均不分部队职级与水平，混合编队。第七队主要为收容被衡山县党部解散的衡山青年战时工作队180余人。第八队为工兵学校毕业的学员130多人。

第一期学员大部为黄埔及南京军校毕业生，一部为军校高级研究班、保定军校、云南讲武堂、东北讲武堂及其他地方军队教育机关毕业生。按军衔大部为少校，一部为上校、中校及上尉，政工人员为数极少。第五、六、七队均有女生，共百余人。

据叶剑英等向中央的报告反映，汤恩伯本人当时表现还比较进步，对统一战线及游击战的认识与态度均较好，比如，开学讲话公开引用毛主席《论新阶段》中的一些话，对我党衡阳公开代表李华杰之被捕及青年记者学会一同志失踪，在全体会议上公开表示同情；对我方建议多能接受，对我方所拟讲授大纲极少修改。

叶剑英曾参与创办黄埔军校，担任过红军学校校长，有着丰富的办校经验。在他的参与下游干班与当时国民党其他军校相比，具有许多长处，如，较广泛地实行民主；教授法部分采用了启发式；实行“教”、“学”、“做”合一；教职员与学员打成一片；提倡自觉纪律；坚持做民众工作，等等。

为便于集体研究，叶剑英首先与汤恩伯商定，我们参加游干班的人员，集中住在第一教官室。我们的同志制订了《工作六大注意》，即：坚定的立场，苦干的作风，谦和的态度，简朴的生活，虚心的学习，严肃的纪律。他们有时还邀请其他各主要教职员参加我们的讨论会。汤恩伯曾多次在会议上表彰第一教官室的工作方式与作风。学员对我反应颇佳。

在教学方面，我们党派去训练班工作的同志，主要教授游击战略、战术和游击政治工作课程。叶剑英负责全盘工作，并且亲自担任一部分教学工作。李涛、吴奚如负责讲授游击战中的政治工作，边章伍、薛子正、李崇负责讲授游击战术。政治工作课主要讲我们党的抗日主张，毛泽东《论持久战》的思想和如何做群众工作等。制定大纲和教

材讲义的编写，事先都经过集体讨论，由叶剑英审阅修改定稿，然后交训练班油印。我们的几个教官，除李涛、边章伍二人在延安红军大学当过教员、有教学经验外，吴奚如、薛子正、李崇都是初次任教，没有教学经验，剑英就帮助他们把课备好。每天晚上，我们的教官几乎都集体备课，试讲一遍第二天的课程，叶剑英亲自审查。叶剑英带头编写教材，编好以后送给大家征求意见。他经常对大家讲：“我们是共产党的干部，讲课只能讲好，不能讲坏。”他严格要求所有工作人员，说：“我们的一言一行，都代表党，不能给党丢脸。”

叶剑英虽然工作很忙，但仍按计划分工给学员讲课，不仅讲游击战略、战术，还讲政治课。听他讲课的人很多，有时达二三千人，课堂容纳不下，就在广场上上大课。不仅学员们听，就连附近的国民党军队中的一些将领，都赶来听讲。

他讲课时，通常都是身着那套退了色的军装，脚上穿一双旧长统马靴，桌上放着讲稿，平易近人，和蔼可亲，站在大家面前。他讲课理论结合实际，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形象、生动，给大家留下深刻的印象。

第一期学员毕业之前，游干班全体人员在叶剑英的亲自组织指挥下，进行了一次大型军事演习。这次演习，由于准备充分，组织严密，动作逼真，近似实战，效果很好。其中，学员七队在演习中充当“假设敌”，该队队长（汤恩伯部队一个少将副师长）对叶副教育长组织的这次演习，连连称赞，十分敬佩。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军训部专员程兆熊

在对游干班的“视察报告书”中说：“学员曾向余言及游击战术一课之实地演习情形，谓绝非纸上谈兵之可比，该班训练之切实，当可想见。”

1939年5月15日，游干班第一期学员结业，举行了盛大的结业仪式。会后，许多学员怀着依依不舍的心情，拿着自己的笔记本、纪念册，纷纷要求叶剑英副教育长签名留念。他接过每个人的本子，根据不同对象，题上“到敌人后方去，把鬼子赶出去”、“路是人走出来的”，“要作大事，不作大官”等等寓意深刻的语句，并签上自己的名字。这些题字，给了一些人以鼓舞和启迪。解放后，衡阳市政协委员、统战部专员、原白崇禧华中长官公署衡永纵队第一支队少将司令程鲁曾说：游干班结业时，叶剑英副教育长给我的题字是“要作大事，不作大官”，当时我并不理解，认为只有作大官才能作大事。1949年，眼看国民党大势已去，我想起了叶剑英“要作大事，不作大官的教诲，感到国民党的官不能再做了，“反戈一击”才叫大事，于是我便毅然决然率领部队起义了。

1939年6月，周恩来同志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准备回延安汇报工作，而叶剑英参加举办的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第一期学员已经结业，党中央、毛主席根据形势任务的需要，决定调叶剑英同志回南方局工作。6月初，叶剑英即离开南岳，经桂林到达重庆。叶走后，由李涛任工作组组长和中共代表团团长。继续留在游干班工作。

国民党五中全会确定和贯彻了反共反人民方针，开始了政策上的重要转变。此时，汤恩伯也已调赴前方，大部分

人员都跟着汤走了，游干班第二期的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学员人数，由原来的1000多人，减到了460多人。学员对象，原来主要是各战区送来的军官和招收部分青年学生，第二期改为现役军官和党务政工人员各半。课程内容有所调整，反共活动明显增加。第二期学员9月20日结业，以后，又继续办了一期。游干班第三期由于日寇飞机狂轰滥炸，在南岳办不下去了，先后迁到湖南零陵、祁阳。第三期结束后，我党参加办班工作人员，于1940年3月全部撤回。

叶剑英等同志参加主办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打破了国民党的封锁和欺骗宣传，宣传了我们党的正确主张和毛泽东关于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思想，使一些学员提高了觉悟，从而更加接近我们，和我们交上了朋友。这几期学员回部队后，不少人对坚持抗战，反对磨擦，以及在后来的解放战争中，起了积极的作用。

在南岳，我们党派去的同志住在“桔子园”。方圆一大片，栽满了桔子树，他们没有摘过一个桔子吃。树上掉下来的桔子，他们拣起来交给管园子的老乡。附近鱼塘养了不少鱼，他们没去钓过一条鱼。他们之中有几个女同志，穿戴和男同志一样，从不特殊。他们的模范行动在当地老百姓中产生了很好的影响，群众反映说：共产党就是不象“刮”国民党，共产党就是好。

反对国民党制造“平江惨案”

1938年10月，广州、武汉失陷后，抗战进入相持阶段。

由于我们党领导的敌后游击战争的巨大发展，威胁着敌人的后方；同时，也由于敌人战线的延长和兵力不足，其主力不得不用于确保占领区和交通要道。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帝国主义对国民党的方针，由“以军事打击为主，政治诱降为辅”，改为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这时的英、美集团，急于应付德、意法西斯在欧洲的进攻，积极策划牺牲中国以换取与日本妥协的“远东慕尼黑”阴谋。在这种背景下，国民党对于抗战日益消极、动摇，投降、分裂活动急剧增加，并且已经成为当时时局的主要危险。1938年底，以汪精卫为代表的国民党亲日派，公开投降日本帝国主义。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亲英、美派，也与日本帝国主义勾勾搭搭，秘密谈判，企图妥协投降。

共产党是坚持抗战、反对投降的中流砥柱。蒋介石集团为了妥协投降，必然首先要反对中国共产党。1939年1月，国民党五中全会决定实行“防共”、“限共”、“溶共”的方针，接着又秘密制定了《限制异党活动办法》等文件，到处制造恐怖活动；不但实行“政治限共”，还加紧实行“军事限共”，到处制造磨擦，大肆叫嚣要向共产党和八路军“收复失地”。同时，他们在山东博山、冀中深县、湖北东部和河南确山等地制造了一系列惨案。

针对这种新的形势，党中央及时提出了“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口号和“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自卫原则，领导全国人民和人民军队与国民党的反共、投降活动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1939年6月12日，国民党军队杨森部突然包围新四军设在湖南平江嘉义的留守通讯处。屠杀涂正坤主任、罗梓铭少校等六人。这就是中国现代史上的“平江惨案”。

当时，叶剑英刚到重庆。在他得到“平江惨案”的消息后，即以中共代表、八路军参谋长名义，致电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参谋总长白崇禧，严重抗议国民党当局制造平江惨案，要求迅予彻查。7月2日，周恩来致电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陈诚，揭露国民党制造平江惨案的经过及其阴谋。14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令部部长徐永昌为掩盖其罪恶活动，致电周恩来、叶剑英，诬陷新四军平江留守处涂正坤等“纠集土匪，扰乱后方”，国民党军队残酷杀害涂正坤、罗梓铭等是什么为“维持后方治安”而进行的所谓“适当处置”。21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政部部长何应钦为了开脱罪责，又致电周恩来、叶剑英，谎说“平江惨案”的发生，系新四军平江留守通讯处藏匿国民党逃兵，国方派兵前往捕查，留守人员拒绝捕查引起双方械斗所致。徐电与何电，互相矛盾，欲盖弥彰。22日，周恩来、叶剑英致电国民党军令部长徐永昌并军委会及各部长官，严重驳斥国民党军肆意歪曲惨案经过及当局对新四军平江留守通讯处的种种诬蔑。电文正告国民党当局：“盖国共团结，为我国战胜日寇之基本条件，强敌入境，颠危之祸，迫于眉燃。我国人只有同心合力，庶可挽狂澜于既倒。不幸抗战阵营中，顽固分子以排斥异党为能事，到处制造磨擦，汉奸亲日派乘罅抵隙，肆其挑拨离间，以破坏两党关系。两党自相鱼肉，抗战力量损耗，日寇遂坐收渔人之

利矣！”并且强烈要求国民党当局饬薛岳“再派员驰赴肇事地点，查明真相，雪冤治罪。”国民党为敷衍应付，只好责成第九战区代理司令长官薛岳进行所谓调查。而薛岳的报告，仍旧是颠倒黑白，把犯法者文饰为有功，无辜者诬陷为有罪。28日，周恩来、叶剑英再次致电何应钦，揭露国民党顽固派“不顾强敌入境，挑起鹬蚌之争，犯法者文饰为有功，无辜者武断为有罪，随便栽诬，草菅人命，如此荒谬颠预，实为古今中外所罕见。”强烈要求“查明真相，雪冤治罪”，并且对薛岳、杨森的所谓调查答复中编造的种种谎言，一一予以驳斥，声讨国民党反动派蓄意制造的血腥罪行。

与此同时，叶剑英怀着极大的义愤，撰写了《论平江事件》的檄文，说明我八路军、新四军存在的合法性和设立留守处或通讯处的必要性，用事实揭露和驳斥了国民党顽固派制造平江惨案的种种借口。

叶剑英在文章中指出：“八路军、新四军留守处或通讯处的设立，不是秘密的阴谋特务，而是军队为着当前作战所必需的后方机关，这种机关的设立，有利于前方作战，有利于后方团结，可以帮助政府解决地方纠纷，可以帮助政府进行兵役动员。如同平江新四军通讯处在涂正坤、罗梓铭两同志领导之下，所已经做过的工作一样，是为地方民众一致爱护的机关。该通讯处，在平江嘉义镇，工作了一年又九个月，在这一期间，曾动员已愈伤病兵回前线者约70余人，涂正坤兼任过平江动员委员会委员，积极参加兵役动员工作，曾经协助政府肃清平江附近土匪，曾经在

武汉撤退时，帮助友军，收容伤病，原数送还友军。事实恰恰证明了在涂、罗二同志所领导下的工作，不仅不是勾结土匪，而是帮助政府肃清土匪，不仅不是劫夺友军，而是帮助友军收容伤病，不仅不是破坏兵役，而是帮助政府完成兵役任务，不仅不是破坏团结，而是更加巩固民族团结，不仅不是捣乱后方，而是帮助政府安定后方。因此，平江惨酷的事件，所根据的‘口实’，只是一种狼要吃羊的借口。”

8月1日，党中央在延安举行了追悼平江惨案死难烈士的集会，毛泽东同志在会上作了《必须制裁反动派》的重要演说。

8月13日，八路军重庆办事处在红岩嘴举行隆重追悼大会，追悼新四军平江留守通讯处被害烈士。追悼大会由八路军驻渝联络代表叶剑英参谋长主持，中共代表董必武等同志在会上致词。叶剑英在大会上严肃指出：“平江事件并非简单案件”，而是“在日寇政治别动队汪派汉奸破坏团结活动的影响下所进行的事件。”董必武在大会上强调“惩办凶顽，揭破汉奸托匪和汪派在破坏团结中的阴谋活动，并加强统一战线工作。”大会呼吁全国人民和国际人士主持公道，为死者洗耻雪冤，严惩反动派。其后，长沙、南昌等地，也相继召开了追悼平江惨案死难烈士的大会。

为了悼念平江惨案死难烈士，党中央和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彭德怀、叶剑英等同志都送了挽联、挽诗。叶剑英的挽联是：

人类有余悲，豺狼亦已歌；

何以寄凭吊，按剑复摩挲。

叶剑英这幅挽联，充满了他对国民党顽固派制造平江惨案的愤慨，大有拔剑而起之势，但考虑到大敌当前，团结为重，只好用“按剑复摩挲”来寄托自己对平江惨案烈士的深切凭吊。

“舌战群儒”

1939年9月1日，希特勒德国闪击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当时，英、美正忙于应付欧洲战场，无暇东顾，企图以牺牲中国为代价求得与日本暂时妥协。而日本帝国主义为了配合希特勒的进攻，加速南进，争夺东南亚，也在加紧对国民党进行诱降活动。这时，蒋介石集团为了适应帝国主义的需要，把反共投降活动推向高峰，由小规模军事磨擦发展为大规模的武装进攻。

山雨欲来风满楼。这年11月，国民党军政部长何应钦和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任贺耀组一起找叶剑英，提出一系列问题。何应钦说：一、为了维持法币信用，要你们在华北共同维持，勿自发钞票。二、你们过去答应委员长，在军队改编两年后可以由中央派少数人到军队中工作。现在已两年多了，为使宣传口号得到一致起见，中央特派人到你们政治部工作，以资联络。三、经理制度，统一经费直接发到师，以免把军费用到其他方面，如延安办许多学校之类。四、委员长意见，如同意上述意见，可增编成为三军六师。讲完之后，何应钦要叶剑英电问前方意见如何，再作决定。

叶剑英感到来者不善，其中大有文章，便以个人名义针锋相对作了答复：首先，八路军未发钞票，河北地方政府所成立的银行及其所发行的钞票，应如何统一，请中央转知各地方政府共谋解决，此次我们可以转达。其次，关于人事任免，事实上已经统一，八路军团长以上官长，都是呈请中央委任的，至于中央要派政工联络员的问题，须请示前总。第三，经费用途，我军都用到军队本身，陕北所办各种学校，其经费均由学生自筹，及南洋华侨捐款。

1940年春，国民党发动的第一次反共高潮被粉碎以后，蒋介石看到战场上大规模的武装进攻非但没有达到目的，反而损失惨重，恼羞成怒，便决定于是年3月在重庆召开全国参谋长会议，布置在会议上围攻八路军，进行军事动员，准备发动更大规模的第二次反共高潮。

叶剑英接到开会通知，鉴于当时国内外的严重形势，预计到蒋介石很可能在这次会议上搞阴谋。于是，他和有关同志一起，进行了紧张的准备工作。届时，叶剑英参谋长身着黄呢军服，佩带中将军衔，威风凛凛地前去参加了会议。

果不出所料，会场上一片紧张气氛。会议前，蒋介石已有精心布置，谁先发言，谁后发言，讲些什么内容，都作了安排。会议一开始，蒋介石就说冬季攻势打得不好，没有完成任务，是十八集团军造成的。诬我十八集团军“游而不击”，制造磨擦，袭击友军，包庇叛军，破坏抗战。并且声言，要彻查此事，以整肃军纪军令。

会议的前两天，都是按照蒋介石的预定计划发言的，

所有发言人都把火力集中指向第十八集团军。

叶参谋长胸有成竹面对国民党的围攻，处之泰然。当会议进行到第三天，诬蔑攻击的发言都讲完了。叶剑英从容不迫地站起来，作了长达一个半小时的关于《作战与磨擦问题》的发言。

叶剑英身为十八集团军的代表，在国民党内是追随孙中山的元老，又是黄埔军校的筹办人之一，在国民党军队中负有盛名，他豁达大度，侃侃而谈，会场上对他的发言，无不全神贯注。

叶剑英的发言，针锋相对地集中讲了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作战问题，二是磨擦问题。

关于作战问题，主要讲我们的战略指导思想和我军如何按照统帅部的抗战命令，艰苦奋斗，并获得伟大战果的情况。

首先，说明华北战场是整个抗战的重心，十八集团军坚持华北抗战，必须同敌人进行全面的斗争。进出敌后各区，发动群众，建立政权，积极配合作战，乃是抗日战略的需要。

第二，用总结汇报的形式说明抗战两年半来，十八集团军在敌后作战，英勇牺牲，克服了缺衣少食，缺乏武器弹药和敌人残酷“扫荡”种种困难，花费了巨大代价，获得了辉煌的战绩。计大小战斗2689次，歼敌8万余人，缴获步马枪2万余枝，轻重机枪400余挺，各种炮100余门，争取伪军起义19000余人，破坏交通共1170余次，其中破坏铁路1300余里，公路2400余里，破坏车站316个，炸毁

桥梁 387 处，炸毁汽车 2000 余辆。这些战绩不仅为敌人所承认，为全国人民和全世界进步人士所称道，而且有些也曾为蒋介石和统帅部所嘉奖。

第三，说明我们接到统帅部举行冬季攻势作战的命令时，尽管华北敌军正在对晋察冀等军区进行大“扫荡”，我军许多部队正在进行紧张的反“扫荡”作战，我们仍然抽调了 152000 余人的兵力，按照统帅部的命令，周密部署，努力作战，胜利地完成了分配给我们的任务，计毙敌 19000 余人，生擒伪军 1300 余人，获战马 1600 余匹，我伤亡官兵 8000 余人。用事实证明我军的作战行动是极其坚决、积极、英勇的，也是按照蒋介石统帅部的抗战命令办事的。这和正面战场上国民党军队消极抗战，积极反共，一见敌人，望风而逃的情况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叶剑英用大量无可辩驳的事实彻底地回击了所谓十八集团军“游而不击”的诬蔑，巧妙地粉碎了蒋介石集团想借检查冬季攻势作战失败为名，加罪于十八集团军，进而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的诡计，使蒋介石等人啼笑皆非，无从辩驳。

关于磨擦问题：叶剑英一开始就承认各有关战区和集团军所提的磨擦事件是抗战中的一个严重问题。为了正确解决这一问题，他首先从政治上战略上提出了四条原则。

第一，我们提出磨擦问题的目的是要把磨擦的事实加以研究，找出磨擦的原因，求得正确解决的办法以消除磨擦，决不应是扩大磨擦。

第二，许多磨擦都是由于政治意见的分歧、战略思想

的分歧和奸人的挑拨离间等等没有及时得到正确解决而产生的。如果把磨擦的现象当成原因来看待，抹杀了产生这种现象的政治、战略原因，仅仅从武装冲突本身来解决，问题不仅解决不了，反而会产生更严重的后果。

第三，有人把十八集团军当做异军看待，这是完全错误的，是许多磨擦发生的根源。抗战中各友军由于各种历史地理等等原因，确实存在着许多大同小异的特点，如国民党军队、共产党军队、中央军、地方军、正规军、地方军、满员师、简编师以及武器、编制和战斗作风等等都有所不同，但只要团结抗战就都是友军，不应看作“异军”。我们的政策应该一视同仁，发挥各自的长处，求大同存小异。

第四，我们和友军之间的磨擦不是不能解决的敌我矛盾，而是在大敌当前全民抗战的前提下所存在的一种局部的暂时的现象。抗战中民族矛盾是第一位的大问题，磨擦则是从属的，决不能搞颠倒了，更不应把局部磨擦有意扩大为全面内战，干那种亲者痛仇者快的蠢事。

当时，磨擦问题突出地表现在河北、山西和陕甘宁边区，国民党军各参谋长的诽谤和攻击也主要集中在这几个地方。叶剑英的发言，针对他们的诽谤和攻击，用摆事实讲道理的办法，一一作了有力的回答和驳斥。

关于河北问题，国民党军队好几个参谋长在会上一再诽谤攻击“十八集团军屡次袭击鹿钟麟、石友三、侯如墉、夏维礼，给敌人以扫荡的机会。”

叶剑英在发言中，首先指出了河北磨擦问题的起因。

他说：“河北沦陷以后，许多军队和各级政府人员都退出了河北。本席和周恩来同志有一次面谒委座时，委座亲自指示本集团军组织几个游击支队，深入到敌人后方去。我们执行这一指示，曾经组织了五个支队，分途进入山东、河北、冀东，经过许多大小的战斗，把敌人约束在许多据点里面，部分地恢复了河北的失地，建立了冀中冀南的地方政权，由当地民众公举出贤能干部，主持县政开展斗争。国民党河北省主席鹿钟麟是在这个时候进入河北的”。“开始，我们与鹿主席之间关系很好。但是自从张荫梧和一些特务工作人员在鹿主席的周围起了作用以后，情形就一天一天恶化了。因此我们有一些新的做法，不仅不为鹿主席所采纳，反而用来做打击我们的资料。磨擦就一天天强化了。”

接着，叶剑英用事实揭露国民党军队与伪军“沆瀣一气”共同进攻十八集团军的真相。他说：“当本集团军与张荫梧部队冲突时，缴获许多文件，其中有许多命令，称本集团军为伪抗日军，我们把它用照相机照出来作为一个证明”。随后，叶剑英将缴获的张荫梧部队联络伪军把十八集团军当成“伪抗日军”加以进攻的几个重要命令，当场一一念给大家听。

叶剑英接着严肃指出：“我把这几个通报和命令念完以后，我们就可以知道：（一）当张荫梧把本集团军作为一个伪抗日军来进攻的时候，鹿主席并没有采取有效的方法来停止张荫梧对本集团军的进攻；（二）当张荫梧进攻本集团军的时候，第四纵队侯如墉部是参加了的；（三）张

荫梧的部队一方面向本集团军进攻，一方面与皇协军（真正的伪军）是有联系的；（四）当张荫梧与本集团军冲突的时候，鹿主席最初不能站在公正的立场来解决我们的纠纷，最后同张荫梧一道进攻本集团军。这就是我们同鹿主席磨擦的大概的经过。”

国民党冀察战区参谋长黄伯韬攻击诬蔑“十八集团军在冀南行政公署自己委任许多县长排挤鹿主席所委县长”，“河北灾情严重是由十八集团军造成的，他们用屯积公粮名义，把河北粮食运上太行山”。

叶剑英在发言中驳斥说：“我们认为要坚持河北的斗争，必须发动河北民众，一致起来抗战。而我们与广大民众的联系，必须经过地方干部，为群众所信仰的干部，用这些干部来主持地方行政工作才能做到军队和人民一致，政府与人民一致。因此我们就勇敢地信任了地方上斗争出来的干部。譬如曲周县长郭企之，他是南宫优秀的青年，为当地人民选举出来的。去年5月间他到乡下去巡视工作，为汉奸告密，被敌军包围。郭县长率领武装抗击敌寇，受伤后民众把他藏起来。敌军进入村庄后，按户搜查，寻找郭县长。被俘后，敌寇威逼利诱，始终不屈，从容就义，国府已有明令表扬。威县县长范若一，是北平大学和日本帝国大学毕业的优秀干部。他受民众选举，在威县整理田赋，发展游击战争，挖沟破路，力疾从公。威县到南宫仅九十华里，敌寇在此修路，一个月不能成功，因为敌修三天被我一夜就破坏了。其他如同武邑县长李凌霄，隆平县长傅允间，都是经过民众选择而最得民众拥护的。鹿主席对于

这些县长，已经委任，后来并未免职，又另委县长，这样一县就变成双县长了。我们再来看鹿主席所委任的县长。例如衡水县长唐介人在县 20 多天搜刮民财 30 余万，经民众向省府保安旅长邵伯武告发，积状盈尺，乃下令撤差。又如威县县长荆树亭是大家都知道一个吃大烟吃白面的，这就是在应用干部问题上和鹿主席的分歧。”

至于“存粮的问题”，叶剑英说：“在大会上有人说十八集团军把河北的粮食统统集中到太行山去，这不是事实。第一说的方法不对，第二是时间不符。因为我们存粮的方法是存在群众自己家里，只存在登记簿上，不是集中贮藏的。在河北斗争的环境下面，只有分散保存，才不致为敌寇所抢掠。而石友三在南宫一带却是把粮食集中起来，屯积在一个地方。敌寇一来，全部抛弃，这是十分笨拙的办法。去年夏天河北大雨，敌寇决堤，冀中、冀南水灾惨重，所以说我们在 8 月间搬粮上山是不合事实的。”

国民党军队某些参谋长还攻击“冀南银行去年 12 月发行 300 万钞票兑换中、中、交、农各银行^①钞票，大肆破坏”。

叶剑英反驳说：“冀南银行发钞票的问题，本来是地方行政事件，不属本集团军范围，不过有人已经提出，我必须解释。我们在沦陷区要和敌人作经济斗争，要避免敌人套取外汇，国民政府曾经明令准许地方发行省币。因此冀南银行发行钞票在原则上是合法的。事实上，在河北作战的国军，差不多全部使用十元、五元的法币，民众买卖感

^① 即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和农民银行。

觉有补币的需要，因此冀南银行所发的一元以下的币票是合乎需要的。”

关于山西问题，国民党第二战区楚溪春参谋长攻击诬蔑十八集团军陈士渠支队不让他们追歼“叛敌的军队”，“赵承绶军长所部奉阎长官命调回晋西南，在途中受十八集团军袭击，损失颇大；十九军后方机关移动时，被十八集团军抢掠一空。”

叶剑英在发言中阐明事实真相说：“关于山西问题。本集团军是归第二战区阎司令长官指挥的，我们自平型关战斗直到现在，和在山西作战的友军没有什么磨擦。关于新、旧军冲突的事件，有许多人怀疑是本集团军挑动的，这一点必须加以说明。新、旧军的冲突，我们不仅是没有挑动和参加，而且是坚决反对的。当事变初期，彭副司令曾经亲赴秋林见阎长官，劝其和平解决，不要扩大事件，为亲痛仇快。后来新、旧军在晋西作战，新军向北撤退，我陈士渠确有隔断新军，不让他们继续作战的决心。因为我们枪口应该对外，对自己的友军打一颗子弹都是不应该的，这就是陈支队在当时所采取的态度。我们是不是要他的人枪呢？我们决不会这样贪小利而失去全国人的同情。现在楚参谋长也在座，当圪口太原撤退时，晋绥军的队伍相当溃乱。我们曾帮助他收容散兵，把抛弃在河川里的大炮抬回给阎长官。后来阎长官说你们没有炮兵，我把野炮收回，山炮则送给你们，本集团军的炮兵团就是这样成立的。因此我们有根据说，陈支队的行动是顾大局的。后来陈支队受到六十一军、十九军的攻击，不得已撤回晋西北。本集

团军的兵站线，遂被该军切断，病在医院的伤兵，遭受牺牲。本集团军群情愤激，始有与友军发生小的冲突。至若赵军南下时，正值敌军由柳林进攻，我河西部队渡河侦察，不期与赵军遭遇，发生误会，这是偶然的事。山西情形就是如此。”

关于陕北的问题，国民党第八战区章亮琛参谋长指责说：“陇东事件，第十八集团军与友军和地方政府时起纠纷，甚至发生武装冲突，例如去年夏季在枸邑淳化的冲突、镇远宁县的冲突、宁县与九十七师部队之冲突、合水与保安之冲突，许多冲突事件都是十八集团军有计划地向我军进攻。”

叶剑英回答说：“关于陕北的问题，主要的是解决边区的问题。三年来对于边区问题，始终是拖延不决，引起了陕北和后方留守部队在陇东各地与友军时生冲突。我完全同意何总长所说的要停止陕北的磨擦，主要的是要制定边区的范围。而且事实上，我们同中央正在谈判此事，我相信不久可以解决。不过陕北问题，大部分是政治问题，战斗中虽然有许多磨擦，因为问题牵涉到政治方面，本席份属军人，不便多谈。我相信中央必能以公正的态度得到正确的解决。”

叶剑英同志的发言，理直气壮，事实确凿，合情合理，使蒋介石围攻叶剑英的企图化为泡影，使我党的政策，在国民党军队中赢得了广大的同情。

参谋长会议以后，叶剑英把他的发言稿和会议的情况报告给党中央、毛主席。毛泽东非常赞赏，亲自写了批语：

“这是1940年3月，叶剑英同志在全国参谋长会议上的讲话，请同志们（指在延安的中央领导同志）看一看。这个讲话得到了广大的同情。”董必武曾把叶剑英同志的这次斗争誉之为“叶剑公舌战群儒”。

反对国民党制造皖南事变

1940年9月初，在国统区重庆工作的周恩来、叶剑英，得悉国民党军令部已向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发出“扫荡”长江南北新四军的命令后，马上报告了党中央。据此，中央军委于9月6日正式发了《关于新四军应准备自卫行动的指示》。指示强调：“请叶（挺）、项（英）、胡服准备自卫行动。皖南尤须防备。”同年10月，在何、白发出《皓电》以后，强令在长江南北和黄河以南坚持抗战的新四军、八路军在一个月內全部开赴黄河以北。我们党拒绝了这种无理要求。在揭露国民党反共投降阴谋的同时，为了做到有理有利，答应将在安徽南部的的新四军调往江北。此时，在重庆的周恩来、叶剑英正不辞劳苦，四处奔走，向各方面人士进行大量的工作，阐明我党团结抗日的严正立场。这些人里面，不仅有进步的民主人士、中间人士，还有国民党的抗战派、元老派和一些黄埔系的军人及地方实力派。11月上、中旬，周恩来和叶剑英亲自多次到张申府的寓所，同黄炎培、沈钧儒、章伯钧、邹韬奋、张君勱、梁漱溟、左舜生等民主人士商讨时局问题，并交谈了国民党制造磨擦的严重情况。

在这个时期，叶剑英陪同周恩来同国民党代表刘为章

和张冲进行过多次谈判，要求推迟新四军北移的期限，要国民党军队停止磨擦活动。11月24日，在谈判中，叶剑英严正表示：“中国共产党的让步是有限度的，《佳电》提出新四军过江，已表示让步。如果国民党再不停止进攻，陕北封锁仍不解除，那么，兵戎相见，演成内战，责任完全在国民党。”12月30日下午，国民党代表在谈判中，正式提出：奉蒋介石指示，为顾全困难，中央提示案内容不变，日期可以延缓，必须于12月底，江南新四军移到江北，江北八路军移到老黄河北；1月底，江北新四军全部移到老黄河北。还说什么各地又有冲突，编造了宜川北临直镇之十八集团军部队向宜川西龙泉镇的国民党军袭击，等等。周恩来、叶剑英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再次向对方郑重声明：第一点，江南新四军已经决定移动，其他我军不动；第二点，冲突如有，其原因决不如此，最近霍守义师南下，攻击十八集团军彭部，他们已再三相让，故目前国民党必须停止在陕北、皖南和苏北的军事行动。

在这个时期，叶剑英协助周恩来对何、白的《皓电》发出后的形势变化，我们答复的内容、时机和形式等重大问题，以及我党政治上、军事上应采取的大政方针和策略、措施等，都及时地向党中央、毛泽东提出了建议，得到了党中央、毛泽东的好评。

叶剑英並协助周恩来，通过各种渠道揭露国民党制造磨擦，破坏国共合作的活动。布置工作人员把国民党制造磨擦的材料汇印成册，其中包括半年来双方来往的文电和国民党的反共文件，秘密寄往八路军驻桂林和西安的办事

处翻印，广为散发。并委托国际友好人士王安娜通过外国朋友把材料带到香港，向国外散发。南洋等地的街头上出现了揭露蒋介石反共活动的小册子，曾使蒋介石、白崇禧等大为恼火。

1941年1月6日，北移的新四军9000余人，在皖南泾县茂林地区遭到国民党军80000多人伏击。新四军奋战七昼夜，弹尽粮绝，除千余人突围外，大部壮烈牺牲，军长叶挺与顽军谈判被扣，项英、周子昆突围后被叛徒杀害。国民党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在新四军被围期间（1月12日），周恩来、叶剑英接到新四军的告急电和中央关于向国民党交涉问题的指示以后，立即向国民党代表张冲、刘为章提出严重交涉，要求“急电制止”。13日，周恩来、叶剑英专门找刘为章、蒋介石紧急进行交涉。14日，周恩来、叶剑英遵照毛泽东指示，再次向蒋介石交涉，并且向蒋介石、何应钦、白崇禧等人抗议，要求立即制止围攻新四军。17日，当周恩来和叶剑英获悉国民党当局发布命令，诬蔑新四军叛乱，悍然宣布取消新四军的番号以后，再次向何应钦、顾祝同和张冲提出了严重抗议。周恩来题词、题诗，发表在《新华日报》上抗议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的血腥罪行。

由于原来准备1月18日在《新华日报》上发表的那篇揭露国民党反动派制造皖南事变的文章被检扣，周恩来和叶剑英商量，感到光有题词、题诗还不足以完全揭露“皖南事变”真相，便决定重新组织力量写一篇全面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罪恶阴谋的传单，以彻底揭露蒋介石国民党的反共

阴谋和欺骗宣传。18日下午，叶剑英召集军事组和其他有关的同志共同研究，连夜赶写了《新四军皖南部队惨被围歼真象》的传单。传单列举了八个重要方面的事实，阐明皖南事变真象，揭露国民党制造内战阴谋：一、关于所谓新四军违抗命令不受调遣的问题；二、关于新四军渡江路线问题；三、关于新四军移动时间问题；四、所谓“借端要索”问题；五、究竟谁打谁的问题；六、所谓要在江南建立根据地的问题；七、叶、项正副军长与新四军部队；八、取消番号与审判军长。传单写好以后，经叶剑英审阅修改，于19日晨送给周恩来最后审阅定稿。周恩来看后，亲自修改了几个地方，并且指示，“要赶快印刷，秘密散发出去。”

传单印好以后，大家分途出动，冲破国民党特务的重重阻挠，通过各种关系和渠道，广为散发。真理的声音，正义的声音，国民党反动派企图封锁是封锁不住的，想检扣是检扣不了的，你越封锁、越检扣，大家越是想知道。传单散发出去以后，皖南事变真相很快大白于天下。

周恩来、叶剑英鉴于当时的严重局势，从1940年10月起，即根据党中央关于“保留重要干部”，“驻渝干部要尽量减少，减少的同志或撤退延安，或转移他地，或就地荫蔽”的指示，有组织有计划地部署了南方局、八路军重庆办事处和新华日报社部分工作人员的撤退和转移，以防备国民党的突然袭击。同时，为了使大家认清形势，鼓舞斗志，作好应变准备，还利用《新华日报》成立三周年的机会，在重庆《新华日报》社，召开了全体工作人员大会。在会上，

周恩来、叶剑英作了重要讲话，中心意思是黑暗即将过去，我们一定会胜利。当时叶剑英还领头高唱革命歌曲。会上群情激奋，更加坚定了胜利信心。第二天，国民党反动派组织特务歹徒四面包围八路军重庆办事处。叶剑英正气凛然地说：“我们共产党人是天不怕，地不怕。要沉着应付，坐于虎口，稳如泰山。”

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狂暴的白色恐怖，周恩来、叶剑英还用革命先烈同敌人英勇斗争宁死不屈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和高尚气节，向南方局和八路军办事处的工作人员进行革命气节教育。一次，周恩来在讲到方志敏烈士时，当场背诵了剑英同志缅怀方志敏烈士的一首诗：“血战东南半壁红，忍将奇迹作奇功；文山去后南朝月，又照秦淮一叶枫。”用以勉励大家。同志们听后深受教育，纷纷跑到剑英那里，把诗抄在自己的本子上，用以激励和鞭策自己。

党中央根据当时的国内外形势，从全局出发，对皖南事变的处理确定采取“政治上取全面攻势，军事上取守势”的方针。先后发表了关于新四军问题的命令及谈话，用以对抗1月17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命令及谈话。我中央军委的命令庄严宣布重建新四军，任命陈毅为新四军代理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张云逸为副军长，赖传珠为参谋长，邓子恢为政治部主任。蒋介石下令取消新四军番号，我们下令重建，针锋相对，寸步不让。1月22日，中共中央军委发言人对新华社记者发表谈话，提出了处理皖南事变的十二条办法。

为了打退这次反共高潮，打击蒋介石的反动气焰，周

恩来、叶剑英、董必武根据各方面的反映，联名向党中央提议，利用各种矛盾击破蒋介石的两面政策。在政治上，以新四军各支队名义发通电反抗国民政府军委会的命令，要求恢复新四军，释放叶挺，控告顾祝同和上官云相，并声明决心在原地坚持抗战以取得自由行动权；八路军将领发通电声援新四军，声明坚持抗战，保卫华北、西北，要求发饷和弹药。在军事上，山东以南部队仍用新四军名义反攻李品仙、汤恩伯等部；李先念部准备突破国民党部队的包围和夹击。这样，一旦蒋介石转入全面“剿共”，“我们一切有准备”。

1941年1月下旬，正当蒋介石集中力量反共的时候，日寇乘虚而入，集中五个师团以上兵力，分数路包围汤恩伯、何柱国、李仙洲、李品仙诸军约15万人于平汉以东，向河南大举进攻。同时，皖南事变，也引起了美、英的反对。蒋介石完全陷于孤立，不得已向我们党提出妥协办法：允许华中我军展期北移及新四军归八路军增编一军等条件。毛泽东指出：“蒋在危急时求妥协之心已可概见。我们必须坚持尖锐斗争立场，不达到我们必要条件决心不与之妥协。”

经过我们党一系列严重斗争，蒋介石被迫在3月6日的国民参政会上不得不表示：“保证”“以后决无剿共的军事”。至此，国民党发动的第二次反共高潮被打退。

“皖南事变”以后，1941年2月2日，叶剑英奉调从国民党统治区重庆乘坐一架所谓“空中吉普”的小飞机返回延安。

叶剑英回到延安，满心欢喜。他立即跑到杨家岭找到

毛泽东，把周恩来给党中央、毛泽东的信和邓颖超给毛泽东的照片，亲自送呈毛泽东，然后汇报了皖南事变前后与国民党进行谈判和斗争的经过。毛泽东同他进行了长时间的极为亲切的交谈。当天晚上，毛泽东亲自拟稿，打电报给在重庆的周恩来：“（一）剑英本日上午10时抵延，畅谈五小时。收到来示，欣慰之至，报纸题字亦看到，为之神往。（二）小超同志照片收到，敬谢。”这个电报，充分表达了党中央、毛泽东对周恩来、叶剑英在国统区工作的高度评价和深切关怀。

三、在延安参加中央军委工作

叶剑英从重庆回延安以后，党中央、毛泽东确定留他在军委工作。

1941年2月14日，中央书记处向全军发出通令：“叶剑英同志已回延安，现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参谋长，兼十八集团军参谋长，驻延安办公。”从这以后到抗日战争胜利，叶剑英一直住在王家坪，协助毛泽东、朱德指挥抗日战争。

主持参谋部工作

叶剑英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有深入的研究，善于联系实际来处理问题。他经常交代参谋部的工作人员：处理问题要特别谨慎，要遵照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意图办事，照顾上下左右关系，考虑下面的实际困难。

中央军委的许多重要军务和上呈下达的文电，他都亲

自处理，特别是军情电报，每天少则几十件，多则上百件。叶剑英代军委起草的许多文电，都是呈毛泽东、朱德审批签发或者联名发出。毛泽东起草的许多重要文电，不少是经毛、朱、王、叶共同签发的。有时出于工作需要，仅用剑英个人名义发出。毛泽东习惯于夜间工作，叶剑英也经常陪着不睡觉。总部的同志说，叶参谋长工作起来，不分白天黑夜，没有节假日。

叶剑英非常重视参谋部的建设。军委原有三个局，以后又成立了四局。他为参谋部建立了一整套工作制度：

一、建立定期汇报制度。当时的根据地，从海岛、边疆到内地，星罗棋布。在这些广大地区，我们的军事活动日益增多。作战局的作战室，为了及时掌握各区的作战行动，向军委首长汇报情况，得到指导，建立了定期汇报制度。汇报地点就设在作战室。汇报由叶剑英主持，作战局和有关参谋人员参加。有时，中央和各战区的领导同志从前线回到延安，也到作战室听取汇报。

二、编辑出版《作战周报》。把一周内发生的战况，敌、伪、友、我的军事动向，用简明的文字整理起来，附上标图，油印上送，供中央领导同志参阅。以后又在作战周报的基础上，每月综合一次，出版《一月军事动态》。鉴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处于紧张阶段，叶剑英又组织力量成立了资料研究室，收集、整理国际上的战争情况和研究外国的一些重要军事著作，出版《国际资料》。毛泽东看了这些材料以后很高兴，说这样做“大有帮助”。

三、研究对敌斗争策略。组织“各路诸侯”到王家坪，

参加研究对敌斗争的情况。当时，朱德、贺龙、陈毅、徐向前、陈赓、罗瑞卿等都参加过，大家自由发表意见。这些同志对叶剑英领导下的参谋人员的情况汇报，以及他们提出的观点和建议，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四、建立情报网。叶剑英非常重视情报工作的建设。他说：“长征时期尝到了甜头。那个时候，如果没有二局的工作，长征过不了关呀！应该肯定它的功劳。”根据中央关于加强调查研究的决定和叶剑英的提议，中央军委于1941年10月29日，正式作了《关于建立情报网的决定》，决定在第十八集团军总部、山东、冀察晋、晋西北、冀豫晋、冀中、大青山、新四军军部、二师、六师等十处，首先建立情报网的联络基点。情报网建立起来以后，情报联络渠道畅通，对于保证中央、军委首长准确及时地掌握情况，指挥作战，起了重要作用。

五、设立气象观测所。为了便于指挥作战，在叶剑英的精心指导下，逐步在各根据地建立了比较完整的气象观察制度。规定设立气象观察所，制定了气象观测所《工作细则》和《观察员须知》，还规定了气象报告详细观察的项目与方法。这不但保证了当时作战的需要，也为以后气象工作的建设奠定了基础。

为了做好参谋工作，叶剑英非常注意机关人员的学习。在他主持参谋部工作期间，自己带头并组织有关领导干部学习马恩列斯和毛泽东的军事著作，学习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并且定期进行讨论。组织业务干部学习文化，学习日语、俄语，规定学习时间，制定学习制度，并且组

织专人讲课。他还经常给机关干部作政治时事报告，用我们党历史上的经验教训和自己的切身体会，引导大家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政治与军事理论，强调要“把唯物辩证法，正确地运用在军事领域中，作为判断情况下定决心，指导战争的唯一法宝。”

叶剑英对部属的生活也很关心。他从重庆回来，看到机关的伙食很差，就亲自抓，经常到食堂检查督促。他把别人送给他补养身体的鱼肝油丸，分送给身体不好和有病的同志吃，把新大衣送给身体不好的同志穿，而自己一直穿他原来的那件旧大衣。有的同志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家庭生活困难，他还专门给在重庆的周恩来同志打电报，请设法予以接济。当时任一局局长的伍修权，为了执行紧急任务，调东北工作，头天接到通知，第二天就得出发，家务来不及料理。叶剑英说：“你放心去，家里的事情由我负责料理。”以后，他派人把伍修权的家属送到东北，使他们一家很受感动。

文化建设也是参谋部建设的一个方面。叶剑英多才多艺，他到王家坪以后，王家坪的文娱生活也随之活跃起来了。他自己动手做洋琴，教大家识谱，打洋琴，弹广东音乐，还和大家一起唱京戏，唱革命歌曲。在他的倡导下，俱乐部组成了乐队、演出队，经常组织演出，举行音乐会、舞会，使物质生活极端困难的延安，充满了愉快欢乐的气氛。大家对开展文娱活动很感兴趣。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李富春、陈毅、贺龙等同志都常去参加。

叶剑英经常借用古语“作之君，作之师”来鞭策机关的

领导同志。意思是说，作为一个领导干部，既要作领导，又要当老师。他自己就是这样以身作则、身体力行的。他一贯工作认真细致，作风扎实严谨，对下级耐心体贴，又要求严格。工作人员起草的文电，他都要字斟句酌，反复修改，并且常常提醒大家，一定不能马虎，以免给革命带来损失。参谋部的同志们说：“叶剑英同志真是我们的好参谋长。”

多 谋 善 断

叶剑英回到延安不久，1941年6月22日，苏德战争爆发。德军突然袭击，战争第一天，苏军的第一道防线即被德军突破。战争头三个星期，德军在西北、正西和西南三个方向上同时推进了数百公里，占领了不少地区，逼近列宁格勒，威胁斯摩棱斯克和基辅，形势十分严重。与此同时，日本法西斯也更嚣张。

面对这样一个严重局面，我们当面的敌人——日军会出现什么样的动向？是北进还是南下？叶剑英及时组织参谋部有关人员进行了讨论。当时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日军很可能乘人之危，配合德军，北上进攻苏联；一种意见认为，从整个局势看，日军南进的可能性大。因为日本是小国，资源匮乏，而东亚、南亚有丰富的资源，可供其“以战养战”，且东南亚各国，军力很弱，容易攻取。如果北攻苏联，则又要啃硬骨头。这方面，日本是有过教训的。讨论结果，多数同志认为，日军南进的可能性大。叶剑英归纳大家的意见说：我们的战略思想和战争准备，虽

然要预计到日军北进、南进两种可能性，但是当前的侧重点应当是对付日军南下。为此，他指定专人将讨论的情况和结论，整理成书面材料，上报中央，供决策参考。

就在这时，日本统治集团内部也出现了南下和北进之争。日本“御前会议”决定，“继续向南方扩张”，“不辞对英、美一战”。

叶剑英对日军动向的分析是很有预见的。后来战争的进程证明这一分析是完全正确的。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以后，日寇对国民党采取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战略重点转向敌后战场，集中力量打击我们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因此，敌后解放区便成了中国抗日战争的主要战场。同时，国民党顽固派一再掀起反共高潮，敌后许多地区又出现了百年不遇的自然灾害。从1941年到1942年，我解放区战场处于极端困难的境地。毛泽东曾经说过：“敌人把我们压到茶壶顶顶上来了。”叶剑英作为我军的参谋长，为战胜敌人和克服当时的困难日夜操劳。他组织大家反复学习毛泽东关于持久战的思想及有关战略方针和战术原则，并按照毛泽东关于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领导方法，将解放区各根据地斗争的一些经验，加工整理，概括提高，及时报告党中央，然后由军委参谋部通报各根据地执行。经过反复实践，再总结提高，逐步摸索出一套对付敌人的办法：实行主力兵团地方化，地方兵团群众化，大力发展民兵，广泛开展游击战争；采取“敌进我进”、内线与外线相结合、分散与集中相结合的作战方法，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派遣精干的武装工作

队深入敌后之敌后，发动群众，摧毁伪组织和伪政权，保护人民的生命、财产，恢复和扩大根据地……这些办法的推广，变成了强大的物质力量，有力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

叶剑英以他锐敏的眼光，密切注视着苏德战场战局的发展。1941年冬，德国法西斯在莫斯科会战失败后，被迫放弃全面进攻计划，于1942年夏在苏德战场南翼实施重点进攻，全面攻击斯大林格勒。当时，有些同志被德国法西斯疯狂一时的现象所迷惑，看不出它外强中干，苏军快要胜利的实质。当苏军在斯大林格勒抗击敌人的全面进攻，并且取得了突破德军包围的胜利后，还认为只是一般的胜利。叶剑英同参谋部的一些同志对苏德战场上两军力量对比进行了仔细分析，认为这次胜利是整个苏德战争的转折点，并将搜集到的有关资料汇总起来，阐明自己的观点，上报党中央，受到了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的称赞。苏德战局此后的发展证明，叶剑英的分析是符合实际的。

一个重要的建议

1943年六七月间，国民党顽固派发动了第三次反共高潮。蒋介石、胡宗南在陕甘宁边区周围集结了四五十万主力部队，准备向我边区发动大规模进攻。当时我主力部队大都深入敌后对日作战，留在陕甘宁边区的部队总共才三四万人，情况十分严重。

叶剑英和参谋部对国民党胡宗南进犯陕甘宁边区的军事部署和部队调动情况，了如指掌。叶剑英在仔细分析

敌情后认为，光靠我们的军事力量去打退国民党军队的进攻，在当时是难以办到的，必须在军事上作充分准备的同时，采取以智胜敌的办法：破例使用我们掌握的军事情报公开揭露国民党的进攻阴谋，作为退兵之计。但是，公开揭露，可能给我们的情报工作带来一些不利的影响。他考虑再三，并且专门征求了业务部门的意见，从斗争全局出发，权衡利弊，认为应当公开揭露。于是，他便把自己的想法报告了毛泽东、朱德。

党中央开会讨论这个问题时，采纳了叶剑英的建议，决定除按预定计划从晋西北、五台、太行调兵作军事准备，并发动陕甘宁边区军民随时准备给来犯者以迎头痛击外，同时大力开展宣传战，公开揭露国民党顽固派破坏抗战，破坏团结，制造内战的阴谋。

7月4日，朱总司令致电胡宗南，揭露胡宗南准备进攻边区的阴谋。

7月6日，朱总司令又致电蒋介石、何应钦，呼吁团结，避免内战。电报说：自5月以来，边区周围友军，不断进迫，我一再退避。自6月18日胡宗南到洛川召开军事会议后，边境突呈战争景象，河防大军，纷纷西调，弹粮运输，络绎于途。道路纷传，国民党中央将乘共产国际解散机会，实行大举“剿”共。当此抗战艰虞之际，力谋团结犹恐不及，若遂发动内战，兵连祸结，则抗战团结之大业势将破坏，而要日寇坐收渔利，并使英美苏各友邻之作战任务亦将受到影响，心所谓危，不敢不告。

7月7日，新华社全文广播了朱总司令给胡宗南、蒋

介石的电报全文，并且详细公布了国民党军队调动的情况。同时指出，“内战危机，空前严重，抗战前途，千钧一发。”一再公开呼吁团结，要求制止内战。

7月9日，延安召开数万人的群众大会。大会通电全国，揭露国民党顽固派制造内战的阴谋。

7月12日，毛泽东为《解放日报》撰写社论——《质问国民党》。社论指出，蒋介石叫嚣要解散共产党，取消边区，弃守河防，部署攻打边区，同日寇汉奸一模一样。警告他必须立即撤退进犯边区的军队，纠正错误。

我们这一场以军事实力作基础的声势浩大的政治宣战，赢得了国内外友好人士的同情，搞得国民党顽固派措手不及，十分被动。

正当胡宗南日夜调兵遣将，准备对边区发动闪击战之际，我广播电台、报纸突然把他们的军事机密公诸于世，而且那么准确、及时，使顽固派大为震惊。胡宗南甚至怀疑内部混入了共产党，于是，立即进行清查。结果找不到证据，只好不了了之。

蒋介石、胡宗南见阴谋已经败露，又遭到了国内外舆论的谴责，难逃重新挑起内战的罪责，只好致电朱总司令，表示并无进攻意图。胡宗南则说：“敝部换防，请勿误会”。国民党顽固派导演的这幕反共丑剧，就匆匆收场了。

接待中外记者参观团

1944年是苏联红军反对德国法西斯的战争取得决定性胜利的一年。在这一年中，苏军对德军连续进行了十次大

的打击，在苏联全部国土上肃清了法西斯侵略者，并把战争推进到希特勒德国及其占领区内。同年6月6日，美、英等国军队在法国诺曼第登陆，开辟欧洲第二战场。与此同时，美军在太平洋发起进攻，逼近日本本土，并且逐步切断日军的海上交通线。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发展，中国敌后战场在对日作战中的地位，越来越引起盟国的关注。当时以罗斯福、邱吉尔为首的美英领导人和以史迪威、蒙巴顿为首的美英远征军将领，都想利用中国解放区的军民力量，配合他们作战，以争取抗日战争早日胜利。但在国民党反动派的造谣诬蔑和层层封锁下，解放区的情况，很多人都不清楚。因此，许多中外人士都想到解放区看一看，了解一下解放区的真实情况。经过长期的斗争，国民党反动派才不得不同意派一个中外记者参观团到延安等地进行实际调查。

1944年5月17日，中外记者参观团由重庆出发，经西安、临潼、大荔、韩城、宜川，于6月9日到达革命圣地——延安。

对于中外记者参观团的到来，党中央和八路军总部很重视，热情、诚恳地接待了他们。到达的当天，由叶剑英参谋长出面，设宴招待他们。针对国民党记者强调要一起活动，而外国记者则主张分开活动的情况，叶参谋长向记者参观团表示：“你们要到什么地方，前方、后方都可以，一起活动、分开活动，都可以，由你们自己决定。”从而打破了国民党阻挠记者参观团深入调查了解解放区真象的企图。6月13日，毛泽东会见了他们，并且回答了他们提出

的问题，畅谈了国内外局势。接着，朱德和叶剑英一起会见了英国记者斯坦因和美国记者福尔曼，和他们进行了较长时间的交谈。其后，叶剑英按照他们的希望和要求，组织他们参观访问延安，走访前线。

这些记者，渴望知道延安的情况。这次，他们有机会到延安，感到很新奇，每个人的脑子里都装了一大堆问题。英国记者斯坦因说：在三个月以前，美国要求派我们来延，看一看延安的人是怎样的，到底在做些什么事，敌后到底是什么情形。外面对延安（共产党）信仰很高。很多外国朋友经过这里出去，都说共产党好，国民党不好，但不敢完全相信。为了合作得更好，我们这次来实地看一看。美报记者爱泼斯坦说：德国的希特勒快完了，但还有个对日本作战的问题。在中国，国民党那么腐败，没有什么战斗力，对日本的战争什么时候能结束，谁都不知道。从反法西斯的角度，从打日本的角度，我们对共产党，对八路军、新四军抱有一定的希望。

他们想着重了解三个方面的问题：第一、从军事观点说明共产党军队在战时与战后的潜在力量；第二、了解共产党对重庆国民党的关系和态度，以及与国民党、美国、英国武装力量合作能够采取或应当采取的形式；第三、战后共产党军队为保持远东和平，在军事方面能够并愿意担任任何种任务。

中外记者经过几个月的参观访问，上上下下，前线后方，机关连队，没有他们不去的地方。福尔曼、爱泼斯坦、武道还随同美国官员卡伯格（医生）一路步行、骑马东渡

黄河，到了晋绥。俗话说，“百闻不如一见”。这样，耳闻目睹，他们脑子里的疑团消除了，带来的问题解决了，他们感到很满意。

美国记者福尔曼说：“我们看到了许多东西，知道边区外有些人过去告诉我们的是不对的。过去有人告诉我们，八路军不打仗，现在我们亲眼看见了八路军是作战的；过去有人同我们讲，八路军没有伤兵，现在我们看到了八路军是有伤兵的；过去有人给我们讲，八路军没有捉住俘虏，现在我们看到了八路军捉到的俘虏；过去有人给我们讲，边区的人民害怕并恨八路军，现在我们看到了人民爱戴八路军、拥护八路军。”

一天夜里，美报记者爱泼斯坦发觉福尔曼二三点钟还翻来复去睡不着觉，便问他在想什么问题？福尔曼说，我想这些共产党员，他们在这里搞这些事情，得到了什么个人利益？我看他们没有什么个人利益，完全是为了他们的事业。我没有想到在世界上有这样的人。所以，我佩服他们，赞成他们。

英国记者斯坦因在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上发表文章说：“在封锁线后面发现这样一个热烈的新社会，简直使我目瞪口呆。在重庆，五年以来，对共产党，除恶意的诽谤而外毫无所闻的我，对着在延安我所发现的事物，我吃惊地擦拭着我的眼睛。”

1944年6月22日，叶剑英正式向中外记者作了关于《中共抗战一般情况的介绍》。为了便于外国记者集中精力听介绍，还专门给他们发了翻译成英文的油印稿。

叶剑英的这次介绍，特别是关于国共两党军队抗击敌军的鲜明对比，给中外记者以深刻印象。他说：共产党领导的正规军和地方军共47万人，抗击的敌人占侵华日军总数的64.5%，而国民党有几百万军队，抗击的敌人却只占35.5%。如果把全部敌军、伪军加在一起，共产党抗击了敌、伪军总人数134万人中的110多万，占84%，或5/6以上，而国民党却只抗击了敌伪军二十三四万人，仅占16%，即不足1/6。而且国民党军队有近50万人投降了日本，日本用这些人来对付八路军。这些事实清楚地表明了：国民党兵很多，得到了很多外援，打的敌人却很少；共产党兵很少，打的敌人却很多。共产党的胜利，是没有别人帮助，依靠自己取得的。在整个敌后战场上打败敌人，完全靠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革命军队。

叶剑英参谋长关于《中共抗战一般情况的介绍》，一经与中外记者参观团见面，即冲破了国民党的重重封锁，很快传到了美国、英国，传到了全世界，震惊中外。它以雄辩的事实，说明了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和党直接领导下的八路军、新四军在抗战中所起的重大作用，也无情地揭露了国民党腐败无能和消极抗日的真相。

中外记者参观团对叶剑英的这次介绍，感到极大的兴趣，认为是“第一流的报告”，有人评论这次著名谈话，是“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与中共高层意见于一身的谈话”，“掷地有声”。爱泼斯坦说：“叶剑英参谋长的报告，很全面，很具体，很有说服力。”“中外记者参观团到延安，是国民党宣传机器的大失败，是中国共产党在世界范围内

一个很大的胜利。”

和美军观察组的交往

继中外记者参观团之后，美军观察组于1944年7月22日来到延安。

美军观察组到延安是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和准备的。从1943年初到1944年1月，美国驻华使馆一秘戴维斯、二秘谢伟思等人，不断向美国当局反映情况，提出建议，要求向中共地区派出观察组。他们的建议，得到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将军的大力赞助，引起了美国总统罗斯福的重视。经过详细研究，罗斯福决定派一美军观察组到中共地区。1944年2月19日，罗斯福将此决定通知国民党蒋介石，遭到蒋的激烈反对。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官员开始借口这是纯属中国内部的事情，拒绝美国插手。继而提出，实在要去就派人到国民党所控制的附近的一些地区去看看就算了。美国提出，既要派观察组去，就一定要到共产党控制的地区去。双方争持不下，罗斯福只好派副总统华莱士访问中国，亲自做蒋介石的工作，并从多方对蒋介石施加压力，这样，美军观察组才得以成行。

观察组组长由曾在中国学过四年中文的情报专家、长期担任美国驻华武官的包瑞德上校担任，观察组成员，大部分是属于史迪威将军的中缅印战区总指挥部的军人，也有美驻华使馆的外交官。他们分两批，每批九人，先后于7月22日、8月7日乘飞机抵达延安。以后，陆续又有少数人员补充、接替，前后共约30余人。观察组的任务，主

要是了解日军、伪军的战斗序列、战斗行动、军力大小和我党我军的政治、军事情况、军事势力、战争潜力，以及利用边区为美海空军提供气象情报等。

7月22日，美军观察组第一批人员乘一架运输机来延安。周恩来、叶剑英等前往迎接。

美军观察组在延安，毛主席、周恩来副主席和朱总司令曾多次会见他们，和他们交谈，亲自做他们的工作。彭德怀副总司令专题介绍了《八路军七年来在华北抗战的概况》。陈毅同志向他们介绍了新四军华中七年来对日作战情况。各根据地的创立过程和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建设情况，都由各根据地的负责人向他们作了介绍。叶剑英参谋长则根据党中央的决定，向他们全面介绍了敌后战场情况和我军的编制、装备情况。

对叶剑英的这次介绍，包瑞德在他的《1944年美军观察组在延安》一书中（1970年出版），曾描绘说：叶剑英是一个高大、英俊、健壮的男子汉，衣着始终整整齐齐。他是广东客家人，讲话带有广东口音。他的介绍总的来说，是客观的。

美军观察组在延安附近还参观了南泥湾三五九旅的军事训练，七一八团军事演习，绥德抗日军政大学等。

在叶剑英的精心安排下，观察组还分小批赴我抗日根据地观察了解情况。如鲁登、毕德金、惠特尔西、多姆凯、彼雷斯等五人去晋察根据地，他们骑毛驴出发，历时四个半月，行程二千英里。实地观察给他们上了很好的一课。

观察组成员谢伟思在他的第26次报告中说：“共党在各游击基地均居优势并具影响力，且已获得农民与自由人士之支持。”鲁登在向美驻渝大使馆的报告中写道：“经数月华北、察绥实地证实，中国共产党及其军队深得人民拥护和爱戴。”戴维斯在总结观察组几个月观察的结论时断言：“蒋所领导之封建中国，无法与中国北部广得人心之现代政府长期竞存。中国前途握于中共而不属于国民党。”

到延安的美军观察组，对我态度基本上是友好的，大部分人对我解放区政治、军事情况的看法比较客观，对我党、我军的抗日决心和实力有较正确的估计。

观察组在延安期间，还向我十八集团军司令部的干部介绍过美国陆军训练方法、美军爆破材料的使用方法等，还赠送给我们一些气象设备、无线电器材等。

1944年九十月间，美国政府先后派赫尔利、纳尔逊和魏德迈等人来华，帮助蒋介石一面准备反共反人民的内战，一面进行政治欺骗。不久，纳尔逊被任命为国民党政府的最高经济顾问，魏德迈被任命为中国战区参谋长，赫尔利被任命为美国驻华大使，进一步加强了美帝国主义对国民党统治区的控制。1945年4月2日，赫尔利在华盛顿公开发表扶蒋反共声明，声称美国只同蒋介石合作，不同共产党合作，要帮助蒋介石以武力“统一”中国，等等。这就充分暴露了帝国主义的面目。

1945年6月2日，叶剑英应美军观察组的约请，同毕德金中校、斯文生少校及斯特尔上尉进行了会谈。会谈中，美军观察组提出，根据美军魏德迈将军的指示，他们要负

责在华建立美军通讯网，在延安数英里内设立侦察电台，由美军派四个人管理。拟派三人去太行、一人去晋察冀工作；并要求派气象人员去晋绥进行风云测量，派人与八路军司令部有关人员共同统计敌军死伤情况；要求派两架单引擎飞机到延安，以延安机场为基地，供他们作为联络、接取供应之用。

叶剑英根据美国当局对我政策的变化，在与美军观察组的会谈中，始终坚持了高度的原则性和策略的灵活性。他针对观察组提的问题和要求，指出：观察组来延安一年，“可分为赫尔利声明以前及声明以后两个时期。前一时期，我方对美军是无条件合作，虽然此时美军总部并无合作的信件给我们”。以后赫尔利声明，“不愿与我合作，我们此时仍然希望合作。”“今天你们提出华北通讯网计划，说是魏德迈指示批准进行的，但是，魏并无介绍信或公函给我方提出此事。”

“以前考虑海军登陆、气象、通讯、情报，都是在美方要合作的前提之下来考虑的，不是孤立的”。“现在，需要魏德迈、迪凯，或任何负责人员公开表示合作，谈论整个计划，然后才能谈各个部分问题，更后才能施行。”

由于美国政府采取不合作态度，我方才拒绝了美军观察组无理要求建立通讯网的问题。

参加延安整风和“七大”

我们党经过1935年的遵义会议和1938年的六届六中全会，王明“左”和右的机会主义路线虽然已经被克服，但历

史上遗留下来的特别是三次“左”倾路线遗留下来的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等不正之风，还远没有来得及在全党加以彻底清算，影响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进一步统一，阻碍党的正确路线的贯彻执行。

为了提高全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水平，加强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基础上的统一，从1942年开始，我们党在全党范围内进行了自上而下的群众性的整风运动。

1941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党的干部会议上作了《改造我们的学习》的著名报告，正式提出了反对主观主义的任务。同年七八月，党中央连续作出了《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九十月间，党中央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详尽地检讨了过去的路线是非问题，在党的高级干部中开始整风，这是全党整风的预备阶段。

参加这次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同志，对毛泽东和他的思想、实践，作了科学评价，对王明路线进行了严肃批判，同时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揭露和检讨自己的错误。叶剑英参加了这次会议，在会上作了发言，高度评价了毛泽东思想，主动作了自我批评，表示要按整风精神严格要求自己，并要求中央领导同志多加督促。

1942年2月，毛泽东作了整顿三风的报告，明确提出了“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的整风任务。不久，党中央正式发出了在全党进行整风的指示。从此，全党范围内的整风运动就轰轰烈烈地展开了。

这次在全党进行整风，是一个普遍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教育运动，取得了巨大的成效。参加整风学习的同志，经过学习文件，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摆事实，讲道理，普遍提高了理论水平，分清了路线是非，增强了党性，自觉清理思想，改造世界观。

整风运动，按照党的方针政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弄清思想，团结同志，本来搞得很好。可是，到了后期，康生来了个“抢救运动”，搞逼、供、信，审干扩大化。叶剑英感到康生的做法有问题，说：“延安有这么多特务呀？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延安还能不能存在？这样搞法不行。”他一方面认真掌握政策，保护了一批同志，一方面向党中央、毛泽东谈了自己的看法。后来，毛泽东提出九条方针，强调“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纠正了康生的那套做法。

叶剑英坚决贯彻执行毛泽东的九条方针，纠正了军委直属队某些“左”的作法。他非常重视体现党的政策，率先行动，对挨过整的同志，一一谈话，实事求是，弄清问题，落实政策。这一点给大家留下深刻印象，都觉得，在他领导下工作，心情舒畅，政治生命有保障。

为了这件事，康生在毛泽东面前告了叶剑英的状，说他右倾，并且两次蛮横地剥夺了他参加政治局扩大会议的权利。

1945年4月，在全党整风的基础上，党的六届七中全会作出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接着举行了党的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七大”，总结了历史经验，确定以毛泽东思想作为我们党的指导思想，并

且为建立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制定了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使全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达到了空前的统一和团结。

叶剑英以大后方代表团团长的身份出席了大会，并在大会上作了长篇发言。他在发言中，代表大后方代表团全体同志完全拥护毛泽东、刘少奇、朱德等的报告，完全拥护毛泽东提出的“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的政治路线，并且用大量事实论证了毛泽东在政治报告中对国际形势的分析的正确性。叶剑英在这次大会上的发言，始终贯彻整风精神，严格要求自己，他向大会一再表示：“我应该承认，我做参谋工作一生，没有做好。我搞了二十五年，十八年在党内，七年在党外。党的历史是轰轰烈烈，我个人是昏昏懵懵。我们今天干的新民主主义，新民主主义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这个最近才了解。毛主席告诉我们，我们干的就是这样的革命。第一，要学会认识敌人、朋友；第二，要学会组织队伍；第三，要学会指挥。三句不离本行，我把它编成三句，认识敌友，组织队伍，指挥作战。这是我最近学会的。党的路线，放手组织群众，也是最近学到的……这次参加学习整风，我也没有整好，只是有了一股劲，要干，不怕自己胡子长。今天应向大会同志声明，我搞了一生，没有搞好，还有若干年，我有信心要搞好，主要靠毛主席和中央同志的教导，帮助我进步，这是我附带的请求。”叶剑英在这次大会上的发言，受到与会同志的

称赞。

党的七大开得很好，它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基础。就是在这次大会上，叶剑英当选为中央委员。

何长工谈罗坊会议前后的几个问题

(一)如何看待红军两次攻打长沙的问题

1930年七八月，红军两次攻打长沙。第一次是在7月，红三军团攻占长沙；第二次是在8月，红一、三军团在湖南浏阳永和会师，组成红一方面军后围攻长沙。对这次攻打长沙的历史背景、经过等，我在《难忘的岁月》一书中都写了。

对于如何评价红军这两次攻打长沙的问题，这几年党史界曾发表过一些不同意见的文章。展开讨论，这是好事，说明学术风气活跃。对于两次攻打长沙如何评价的问题，我认为历史已经实事求是地作了结论。在1931年3月18日苏区中央局扩大会议第一号决议《接受国际来信及四中全会决议的决议》中指出：“三军团第一次进攻长沙在整个政治路线上是执行立三路线，但三军团所以能够占领长沙，在政治意义上获得这样大的胜利，是因为三军团前委正确底估量了长沙本地的敌我力量的对比（关于全国阶级力量的对比的分析，前委是犯了立三路线底错误估量），是因

为三军团底英勇斗争。至于第二次进攻长沙，则更是冒险主义了。但长沙战争明显的证明了立三路线是行不通的，宣布了立三路线底破产。”我认为这个决议在对待红军攻打长沙的问题上，它的基本精神是对的。

尽管当时苏区中央局扩大会议是在王明路线时期召开的，但苏区中央局的书记是项英同志，参加这次会议的大部分人是经历和了解两次攻打长沙的领导干部，如毛泽东、朱德、彭德怀、林彪、周以栗、曾山、陈毅等，他们实事求是地作了总结。王明路线在这个时候并没有在苏区中央局占主导地位。这个结论，对三军团第一次攻占长沙，既指出了错误，也肯定了成绩。在错误方面，就是在政治路线上执行了错误的东西。因为当时我军处于敌强我弱的形势下，立三中央没有看到这一点，错误地估计了形势，相反把自己的力量看得过于强大，集中全国各地的红军离开根据地去攻打大城市，企图夺取一省或数省的胜利，结果遭到挫败。三军团第一次攻打长沙虽说是乘胜追击，但是应该看到，它是立三错误之下的产物。尽管我们当时攻进了，一度占领并建立了湖南省苏维埃政权，但终归弃城而走，仍回到乡村去。我们聊以欣慰的是，三军团攻占了省城长沙，震惊了中外，政治影响很大。在瑞金叶坪，毛泽东同志找刘伯承同志和我谈话时，刘伯承说：“你们打开长沙，震动了共产国际的领导人。”战果也是辉煌的：先后歼灭敌人近五个旅；缴获了大量的武器弹药和通讯器材（军用电台九部和几百部电话机等）；筹款30万银元；扩大红军五六千人；红军的装备也得到了较大改善。这样就大

大增强了主力红军和地方武装的战斗力。同时处决了党内叛徒和一批反革命分子，解放了几十万长期遭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人民和狱中几千名党的优秀儿女，建立了第一个全省的苏维埃政权和总工会，组织了许多革命群众团体，大长了红军和劳苦人民的志气，大灭了敌人的威风。如此伟大的壮举，无疑在政治上、军事上都具有很大的影响。三军团这种英勇战斗的光辉历史是永远彪炳于我国光辉的革命史册的。对这些成绩，苏区中央局的结论也是肯定的。

对攻打长沙事件目前史学界有争议，有不同的说法，比如，说一打长沙是抵制立三路线啊，等等。我除了前面谈到的意见之外，在这里联系当时的实际再补充谈一点自己所了解的情况，从这里可以清楚地看到打长沙和立三错误的关系。1930年的5月，红五军派滕代远和我去上海参加苏区和红军代表会议，这是为立三错误鸣锣开道的两次会议。我们回来作了传达，为此决定攻占长沙。苏区中央局的决议说，红三军团执行了立三路线，我认为没有什么可怀疑的。老实说，我那时也不完全了解立三的错误，作为军队来讲只知道执行党的决议。直到从长沙撤围东渡赣江，听了传达中央纠正立三错误的会议以后才完全明白。

为什么说第二次攻打长沙，则更是冒险主义了？这是因为：第一，在政治路线上是执行立三的“左”倾冒险计划；第二，总前委没有接受三军团第一次攻占长沙，由于敌强我弱，被迫退出长沙的教训；第三，第二次攻打长沙时，对敌我力量的对比，完全是机会主义的错误估计。这时敌

人已增强到30多个团的兵力固守，筑有坚固的工事，如电网、战壕、碉堡等等。德国帝国主义还派了军舰去湘江游弋。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我们又是攻坚战，想攻进长沙去，则更是冒险了。所以围攻了半个月，在形势对我十分不利的情况下，毛泽东、朱德同志召开总前委会议，当机立断，决定撤围长沙。这也就是战争的实践否定了立三错误。

(二)关于红军撤围长沙后至罗坊 几次会议的内容及相互关系

红一方面军从长沙撤围直到罗坊会议，总前委召开了重要会议。对这些会议的主要内容及其相互关系，我根据历史文件，结合我个人参加这段斗争所经历和了解的情况谈谈我的一点看法。

在前面提到的1931年3月18日苏区中央局的文件中说：“攻打长沙后（这时一军团与三军团汇合，成立总前委），事实证明，立三路线是错误的，行不通的，所以总前委即由开始怀疑立三路线，进而反对立三路线，转变到正确的路线上去。这个转变的正式形成，是在新余的罗坊会议，这就已经在党的文件上，明显的确定了这个转变，这是经过袁州会议、峡江会议、太平圩会议许多严重斗争，才有这个结果。”这段话比较客观地概括和论述了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对立三错误的态度及总前委从执行其错误部署转变到正确方面上来所经历的曲折斗争过程。

1930年8月23日，红一军团与红三军团在浏阳永和市会合，成立了红一方面军总司令部和党的总前委。根据立三错误的战略部署，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再度攻打长沙。从8月28日开始围攻，到9月12日撤围，整整有半个月之久。其间发动过几次攻势，长沙始终攻不开。我军伤亡损失不小，形势对我们是很不利的。铁的事实充分证明了集中红军去攻打中心城市是“左”倾冒险的，不合时宜的，在实践中是完全行不通的。因此，总前委在没有得到中央撤围长沙指示的情况下，果断地撤围长沙。军至株洲，并于9月13日召开会议，初步总结了围攻长沙的经验教训，作出回师江西，攻取吉安的政策。这就使总前委由“怀疑立三路线”走到了反对立三路线。这一具有重要意义的行动，正如英国作家史沫特莱在《伟大的道路》一书中写的那样：1930年“9月13日（应是9月12日—引者）下午8点钟，朱德和毛泽东采取了一生事业中最重大的步骤之一，这一步骤扭转了中国革命运动中的一次严重的危机。他们推翻了立三路线，亦即党中央委员会所通过的决议，而命令部队从长沙撤退。”

红一方面军9月中旬撤围长沙到10月下旬的罗坊会议，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事实：一方面，毛泽东领导的总前委以极大的勇气在尚未得到党中央停止执行立三错误指示的情况下，采取一系列实际步骤，在行动上一步步地纠正和反对立三错误；另一方面，我们可以从长沙撤围后的一系列会议来看，在一方面军内部对反立三错误是逐渐走向统一的。否则无须开这么多的会。毛泽东、朱德以极大的耐

心并结合事实来教育干部，才逐渐摆脱立三错误的影响，把红军的行动逐步转向正确的方面。从株洲会议之后，又召开了袁州、峡江、太平圩会议。

首先谈谈袁州会议的情况

尽管撤围了中心城市长沙，9月13日在株洲发布了《进攻吉安的命令》，这是在反对立三错误上迈出了有决定意义的第一步，但从它的整个战略口号上来看，还是进攻大城市，同党中央提出的进攻口号仍然是一致的。这个命令中说：“我方面军接受中国共产党中央指示，有在争取革命暴动的首先在武汉胜利夺取全国政权前提之前，汇合江西千百万工农贫民在集中进攻策略之下猛烈的最火速的最勇敢的夺取南昌南浔路以至湖口，消灭鲁涤平及江西反动统治，截断长江，封锁长江，向右进攻南京，向左保障争取武汉之任务，决定了夺取南昌的第一期方案，以第一军团攻取，第三军团略取峡江、新淦、吉安”。根据这一命令，我们三军团于9月13日已离开株洲，随即沿着醴陵向萍乡出发，9月20日到达。24日又由萍乡出发，一军团向吉安，三军团向临江一带前进。但在这一阶段的行军中，有个先打吉安，还是先打南昌的问题。

9月28日，当总部机关、部队到达袁州（宜春）地区时，总前委立即在这里召开会议。就红军的军事行动围绕先打吉安还是先打南昌的问题，展开讨论。对于这个问题，自撤围长沙以来，虽然在株洲、萍乡以一军团的名义下发了进攻吉安的命令，但在红一方面军的一些高级干部中并没有得到统一。在袁州会议上进行了激烈争论，有些干部

还是反对先打吉安。为什么有些同志反对先打吉安呢？他们的理由是：先打吉安后打南昌，就是不执行中央的指示，就是断送中国革命高潮。会议通过争论，最后还是确定按原来的决定去打吉安。又以一军团的名义于9月29日下午发出“照原计划拟于明（30）日由此地（宜春城）出动，经分宜向吉安前进”的命令，我们三军团的部队则按原计划经新余，向清江县的临江府一带开进，担任对南昌、九江方面敌人的警戒任务。袁州会议，坚持了攻打吉安的计划，这是实际纠正立三错误的一个重要成果，也是进一步说服教育干部摆脱“左”倾错误的一个重要步骤。

关于峡江会议的一些情况

10月4日，红军攻占了吉安，红一军团及红一方面军总部各机关在吉安工作了10天。这时，虽然党中央已经在9月24日于上海召开了六届三中全会，作出了红军停止攻打中心城市的冒险行动的决定，但是，由于国民党对根据地的封锁和交通不便，三中全会精神并没有传达到红军中来。总前委在总的战略上还是要服从于中央原来的指示，并要继续按撤围长沙后在株洲作出的行动计划向南昌、九江前进。10月13日，总部在吉安城发出的《移师北上向清江集中的命令》提出：“进攻南昌、九江消灭鲁涤平敌军，夺取江西全省政权，向左保障武汉暴动胜利，向右进攻南京，以促成全国直接革命之任务。”从13日的命令中，我们完全可以看出，红军的军事行动还是要进攻中心城市。

10月17日，红一方面军总前委抵达峡江。为此，总前委在峡江召开全体会议。会议对时局估量、行动问题、土

地问题、工商业政策等问题都作了决议。参加这次会议的是总前委委员和军以上干部。在峡江，我们得到了国民党的军阀混战已经结束了的消息。毛泽东在会上敏锐地指出了国内形势的变化，正确地判断蒋介石要集中兵力对付红军。会议对时局问题作出了阶级矛盾超过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时，反动统治阶级必然联合起来进攻革命的估计，红军的任务必须为打败敌人的进攻作好准备。毛泽东在峡江写给湘东特委的信中，就更证实了峡江会议对时局分析的正确。我们可以认真研究一下毛泽东的这一段话，他说：“我们认为统治阶级的军阀混战暂时不能调和停顿，但也不会继续扩大到底。”“我们不能离开阶级立场来分析，以为军阀混战会扩大下去，继续到底。要知道阶级矛盾超过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时，反动统治阶级必然联合起来进攻革命。”“所以我们的任务是要在反动统治阶级争取改良主义的领导权未解决之前，来一个一省首先胜利，继续此胜利的发生与扩大，来冲破消灭反革命的联合进攻。”毛泽东在峡江会议上的这些对时局的分析，就从根本上否定了李立三认为军阀混战总是越打越大，最后自己灭亡的错误估计。所以峡江会议对于纠正立三错误对形势的冒险主义的估计，克服其在红一方面军中的影响，从思想上转到正确路线上来又向前进了一步。

关于太平圩会议的情况

峡江会议的第二天，我就回到了八军军部驻地临江。这个10月19日命令（指红一方面军总部在峡江发出的《进攻高安的命令》），是峡江会议之后发的。从这个命令也可

可以看出，峡江会议之后，总前委通过对时局的正确分析，对克服立三错误转变到正确的路线上是大大前进了一步的。命令只是说：“方面军以直占南浔路待机略取九江、南昌之任务，第一步拟先歼灭高安当前之敌而占领之。”这里只提占领南浔路，相机略取九江、南昌之任务。同占领吉安后的提法大不一样了。20日红一方面军总部机关及一军团继续向袁水流域推进，22日到达太平圩。为了继续讨论红军的军事行动问题，总前委于10月23日又召开会议，这就是太平圩会议。

总前委来到太平圩时，根据我们探测到的敌人的情报，完全证实了毛泽东在峡江会议上对军阀混战的分析是十分正确的。国民党军阀战争暂时缓和，接着调兵遣将大肆进攻我们。敌谭道源师全部开到了南昌，许克祥、熊式辉师已到了九江，金汉鼎、毛炳文两个师都开来江西，公秉藩师扎在抚州，袁州有湘敌罗霖的部队。

根据敌情严重的变化，太平圩会议又立即改变了峡江会议进攻南昌、九江先占领高安的行动计划，决定用七天的时间（即从10月24日至30日），将主力部队靠新余、清江的袁水两岸配置；发动这一带群众，筹措给养，准备在这一带摆开架势，创造战胜敌人的条件。太平圩会议对敌人将要进攻我军的形势，已经是看得比较清楚了。但是，太平圩会议面对敌人要进攻我们，红军是继续前进，还是后退？我军到底在什么地方反“围剿”？这些问题并没有得到彻底解决，甚至有些高级干部极力主张前进打进攻之敌，要继续采取攻打南昌、九江的军事行动。

关于罗坊会议的情况

从以上我所谈的袁州会议、峡江会议、太平圩会议的一些情况来看，虽然对于纠正立三错误在红一方面军中的影响，克服“左”倾盲动主义的军事行动，是一步步地前进了，但是在红军和江西地方党内立三错误仍有较深的影响。这时，敌人的包围圈逐渐形成，红军是在这里同敌人决战，去执行进攻南昌、九江的军事计划呢，还是东渡赣江到根据地，在极为有利的条件下反“围剿”？这个问题至关紧要，它不仅事关红一方面军的成败，而且也事关反“围剿”的胜败，关系到整个红军，甚至党的命运的问题。大有一着不慎全盘皆输之势。

10月25日，总部从黄土岗移师罗坊，同时通知各军主要领导人到罗坊参加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还有总前委委员和总司令部、总政治部的领导同志，以及江西省行委、省苏的负责人。我和三军团的政治部主任兼八军政委袁国平是从军部去的。三军团的其他领导人也参加了会议，党中央长江局代表周以栗也出席了会议。

会议是由总前委书记毛泽东主持。会上，毛泽东首先讲了当前敌情，指出敌人要进攻我军的紧迫形势。因此，我军不能继续按原计划去进攻南昌、九江。并提出东渡赣江准备反“围剿”，实行“诱敌深入”。要求到会的同志严肃认真地讨论分析当前的政治形势与我们的任务。朱德、周以栗等也讲了话。

在讨论中，大家发言非常积极。通过对形势的分析和总结第二次攻打长沙的教训以及占领吉安的成功经验，认识

到在目前敌人对南昌、九江大量增兵，加强固守，一步步向我红军、江西苏区进攻的情况下，红军必须改变原来的进攻计划。对这些问题，在罗坊会议决议中都有较详细的记载。会议当时讨论的这些问题，大家意见还是比较统一的。因此，在10月26日正式形成了罗坊会议的决议案（即《目前政治形势与一方面军及江西党的任务》）。有的同志认为这个决议中有不少“左”的东西，有错误。究竟如何来看这个决议？我认为要历史地看、辩证地看。决议的基本精神是反立三错误的，只要把决议中对形势的分析，对攻打长沙、吉安教训、经验的总结等政治、军事上的一些重大问题，同立三的那一套作比较，就可以看出是完全不同的。至于在这个决议中还有“左”的词句，“左”的口号，这都是历史的痕迹，要历史地对待，要透过现象看它的精神实质。同时要看到，一条路线、方针、政策的转变不是一下子能够实现的，也不是一个命令、指示马上能够解决问题的，需要一定的过程，不可操之过急。更何况在罗坊会议期间，党中央在上海召开的六届三中全会关于停止执行立三攻打大城市的“左”倾错误计划的指示还没有传达下来。难免在一些政治口号的提法上，还有“左”的东西。要照顾全局，要等待人们的觉悟，要团结一致，才能得胜利。同时，还有个下级服从上级，地方服从中央的组织纪律问题，在当时要求这个决议没有一点“左”的痕迹，是不现实的。

罗坊会议，在讨论毛泽东提出的“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红军东渡赣江，到根据地内去打破敌人的进攻，开始

时意见很不一致，争论很大。特别是地方上参加会议的一些同志，极力反对把敌人引到苏区来打，反对过赣江。我们三军团参加会议的有些同志，也是不大同意过江的。认为东渡赣江，诱敌深入根据地内部，给根据地人民危害很大。主张主动出击，在赣江西岸的白色区域同前来进攻的敌人决战，变敌人的进攻为防御，制止敌人的“围剿”。因此，说服干部接受东渡赣江，诱敌深入，到根据地内部去作战的问题，就成了当时一个很困难的问题。正如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所指出的“人民由于没有经验，而不相信战略退却的必要，莫过于江西第一次反对‘围剿’的时候”。

为了使到会的同志理解诱敌深入作战方针的重要性，毛泽东在会上做了许多的说服教育工作。明确地指出，此次蒋介石调集兵力要大举进攻革命，敌人利在速战，使红军深入白色区域，然后包围袭击。我们就是利用敌人的弱点，看明敌人毒计，站在主动地位来定战略。我们所采取的大规模决战，诱敌深入赤色区域，配合群众，这是实际消灭敌人，实际进攻南昌、九江，争取革命胜利唯一正确的策略。只有诱敌深入赤区，大举灭敌，敌人主力在野外消灭了，敌人工事也就无用了，这就可以长驱直入，南昌、九江不攻自破。这种战略，才是最实际的布尔什维克的策略，才是扩大红军争取革命胜利的策略。朱德、周以栗、彭德怀、黄公略等同志支持了毛泽东的主张，并一道进行耐心的说服教育工作。

会上经过激烈的讨论，一致同意了毛泽东的正确

主张，会议终于在10月30日决定了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

从总前委自撤围长沙至罗坊的这几次会议来看，都是为了克服立三“左”倾军事冒险主义，是紧密相联的。我认为，从红军撤围长沙至袁州会议，是反立三错误的良好开端，峡江会议开始了转变，太平圩会议停止了红军进攻，罗坊会议是这几次会议的继续。罗坊会议所作出的重大决策就使总前委的路线完全转到正确路线上来了，才制定了“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为第一次反“围剿”的胜利打下了基础。正如苏区中央局的决议所指出的那样：“总前委在转变路线之后，正确的决定了击破敌人进攻战略——引敌深入，坚决反对盲动主义，结果得到龙岗东韶底伟大胜利”。我们可以看到，从撤离长沙到峡江，口号还是打大城市。峡江会议在军事行动的总目标上，还没有放弃进攻南昌、九江。直到罗坊会议作出了决议，提出诱敌深入作战方针，这是个根本性的转变，由进攻到退却。罗坊会议的历史功绩，就是在于它正式克服了立三错误在红一方面军内的影响。没有罗坊会议，就没有“引兵赣东”，不能“引兵赣东”，就不可能打败敌人的第一次“围剿”。罗坊会议把两个军团和地方干部的思想统一起来了，诱敌深入，取得反“围剿”的胜利，这是一个伟大的战略转变。

(三)红军东渡赣江

罗坊会议于10月30日决定了“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

后，紧接着红一方面军总司令部11月1日在罗坊的园前村发布退却命令，部署了红军诱敌深入赤色区域，待机歼敌，转退为攻。

这个命令首先对敌人进攻我军的形势作了很好的分析，对红军主力移至赣江东岸的任务及各军渡江的日期都作了规定，如命令红三军团为中路军，由彭德怀、滕代远指挥，要在11月5日在峡江通新淦的大道渡过赣江；红四军、十二军为右路军，由林彪、杨岳彬指挥，11月6日在峡江渡过赣江；第三军为左路军，由黄公略、蔡会文指挥，担任赣江西岸一带地区的扰敌工作，牵制敌人进攻吉安。第二十军在吉水、永丰、新淦一带工作，总司令部5号在峡江渡江。

11月4日，红三军团到达赣江岸边的峡江县仁和圩，就渡江问题出现了分歧，三军团有少数干部反对罗坊会议的东渡赣江决定。在这重要时刻，彭德怀同志坚决执行罗坊会议的决定，耐心做政治思想工作。他在会上指出：大敌当前要团结对敌，一、三军团决不能分兵，要集中精力消灭进犯之敌，总前委决定是正确的。我们是一定要过江的，有意见到赣江东岸去讨论。经过激烈的斗争，说服了反对过赣江的同志。部队于11月5日拂晓开始渡江。同一日，毛泽东随总前委机关离开罗坊到峡江，前往吉安布置红军撤退及那里的工作。朱德同志率领红一方面军总司令部在峡江县城渡过赣江。11月6日，红四军、十二军在峡江县城附近渡过赣江。至此，红一方面军按计划规定的时间、地点，全部胜利地渡过赣

江。这是贯彻诱敌深入作战方针在战略退却阶段的一个胜利。

(张振中记录并整理)

红一方面军的罗坊会议

中共新余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

罗坊会议，即 1930 年 10 月下旬，在毛泽东主持下，于江西新余罗坊举行的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和江西省行委的联席会议。过去对这次会议的研究很少，在“文革”中，出于政治上的需要，把它说成是批判“彭德怀推行立三路线”的会议。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全面进行了拨乱反正，对罗坊会议的研究进行到了一个新的阶段，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但至今还有不少历史情况没有完全弄清，为了把党史资料立准立好，现就红一方面军的罗坊会议及其前后的历史作一扼要的叙述，以求得革命老前辈和党史界的同志们指正。

奉命攻打大城市

1930年 4 月继蒋桂战争之后又爆发了蒋、冯、阎中原大战。由于军阀之间忙于战争，造成了革命力量发展的有利条件。到 1930 年夏秋，我们党的工作有显著的成绩，革命力量有了很大的恢复和发展，全国已在 10 个省 300 多个县建立了大小 15 块农村革命根据地，红军达到了 10 万余人，国民党统治区党的组织和群众工作亦得到了相当的恢复

和发展。

但是，由于自“八七”会议以来党内存在的“左”倾情绪和“左”倾思想，没有从根本上得到克服，反而随着有利形势的出现而进一步滋长起来。

党的“六大”以后，党中央的实际工作由李立三主持。

1930年5月在上海召开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和全国红军代表会议，大会通过的《宣言》指出：“全国革命的高潮，已经接近到我们的面前，迅速地准备我们的伟大的武装暴动力量，与帝国主义军阀决最后胜负的斗争……我们在这最后的决战中获得胜利是毫无疑问的”。大会确定了“红军的发展方向，必须是积极向着交通要道及主要城市”的战略。红军代表会议上提出了“无条件地扩大红军的策略与路线”。通过这两个会议，以冒险主义为特征的立三“左”倾错误的主要内容已经提出并得到了确认。6月11日，李立三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决议案，立三“左”倾冒险主义错误正式在党中央领导机关占了统治地位。根据这条“左”的政治路线，制定了以武汉为中心的全国总暴动和集中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以及“打下长沙，夺取南昌”、“会师武汉，饮马长江”的冒险计划。

当时，毛泽东和朱德由于“久居山区”，不能得到“有关国内和国际局势”的全面情况，对全局的形势无法作出确切的判断，因此，不得不接受中央委员会关于中国革命“已经处于总起义的前夕”的分析。

1930年6月红四军前委在福建汀州召开扩大会议（各纵

队和闽西特委负责人参加),接受中央的命令,根据全国红军代表会的决定,将红四军、红三军、红十二军组成第一军团,朱德任总指挥,毛泽东任政治委员,同时组成红一军团前委,毛泽东任书记。随即按照中央的规定:“以主力侧击南浔路”,“取南昌,攻九江,夺取整个江西,以切断长江”。

汀州会议后,以毛泽东为首的前委在执行中央命令向南昌进军的过程中,始终从实际出发,审时度势,采取谨慎的态度,稳步前进,伺机消灭敌人,尽量避免冒险行动造成不应有的损失。

6月22日,一军团发布《由闽西出发向广昌集中的命令》,提出“本路军有配合江西工农群众夺取九江、南昌以建设江西政权之任务”。部队7月8日由广昌到达兴国,汇合红三军。7月20日占领永丰区,由永丰向新干七琴推进,击溃七琴守敌七八百人。24日胜利占领了樟树镇。

根据敌军的情况:抚州有敌一个旅,南昌地区有敌一个旅,都是敌人机动的部队。前委决定:既不乘胜北上,到白色区域去攻打地势不利的大城市南昌,也不去打容易逃跑的抚州之敌,而是“乘虚渡河,向南昌对岸前进,攻击牛行车站为目标,举行八一示威”。部队西渡赣江,达到高安,30日经高安到达万寿县、石子碛生米街,离南昌约30里一带地区,因为“打南昌没有把握,只在8月1日那天,派罗炳辉带了队伍,到牛行车站去示威,纪念三年前的南昌“八一”起义”^①。前委没有盲目执行中央攻打南

^① 朱德:《在编写红一军团史座谈会上的讲话》。

昌的命令，根据实际情况，仍然坚持向农村发展。部队向奉新、安义散开工作，发动群众，扩军筹款，以发展新的革命根据地。

由于毛泽东坚持了根据地思想，不赞成部队过远过久地脱离根据地去打大城市，所以从汀州出师，“先打下樟树，再过赣江打高安、上高等地，接连攻下十余县，事实上还是游击战，所以取得了胜利。由于发动了广大群众，部队也有很大发展，出发时10000人左右，这时约有18000人”^①。

由彭德怀、滕代远、黄公略领导平江起义而建立起来的红五军，经过1929年至1930年上半年的艰苦战斗，不断打击敌人，壮大自己，开辟了湘鄂赣、湘赣、鄂东三个苏区，并基本联成一片，形成了南起井冈山，北抵长江的一长块革命根据地，红军的兵力扩大到7000人左右。1930年5月，出席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和红军代表会议红五军代表滕代远、何长工、谭政文等，先后回到了鄂东南部部队驻地。红五军于6月15日在大冶刘仁八举行军委扩大会，传达、贯彻上海两个会议精神和中央的指示。会议决定：（1）整编部队组成工农红军第三军团，同时成立红三军团前委，彭德怀为军团总指挥兼前委书记，滕代远为政治委员。（2）采取积极进攻的战略战术，扩大苏维埃区域，扩大红军（中央要求红三军团在8月1日之前扩大到5万人）。（3）根据彭德怀的建议首先消灭鄂东南六县地主武装，伺机占领岳州为后方，再作打武昌的实际准备。

^① 朱德：《在编写红一军团史座谈会上的讲话》。

会后，三军团在大冶的马蹄驿宣告成立，按五军军委扩大会的决议开始了军事行动。除留下一部分力量在鄂东南坚持斗争外，红军主力全部南下。7月3日，红三军团乘张桂军与何键在湖南混战之际，岳州空虚条件下，占领了岳州城。不久，主动退出岳州，占领了平江县城。三军团前委根据湖南军阀何键的主力调去广西攻打桂军，省内防御力量薄弱，长沙城内只剩下七个旅3万兵力的情况。决定攻打长沙，夺取湖南。

此时，何键为了先发制人，命刘建绪师三个旅向平江进攻，企图打破红军攻取长沙的计划，以待由湘桂边调回部队增援。红军奋起反击，首战晋坑告捷。再战金井获胜。

27日，红三军团从金井、永安、春华山一带出发，向长沙猛攻，于晚上9时占领长沙城。

7月30日，湖南省苏维埃政府成立，8月1日在10万劳苦群众中通过省苏维埃政府及部门主要负责人名单，李立三任主席。宣布了苏维埃政纲，颁布了土地法、劳动法等法令，成立了政权机构及省临时总工会等组织，镇压了400余名反革命分子，没收了一批官僚资本。

红三军团攻占长沙，一方面给敌人以沉重的打击，“4000枪，8000人的红军，打败敌人十团以上的兵力”；壮大了红军七八千人，筹款40万银洋，红军的装备得到很大的增强，党的政治影响大大提高，震惊了中外。另一方面，使立三中央更加被胜利冲昏头脑，狂妄地认为世界资本主义和统治中国的军阀制度即将迅速崩溃，全国革命的胜利指日可待。立三“左”倾路线发展到了顶峰。

红军对长沙的占领，使中国反动派急忙调集力量来镇压革命。根据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三军团主动撤出长沙。“长沙战役作为一个战役袭击是对的，作为攻取长沙，夺取武汉，影响全国暴动，则正是立三路线的代表作品”。^①“如果把第一次占领作为一种暂时的行动，并不企图守住城市，建设国家政权，那么，它的效果也可以认为是有益的，因为这对全国革命运动产生的反响是非常大的。企图把长沙作为一种根据地，而不在后面巩固苏维埃政权，这在战略上和战术上都是错误的。”^②

红一军团于8月1日举行游行示威后，8月3日，毛泽东、朱德在奉新发出“进攻长沙先取浏阳的命令”中说：“本军团以绝对急进攻击敌人之精神，决先取浏阳进略长沙，以威胁武汉，拟于本月5日由此地奉新、安义出动，沿途工作向浏阳前进。”

为了消灭敌人，援助红三军团，开展湘鄂赣之交的局面，红一军团由奉新、安义出发，途经宜丰、上高，8月18日进到万载以西的黄茅。8月20日拂晓，攻克了文家市。23日打到浏阳永和市，与从长寿街前来的红三军团会合。会合后，两军团的前委举行了联席会，成立了红一方面军和总前委。朱德任总司令，毛泽东任总政委和总前委书记。红一方面军成立后，总前委立即召开会议。

总前委根据中央夺取中心城市的总的战略部署和争取实现武汉为中心的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的总路线，鉴于红

① 《朱德总司令在七大建军报告》。

② 《西行漫记》第151页。

三军团已有攻占过长沙的先例，一、三军团会合，兵力达三万余人，力量增强了，认为消灭敌人，再度占领长沙是可能的。8月24日毛泽东在给中央的信中说：“入浏阳之敌，共有兵力四团左右，被我军消灭了1/4，尚有3/4在进攻中，这是何键部队的主力。把这些东西消灭了湖南政权就到手了，红军亦大大扩大了，夺取武汉就有保证，不过须付与相当的代价就是。”又说：“三军团（五、八两军）已从长寿街来集中，三军团士气很壮，有7000支枪和一军团来前方者相当，明日即由长沙前进，大约经过一度剧战之后，可占领长沙。”总前委决定第二次围攻长沙。

红军开始采取诱敌离城尔后歼敌的方针。敌人始终坚守不出，凭借工事进行抵抗。发动总攻，亦未能成功。这时敌之援兵已经靠近长沙，红一方面军总部9月12日作出了从长沙撤围的决定。

红一方面军围攻长沙，历时半月之久，进行了异常激烈的战斗，歼灭了一定数量的敌人，红军也有重大伤亡。

毛泽东9月17日在向中央的报告中详细分析了此次围攻长沙不克的原因有三：“（1）未消灭敌主力于打工事之前，敌共有31团之众，我在文家市猴子石两役虽已消灭敌兵在五团以上，但大的数尚未消灭，即退入战壕，因此敌有余力守城；（2）群众条件不具备，城内无工人暴动，无士兵暴动以为响应，粤汉路、株萍路及对河群众没有起来，不能断绝敌人之水陆交通，不能封锁敌人经济与军事运输；（3）技术条件不具备，敌之工事是欧式的重层配合，铁丝网、壕沟等计八九层，我们只有肉搏没有重炮破坏敌人之

工事，交通器具如无线电等我们也没有，以致两个军团联络不好，因而失机。以上三点是没有打进长沙的原因，而以第一点为主要原因。”并说：“依我们的经验，没有群众条件是很难占中心城市的，也是很难消灭敌人的。”

红一方面军再打长沙的行动，无疑是执行了立三“左”倾路线，是冒险主义的错误。正如后来毛泽东所说，红军当时的主要任务是发展巩固农村根据地，没有必要打长沙，攻打长沙这件事本身有冒险的成份。但是，以毛泽东为首的总前委，在打长沙问题上与立三路线有以下几点不同：

其一，毛泽东和总前委在攻打长沙的过程中，始终把注意力集中在“消灭敌人主力”上面，并且考虑到消灭何键还须经过一度剧战，还须付出相当的代价，因而采取了诱敌出击和稳扎稳打的作战方针，这就使得一方面军不但避免了大的损失，而且伺机给了敌人以有力的打击。其二，毛泽东提出占领长沙是在三军团第一次打下长沙以后，利用当时的有利形势，与三军团会合，乘胜消灭何键部队主力，占领长沙，以推动湘鄂赣之交革命局势的更大发展。与立三路线的城市中心论以及要在长沙“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打算是区别的。其三，在红军围攻长沙过程中，当敌人凭借坚固工事据守不出，我军多次猛攻不能奏效的情况下，毛泽东和总前委采取了果断决策，撤围长沙，这也是与立三路线那种不顾实际情况“打硬仗、打破逃跑主义”完全相反的灵活的战略战术。撤围长沙的行动影响到全局，使立三路线“会师武汉，饮马长江”的冒险进攻的计划全部陷于破产。

立三“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使各路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冒险行动都先后陷于严重失败，给中国革命事业带来了极大的危害，引起了全党强烈的不满与反对，也引起了共产国际的关注。共产国际作出了停止执行6月11日《决议》的指令之后，又指派瞿秋白、周恩来回国纠正立三的错误。1930年8月下旬，周恩来、瞿秋白先后从苏联回国，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传达共产国际指示精神，批评立三“左”倾错误，统一中央政治局的思想认识。同时，从8月下旬至9月中旬，中央接连发了许多指示，采取一系列措施，停止武汉暴动、南京暴动，停止上海等地的总同盟罢工，纠正立三冒险主义的错误。还指派刘伯承、邓中夏赴武汉，传达中央与共产国际指示，并参加长江局的领导工作。中央于8月29日发给长江局并转湘省委、湘鄂赣省委及行委的信(关于占领长沙的战略与政策的指示)，派交通员专程送往武汉。信中指出：红军进攻长沙的正确战略，是“以三、四、五、八军的主力集中进攻长沙，而以小部队留守赣省，牵制南昌、九江之敌，并通知二、六军逼武长线，以切断敌联络线之任务”；占领长沙不是我们的全部目的，要注意歼灭敌人有生力量，在“湘赣包围我们的主要敌人还没有击溃之前，不应轻于冒进武汉。中央这封指示信，虽然并未停止再攻长沙的计划，但在战略和政策方面对立三的“左”倾错误已经作了较大的纠正。长江局接到中央指示信后，决定派周以栗为长江局代表携带此信，前往红一方面军中传达贯彻。随后，中央在9月4日又发出给长江局转三、四、五、八军前委的指示信，进一步指出：

红军攻取长沙存在两种可能：一是实现8月29日信中提到的计划，消灭何键主力，攻占长沙；二是何键依据防御工事死守待援，一时难以攻下长沙。如果是前一种情况，当然应当争取；如果是后一种情况，则不宜用强攻硬拼的办法打长沙，而应从长沙撤围，即向江西边界发展。对再战长沙的战略又有了进一步的明确。

以上中央关于停止执行立三“左”倾错误的决策和关于攻打长沙的指示精神，因为是通过长江局转的，由于当时交通条件的限制，没有能够传达到红一方面军中来。毛泽东和红一方面军总前委作出撤围长沙的果断决策，是在尚未得到中央有关指示精神的条件下，根据实际情况，抵制和纠正立三“左”倾错误的行动。这个行动不仅完全符合当时中央的纠正立三错误的精神，而且表明了毛泽东远见卓识和可贵的实事求是精神。

罗坊会议前的几次会议

长沙撤围之后，在红一方面军中，有不少领导干部对立三路线还没有认识，还坚持着攻打武汉、南昌、九江等中心城市的错误主张，对于红军的行动方向问题，存在着激烈的争论。

红一方面军总部于9月12日到了株州，总前委作出了由株萍路回师袭击赣敌，夺取吉安的战略决定。这是红一方面军首先迈出摆脱立三冒险进攻大城市的错误路线，使红军的军事行动转到正确道路上的第一步，具有重大意义。

总前委于9月13日在株州作出这一重大决策后，将部队由湖南带回江西，在萍乡发出进攻吉安的命令，“决定一军团去取吉安，三军团布置于袁水以北，威胁南昌，阻击援敌”^①。于是，一、三军团从萍乡出发，分别向吉安、樟树一带进军。

9月28日部队到达袁州，总前委举行袁州会议，讨论红军的行动方向问题。红军内部激烈争论的中心问题，是继续坚持在株州作出的攻打吉安的计划呢，还是返回再取长沙或直取南昌、九江呢？争论的实质，是停止还是继续执行立三冒险攻打大城市计划的问题。主张先打南昌、九江的同志认为这是中央的指示，必须执行。会上还有人质问毛泽东“执不执行中央路线”。毛泽东把打吉安与打南昌、九江进行比较，说明南昌、九江缺乏吉安有利于我之条件，敌有重兵防守，部队打长沙后伤亡很大，急需补充，待打开吉安后补员筹款，条件具备，再北上攻南浔。会议进行期间，长江局军事部负责人周以栗同志携带中央8月29日发给长江局并转湘省委、湘鄂赣前委及行委的信（关于占领长沙的战略与政策的指示）来到了红一方面军。会议又对中央的指示信和周以栗的报告进行了讨论，会议仍作出了既不回去攻打长沙，也不马上去打南昌，而是继续坚持在株州作出的攻打吉安的决定。总前委袁州会议初步放弃了攻打大城市的冒险计划，是进一步说明教育干部摆脱这个错误的重要步骤。

^① 《彭德怀自述》第158页。

10月4日，红一军团在地方武装和群众的配合下，攻取了吉安。10月7日，红一方面军总部在吉安召开了有10万军民参加的庆祝大会，在会上成立了江西省苏维埃政府。

吉安是赣西南的一个中心城市，但它是被我长期围困的一座孤城，周围的农村是赤色区域，敌人守卫兵力仅一个旅，又无外援，我军数量上占绝对优势，占领吉安是有把握的。毛泽东说：“此次吉安暴动的胜利，虽在军事上未有消灭敌人主力”，“但在政治上却是收获不小”。^①是“反对了立三路线的主张（反对打吉安，主张打九江，他们说先打吉安后打九江，是断送中国革命高潮）才把吉安占领了。这次的占领吉安，是有极大的政治意义。”^②攻打吉安的指导思想是从巩固和发展农村革命根据地出发的，体现了毛泽东关于农村包围城市的思想，是争取江西的战略计划的组成部分。红一方面军由湖南转入江西，夺取吉安的胜利，使周围广大革命根据地联成一片。红军的力量也大大增强，此时一、三军团加上二十军、二十二军和总部直属队，合计已超过5万人。

吉安打下后，红军的行动应指向那里？围绕打不打南昌这个行动方向问题，军队内部的争论仍没有平息。总前委进行了讨论，继续按原计划向南昌，九江前进，夺取江西政权。10月13日，红一军团总部在吉安发出《移师北上向清江集中的命令》，命令根据敌鲁涤平部主力在南昌附近，

① 毛泽东1930年10月14日给中央的信。

② 《红星报》1933年8月13日。

邓英部主力在樟树，戴岳部主力在高安的侦察分析，指出：“本军团有进攻南昌、九江消灭鲁涤平敌军，夺取江西全省政权，向左保障武汉暴动胜利，向右进攻南京，以促进全国直接革命之任务。总前委作出移师北上的决定时，毛泽东以“有计划、有配合、有步骤地夺取南昌、九江”为理由，将部队的行动作了灵活而谨慎的布置，先向袁水流域推进。

10月17日，总部到达峡江，得知国民党军阀中原混战已经结束。毛泽东敏锐的看到了国内形势变化的苗头，他判断军阀战争停止后，蒋介石就要调兵遣将集中兵力来对付红军了。因此，总前委召开了峡江会议。峡江会议集中讨论的中心问题是对时局的估量和行动方针问题。通过讨论，会议对时局问题作出极为重要的新的分析，指出：阶级矛盾超过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时，反动统治阶级必然联合起来进攻革命，红军的任务必须为打败敌人的联合进攻作好准备。毛泽东指出：“我们认为统治阶级的军阀混战暂时不能调和停顿，但也不会继续扩大到底……我们不能离开阶级立场来分析，以为军阀混战会扩大下去，继续到底。要知道阶级矛盾超过统治阶级矛盾时，反动统治阶级必然联合起来进攻革命”，红军的任务必须为冲破反革命的联合进攻作好准备。这就纠正了那种认为军阀战争只会愈打愈大，整个中国豪绅资产阶级在迅速崩溃的“左”的错误估计。

峡江会议还讨论了巩固根据地的一系列政策问题，通过了土地问题和资本问题的决议。关于土地问题，批评了立三的“平均土地是农民意识”的观点。毛泽东指出，“我们

认为一定要彻底平均分配，才是对的”。会议对立三主张办集体农场，实行共同消费的超越民主革命阶段的土地政策，作了理论上的分析批判，指出：“这一路线的错误根源，在于不了解在纯属的半封建的农业经济的中国土地革命必须经过分配的过程，中国农业经济的主要形式是小农经济，无论佃农耕种或耕种自己田的，都是分割成极小的经济单位，集合起来，实行社会主义集体的生产，这是经济条件所不许可的，因而不得不承认土地革命开始是小农经济的生产仍占主要形式，不得不把土地分配给农民。”

关于资本问题，针对李立三要对资产阶级开展“特殊战争”，“没收中国资产阶级的工厂、企业、银行，以铲除反革命武器”的过左政策，毛泽东针锋相对地指出：“我们认为目前无条件的没收一切工厂商店是不对的，应该没收反革命的商店与军阀官僚资本的工厂商店，对于不是违反苏维埃劳动法的资本，应用工人监督资本的方法来限制他，克服他的阴谋（移开资本，怠工不办货）”。这就抵制了立三路线把资产阶级作为民主革命的打击对象的错误政策。

从峡江会议的内容我们可以看出，这次会议对于纠正立三“左”倾错误，使红一方面军的行动和指导思想转变到正确路线上来又大大前进了一步。

10月19日，红一方面军总部在峡江下达了“进攻高安的命令”，20日继续向袁水流域推进。21日到达清江县的太平圩，总前委又召开了太平圩会议。根据敌人已开来江西对我进攻的形势，会议讨论了红军的军事行动问题。根据会议精神，24日，总部发布了“在袁水及瑞州河之间工作

待机的命令”。命令指出了敌军谭道源师、许克祥部及第五军熊式辉部之先头部队，金汉鼎、毛炳文两部已经开来江西的严重情况，决定部队在袁水和瑞州河之间布置工作，以主力沿袁水配置，在这一带发动群众，筹措给养，扩大红军，准备与来犯敌人作战的条件。25日，总部移到距黄土街10公里的罗坊。鉴于敌人联合起来进攻红军的严重情势，部队至此不再继续北进。

红一方面军自9月中旬撤围长沙到10月25日到达罗坊的这段时间里，以毛泽东为书记的总前委采取一系列实际步骤和召开一系列会议，在实际行动上一步一步纠正“左”的错误，教育和说服干部。经过了总前委的袁州会议、峡江会议、太平圩会议等一系列重要会议，经过了反复的争论，使红军在战略指导思想上和行动方向上逐步的有了转变。但是，在另一方面，在红军和地方党的部分领导同志中，对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的危害还缺乏足够的认识，对于是否继续执行冒险攻打大城市计划的行动方向问题，还没有得到根本扭转，在指导思想和战略战术等问题上的原则分歧还未最后解决。同时，面对敌人即将联合起来进攻革命的严重形势，红军应采取何种战略方针去打破它，这些重大问题，还急待总前委研究解决。

罗坊会议，红一方面军的战略转变

10月25日，红一方面军总部到达新余罗坊，在这里召开了总前委和江西省行委联席会议；出席会议的有：红一

方面军总前委书记和政委毛泽东、总司令朱德、政治部主任杨岳彬、参谋长朱云卿、总前委秘书长古柏、红三军团总指挥彭德怀、政委滕代远、政治部主任袁国平、红三军军长黄公略、红四军军长林彪、政委罗荣桓、红八军军长何长工、红十二军军长罗炳辉、中共中央长江局代表周以栗、江西省行委书记李文林、江西省苏维埃政府主席曾山、江西省行委宣传部长陈正人等10余人。这次会议的前一阶段集中讨论了红军的行动方向和一方面军及江西党的任务问题，通过了《目前政治形势与一方面军及江西党的任务》的决议；后一阶段，集中讨论了如何粉碎敌人进攻的战略方针问题，于30日确定了“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

罗坊会议解决了如下几个主要问题：

第一，正确分析了当时的政治形势。

立三“左”倾冒险主义的理论基础首先表现在对形势的错误估计。“立三路线不懂得正确地分析客观形势及正确地估计阶级斗争力量的对比”^①，立三同志一再被1930年出现的有利于革命的政治形势冲昏了头脑，他武断地认为全国直接革命的形势已经到来，否认革命主观力量所必需的充分准备，主观幻想中国革命可以不经过长期艰苦的斗争就可以取得胜利。

罗坊会议指出，国际上，“帝国主义垂死时期所发生的不可调和的矛盾”，已促进了世界革命的高潮，这在于中国革命是有利的。在国内，红军两次攻打长沙，一、三军团的汇合与吉安占领，表现了“红军势力的猛烈发展”，吉安

^① 《周恩来选集》上卷55页。

的夺取是完成赣西南数百万有组织的群众，20余县苏维埃政权最有群众最有基础的地方暴动。对于夺取江西胜利和争取全国革命胜利，是具有伟大意义的。

但是，长沙的占领，吉安夺取，又给了国内外敌人极大的震动，它不仅使中国革命有了较大的转变，也转变了统治阶级的关系。就是说，革命势力的发展，阶级的根本矛盾，已使帝国主义、中国统治阶级竭力想缓和自身的冲突，联合对付革命。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就是美帝国主义已经感觉到它所统治的南京政府，遭到了革命势力的威胁；日本帝国主义“也觉得中国革命之胜利，首先是于日本不利，所以日美有暂时妥协的可能”；“在英帝国主义方面，镇压中国革命，也是急需。加以在日美联合，在阎冯残败之下，也不得不暂时屈服”。由于帝国主义和中国统治阶级联合对付革命，所以蒋介石有从前线大调兵力进攻革命的需要与可能。

在指出帝国主义、中国统治阶级联合对付革命的同时，会议还指出：“帝国主义军阀，虽然竭力拉合，可是内部的矛盾跟着紧张”。所以“帝国主义及中国的统治阶级因为政治经济的根本破产，所以不能有稳定的前途，亦即不能有牢固的联合”。因此必须反对“以为军阀混战总是愈打愈大直到自取灭亡，无论如何不会联合对付革命”，和“以为敌人联合对付革命，革命就遇着很大的困难，因而发生悲观”这两种错误倾向。

罗坊会议对政治形势正确的分析，是对立三“左”倾冒险主义在阶级斗争形势问题上所作的主观主义的估量的有

力批判。

第二，会议总结了两次攻打长沙和攻取吉安的经验教训，指出“轻装袭击路线”的错误，批评了立三“左”倾冒险主义路线。

罗坊会议指出：“长沙和吉安的事件，足够教训我们。第一次不能坚决持续占领长沙，主要的是群众条件不具备。”“第二次因为仍然缺乏群众条件与敌方士兵的配合，成为单纯红军的攻坚，所以猛攻半月不能胜利。”但是，“吉安就在相反的条件之下，有了广大群众基础，所以就能真正的夺取。”正反两方面的经验，说明了“轻装袭击”的路线是错误的。“目前在敌人大举增兵与南昌九江固守工事的形势之下，单凭红军轻袭南昌九江，而且红军相当给养都不具备，运输条件十分缺乏”，如果再用轻兵袭取，无疑的要成为游击的进攻，结果攻不下，又转而他往，反使一省胜利延期实现。所以轻装袭击的游击观点“应加以严重的纠正”。从而纠正了轻装袭取南昌、九江的冒险计划。

会议还强调了红军的行动必须要从实际的各种具体条件出发，活泼地运用战略战术，不能简单地、机械地执行上级指示。阐明撤围长沙以来总前委从实际出发所作的一系列的决策的正确性。

第三，会议分析了江西的有利条件，提出江西党和红一方面军的任务是：配合江西群众，“有计划有布置的”，“坚决争取江西首先胜利”。

第四、粉碎敌人进攻的诱敌深入作战方针的确定。

罗坊会议通过了决议以后，又分析了敌人向根据地进行反革命“围剿”的严重形势，研究了如何粉碎敌人“围剿”战略战术问题。

面对强敌的进攻，怎样打破敌人的进攻？在赤区打还是在白区打？当时在会上有两种不同的主张。一种是把战场放在峡江一带，一军团在赣江东面，三军团在赣江西面，东西两路夹攻敌人，这就是“夹江而阵”的主张。一些红军和地方党的干部反对把战场放在根据地内部，担心诱敌深入根据地内部，会丢失大片根据地，危害根据地人民，对我产生不良影响。因而提出主动出击，在赣江西岸的白色区域同敌人交战。另一种是毛泽东的意见，主张红军主力后撤，东渡赣江把敌人引到根据地内部来打，以逼着敌人分散兵力，迫使敌人犯错误。我军则可以依靠根据地人民对红军的积极支援，依靠老苏区群众和许多有利条件，选择有利地形和时机，以我之长攻敌之短，集中优势兵力，歼灭敌人有生力量，打破敌人的“围剿”。这就是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这两种意见争论很激烈。要使干部接受诱敌深入的方针，在当时确是很困难的问题。但是毛泽东耐心据理说服干部，朱德、彭德怀、黄公略、周以栗等同志也支持了毛泽东的主张，并一道做解释工作，10月30日诱敌深入的方针在罗坊会议上正式确定。

总前委在罗坊决定了诱敌深入的方针之后，11月1日红一方面军总司令部在罗坊的园前村发布战略退却的命令，周密地部署了红军诱敌深入赤色区域，待其疲惫而歼灭的退却计划。

苏区军民都紧急动员起来，投入反“围剿”的战备工作。11月4日，红三军团到达赣江岸边的峡江县仁和圩。这时，三军团有少数干部反对东渡赣江决定，主张一、三军团分兵。在这关键时刻，彭德怀坚决贯彻执行罗坊会议的决定，明确表示：“一、三军团分开，对目前准备粉碎蒋介石的大举进攻不利”。“有意见到江东岸去讨论吧，我是一定要过江的，总前委这个决定是正确的”。说服了反对过赣江的同志。

11月6日，红一方面军按规定时间、地点，全部胜利地渡过了赣江。

这时，一部分地方干部包括一些领导干部又起来反对诱敌深入的方针，他们指责毛泽东为“右倾”。朱德、彭德怀、黄公略旗帜鲜明地维护了这一方针。他们指出：“诱敌深入苏区，这一战略是整个红一方面军总前委的策略，已不是毛泽东同志的个人意见，所谓反对毛泽东同志右倾，等于无的放矢”。“此次战争，若取速决战，深入白色区域，敌人利用工事交通便利，严重压迫，而我不能争取群众配合，红军恐早已消灭，革命恐早已受严重摧残。只有诱敌深入赤区，大举歼敌，敌人主力在野外消灭了，敌人工事也无用了，这种战略，才是最实际的布尔什维克的策略，才是扩大红军，争取革命胜利的策略”。“特别是现在看来，因为采取这一战略，获得了相当的给养，战胜了敌人的久困重围，诱敌深入赤区，断绝敌人粮食，与实行群众骚扰，已给敌人严重困难……更证明这策略的非常正确。凡是真正的布尔什维克同志都应当无条件的执行。”朱、彭、黄坚

持原则的立场，维护了一、三军团以及江西省党组织之间的团结，维护了毛泽东的正确领导，排除了各种错误的干扰，保证了诱敌深入方针的贯彻执行。

12月初，根据罗坊会议确定的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红一方面军撤退到根据地中心宁都县的黄陂、小布地区隐蔽集结，准备粉碎国民党的第一次军事“围剿”。

罗坊会议诱敌深入作战方针的确定并在实践中的运用，指引了红军第一次反“围剿”战争的胜利，巩固了根据地，扩大了红军。正如朱德所说：“敌人第一次‘围剿’被打破。这说明了：只有依靠群众，依靠根据地，诱敌深入，才能大量歼灭敌人。这是用事实反对了立三路线。”“如果不把立三路线反掉，把部队开去打武汉、九江，结果是难以设想的。”^①“诱敌深入”方针的提出并在实践中运用成功，使红军战略战术原则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由于当时主客观条件的限制，罗坊会议存在着历史局限性。当时，中央结束立三“左”倾错误的六届三中全会精神尚未传达到红一方面军，因此，在罗坊会议的《决议》中还反映着立三“左”倾错误的词句、口号和提法；对于当时形势的分析也有过于乐观和不切实际的缺点；在职工运动的主要路线仍然是强调“直接组织武装暴动”；尤其在肃反问题上的指导思想有严重的错误，把赣西南的党组织及其领导下的群众组织中的敌情看得过于严重，致使尔后的肃反斗争造成扩大化的严重恶果。

^① 朱德：《在编写红一军团史座谈会上的讲话》。

尽管罗坊会议存在着一定的缺点错误和历史局限性，但把它与历史功绩相比较，罗坊会议的功绩是基本的，是主流，其基本精神是好的。

(赵泉均、张振中执笔)

江西省委在湘赣边界 秋收起义中的历史功绩

陈 立 明

湘赣边界秋收起义，是继南昌起义之后党史上的重大事件。这次起义是由毛泽东领导和发动的。在这次起义中，江西省委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这一点，在以往的论著中很少提到。

参加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的部队，是湘鄂赣三省边界各县我党领导的工农武装和部分正规武装。其中，我党领导的原武昌国民政府警卫团和平江、浏阳两县的工农义勇军等是这次起义中的骨干力量。这两支队伍本来是准备参加南昌起义的，因为没有赶上而留在江西境内，后来参加了秋收起义。

当时，这些进入江西的部队无论在高安还是在武宁、修水处境都是困难的。国民党背叛革命，大革命已经失败，参加南昌起义不成，下一步如何行动，是这些革命武装面临的严重问题。当年参加秋收起义的浏阳工农义勇军党支部的领导成员张启龙回忆说：“由于我们没有赶上南昌起义的部队，脱离了上级党的领导，对部队今后的去向、如何开展斗争等许多重大问题拿不定主意，大家都很苦闷、焦

虑。同时，部队从长寿街起，一直在天热的夏天长途行军，士兵不但疲劳，而且思想混乱，于是决定在这里（指江西高安县——引者）休整几天。”“团的几个负责人和有关人员利用休整机会，召开了一次座谈会。”到会的有潘心源、徐麒、彭商仁、张启龙和苏先骏等十余人。在讨论部队的去向时，有的主张回到浏阳道吾山去，认为那里地势险要。党和群众基础较好；有的认为那里靠近长沙，不好活动，不如到大围山，那里山大，可以连通平江、铜鼓、浏阳几个县，党和群众基础也很好。“会上，你一言，我一语，议论纷纷，莫衷一是，思想统一不起来，在行动问题上也讨论不出结果来。”

不久，这两支队伍从高安到铜鼓去，途中，接到江西省委指示，指示中说：“为了保存这支部队，暂时接受朱培德的改编，编为江西省防军暂编第一师的一个团，供给由朱培德负责。”在当时比较困难的情况下，江西省委作出这样的决策是正确的。因为南昌起义后不久，驻江西的朱培德、王均等军阀对革命武装和共产党人防范极严，集中全力加以“清剿”。如果这些部队在离南昌市和南浔铁路较近的赣西北游动，必然引起他们的注意，很难不被吃掉。因此，妥善的办法是要求收编，以江西省防军暂编师的名义，受江西省国民党政府的节制，为这些部队在江西找到一个“合法的”立足点。从当时的客观情况看，这样做也是可能的。因为国民党新军阀同北洋军阀一样，都把扩充军队当作扩大自己的政治、军事资本；而一些弱小的军队为了求得生存，也经常请求收编作暂时的依附。同时，叶贺部

队在南昌举行的起义刚爆发不久，江西反动当局非常害怕这些客军闹出“乱子”，因而同意收编。

遵照江西省委的指示，这些部队迅速造具名册，经过谈判，与朱培德达成原则协议，编为江西省防军第一师，下辖三个团，仍分别驻防修水和铜鼓。这些部队就以灰色的面貌得以“合法”地保存下来，直到秋收起义爆发。这些部队驻守在湘鄂赣三省地界的修水、铜鼓一带，无论是参加哪一省的起义，都可以朝发夕至，对起义非常有利。这是江西省委对湘赣边界秋收起义部队在关键时刻所采取的关键的一着。

从现有的材料中可以看出，在此期间，江西省委与平浏农军之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1927年9月26日，江西省委以“江俊文”的化名给中央写信说：“平浏农军在修水、铜鼓时，曾派人来此接洽，此间亦有人前去报告现在军、政状况，并提议以后进行以及一切联络事宜（原文如此）”。

张启龙回忆说：“为了找到上级党的关系，并取得其指示，我们到达铜鼓后，首先决定派人去找上级党和侦察敌情。”派“宋任穷同志，负责去南昌找江西省委请示。”他找到省委，“胜利完成任务后，在部队由文家市向芦溪前进的路上回到部队，带来了江西省委的一封信。这封信后来交给了毛委员。”

根据八七会议的文件精神，江西省委于8月底或9月初制订了一个全省总暴动的计划，以赣北赣西为暴动的主要地区，规定赣北以修水县为起点，赣西以永新县为起点，各邻县加以响应。由于原武昌国民政府警卫团和平江、浏

阳两县的工农义勇军驻扎在铜鼓、修水，省委的秋暴计划把修水、铜鼓当作全省两个“农军势力统治的县份”，指出这两县“应马上实行捕杀豪绅及反动派，没收大地主土地，建立农民政权。”由于江西省委忙于南昌起义失利后的善后工作，又没派人参加中央召开的八七会议，加之盲动主义的影响，制订暴动计划经过反复，所以江西省的秋收起义的发动工作比湖南省晚了一些。9月上旬，湖南省委的秋收起义准备工作已经就绪。同时，随平浏农军来江西准备参加南昌起义的浏阳县委书记潘心源在浏阳农军到高安后，到了安源，与湖南省委和毛泽东取得了联系，报告了驻赣西北的革命武装情况。因此，湖南省委的秋收起义计划也把平浏农军和警卫团当作参加起义的主要力量。

在这种情况下，江西省委从大局出发，不因为江西秋收起义的需要而留住这些部队，而是指示这些部队参加湖南的秋收起义。省委1927年9月11日致中央的信中说：“……×永及修铜两部分农军，此间均已派专人前往指导，调往醴陵等县一带帮助湘之秋暴问题，同属可能而且必要。”

1927年9月11日，由湖南省委和毛泽东领导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爆发了。分别驻守在江西萍乡、铜鼓和修水的工农革命军向湖南的醴陵、浏阳、平江等地进攻。当起义遭到挫折后，毛泽东命令部队到浏阳的文家市集中，并放弃进攻长沙的计划。部队在毛泽东的率领下向莲花、宁冈一带的罗霄山脉中段进军，不久开创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

另外，据宋任穷回忆说：浏阳这个团的党组织派他去南昌向江西省委请示行动，请示部队往哪里走时，江西省

委负责人要他将一封信交给毛委员，并说：“过了宁冈，莲花一带，还有一支小部队，还有少数枪支，其他的事信上都写了。”他去到萍乡陈家坊将信交给了毛泽东。这一事实说明，江西省委曾向毛泽东介绍了莲花、宁冈一带的情况，这对于当时前委作出向罗霄山脉中段进军的决定，也是具有重要参考价值的。

上述事实说明，江西省委对湘赣边界秋收起义是起过积极作用的。

江西省委对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的历史功绩应当得到肯定。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辖区 前后变化的情况

李 春 祥

1927年9月，毛泽东领导的在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的部队向长沙进攻遭受挫折之后，在浏阳文家市主持召开了党的前敌委员会，决定起义部队向敌人统治势力比较薄弱的农村进军。9月20日，毛泽东率领部队向罗霄山脉中段前进，开始了伟大的战略转移。10月3日到达宁冈的古城。在古城，毛泽东主持召开了前委扩大会议，总结了秋收起义的经验教训，决定在罗霄山脉中段建立根据地。接着便开始了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工作。

10月27日，工农革命军进驻井冈山的茨坪。11月上旬，毛泽东到宁冈象山庵召开莲花、永新、宁冈三县原党组织负责人会议，指示各县重建党的组织，发动群众，开展武装斗争。11月下旬，工农革命军再次攻克茶陵县城，成立了边界第一个县工农兵政府。1928年1月5日，又打垮了肖家壁的反动武装，占领遂川县城，24日成立遂川县工农兵政府。2月中旬，工农革命军再回师宁冈。于18日攻克宁冈县城——新城，全歼赣敌一个正规营和宁冈县靖卫团，缴枪数百，活捉敌县长张开阳，随即又于砦市成立了宁冈县工农兵

政府。

在四周白色政权包围中间所建立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区域范围，是随着革命斗争的起伏而波浪式地向四周扩展的。

工农武装割据局面初期的区域范围

1927年10月到1928年2月约五个月时间内，工农革命军先后攻克茶陵、遂川、宁冈三座县城，成立了三个县的工农兵政府，遂川的新（永新）遂（遂川）边陲特别区工农兵政府和永新的小江区工农兵政府等区、乡两级政权机关也相继成立。与此同时，恢复、重建了党的宁冈、永新、茶陵、遂川四个县委以及酃县特别区委和莲花特别支部，边界各级党的组织得到普遍恢复和发展。工农革命军在边界遂川等县进行了多次的打倒豪绅、广泛发动群众的游击暴动，揭开了土地革命的序幕。至此，以宁冈为中心的罗霄山脉中段工农武装割据的局面已经形成。它的割据范围，拥有宁冈全县，遂川县城、于田、草林、大坑、碧州、营盘圩、戴家埔、大汾、堆子前及北部的黄坳、上下烟、车坳、新遂边陲四个区的大部，永新西南部的龙源口、烟阁、九陇、三湾小江区等地，莲花南部的崇市、田南等地、酃县十都、水口等地以及茶陵东南部的湖口、马江、浣溪和县城等地，割据区域的面积达3650平方公里，人口为21.6万。

三月失败与根据地全盛时期的范围

1928年3月上旬，湖南省委由于受中央盲动主义错误

的影响，通过湘南特委派代表来到井冈山，指责边界“烧杀太少”、“行动太右”，否定工农革命军实行的各项正确政策。取消了以毛泽东为书记的前敌委员会，并将工农革命军调离边界，去策应湘南暴动，结果导致边界被敌占领一个多月的三月失败。井冈山根据地在三月失败期间，平原地区一度被敌占领，只有遂川井冈山山区的大小五井、茨坪、行州、白银湖、荆竹山和宁冈的茅坪、桃寮、新城一带及永新的九陇山一带小块地方在工农群众手中。

1928年4月底，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的部分队伍及湘南农军转移到井冈山，同毛泽东部在宁冈砦市胜利会师。5月4日成立了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随后改成红四军），继续开展湘赣边界工农武装割据工作。从4月到7月，红四军先后取得五斗江、草市坳、龙源口战斗的胜利；6月23日，第三次占领永新县城后，粉碎了湘赣敌军对井冈山根据地的第一次“会剿”，从而使割据地区一天一天扩大、土地革命一天一天深入，民众政权的组织一天一天推广，红军和赤卫队一天一天壮大。根据地内党、政、军及各种群众组织的建设也得到很大的发展。这时，井冈山根据地的割据区域拥有宁冈、永新、莲花三个全县，吉安的宣传化、永安两区、安福的彭坊、观形、官田等地，遂川的七岭、滁洲、营盘圩、戴家埔、大汾、堆子前及北部的黄坳、车坳、上下烟、新遂边陲等四个区，酃县东南部的青石岗、大院、中村三个区，茶陵的浣溪、马江等地，红色割据区域的面积达到7220平方公里，人口50多万，井冈山根据地进入了全盛时期。

在全盛时期，割据区域内还建立了两个巩固的军事根据地。第一个是宁冈、酃县、遂川、永新四县之交的以大小五井、茨坪为中心的井冈山军事根据地，方圆550华里，面积为3180平方公里，有两万人口。并在根据地内的五井、茨坪、行州、罗浮等地面积为400平方公里约2000人口的中心区域的四周筑有黄洋界、八面山、双马石、朱砂冲、桐木岭五个坚固的哨口工事。第二个是宁冈、永新、莲花、茶陵四县交界的九陇山军事根据地。面积为900平方公里，约3000人口。它是四县地方武装的根据地。

八月失败与根据地恢复、巩固时期的范围

1928年7月，湘赣两省敌军第二次“会剿”井冈山时，湖南省委派杜修经、杨开明到井冈山贯彻其错误主张，并利用红四军二十九团欲回湘南宜章家乡的情绪，将红军大队（二十八、二十九团）强行拉往湘南，结果导致边界斗争的八月失败，割据区域内各县县城及大部平原地区被敌占领。这时，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所辖范围只剩边界各县的山区，如宁冈的西北两区，永新北乡的天龙山区、西乡的小西江区、南乡的万年山区，莲花的上西区，遂川的井冈山山区，酃县的青石岗和大院区，总面积缩小为2400平方公里，人口减少到76000人。

9月上旬，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军大队从湘南回师井冈山。在根据地军民的密切配合下，红四军先后于9月、10月、11月三战三捷，攻克遂川、宁冈和永新县，收复宁冈全县，并收复了其他各县的大部分失地。12月中旬，彭德

怀、滕代远率红五军在宁冈新城与红四军会合，加强了边界割据的武装力量。到1929年初，井冈山根据地进入巩固发展时期，这个时期的割据范围是宁冈全县，遂川的黄坳、车坳、上下烟、新遂边陲四个区，酃县的青石岗、大院两区，永新的九陇山区，茶陵与宁冈毗邻的大亚山区，以上这些区域连成一个狭长的整块。此外，莲花的上西区，永新的天龙山区，万年山区，也都是红色割据区域，但和整块区域不甚连属，全部割据区域的面积是4200平方公里，共有14万人口。

在更大的区域内坚持井冈山的斗争

1929年1月，湘赣两省敌军调集18个团的兵力，对井冈山根据地实行第三次“会剿”。为了打破敌人的“会剿”计划，红四军主力出击赣南，红五军会同红四军三十二团及边界地方武装留守井冈山，采用“围魏救赵”的方针来粉碎敌人的这次“会剿”。但在实战的过程中，因敌我力量过于悬殊，根据地军民虽尽力奋战，终未能粉碎敌军的进犯，红四军主力也未能回援。1月底，红五军被迫突出重围，第三次反“会剿”失败，井冈山根据地又一度被敌占领。

不久，湖南政局发生变化，各省军阀又重新混战。加上根据地军民不断对敌军进行日夜的骚扰、袭击，迫使各路“会剿”军纷纷撤退。湘赣边界特委将留守边界的红四军王佐部和红五军李灿部及各县赤卫大队，组建成红军独立第一团，向遂川、酃县、宁冈、永新、茶陵等县游击，收复了部分失地。这时，永新的小江区、酃梅、天龙山区、

缓元等地，宁冈的三、九两堡和小亚山区，遂川井冈山山区的大小五井、茨坪等地都恢复了公开的苏维埃政权，莲花县也恢复了红色割据区域，边界各县都程度不同的建立了秘密的苏维埃政权。因此，被敌一度占领的失地又逐步得到了恢复。

5月初，红五军重返井冈山，并带来了红四军前委给边界特委的指示信。5月10日，特委在宁冈古城召开第四次执委扩大会议，决定采取统一指挥，分散游击的政策，以永新、茶陵、宁冈、莲花作为主要活动的县份，向四周发展。并确定四个游击区域：以永新的西北特区为中心的永新、安福、吉安三县为一游击区；以莲花的九都为中心的莲花、攸县、万载、萍乡四县为一游击区；以宁冈砦市到大陇为中心的宁冈、茶陵、酃县、桂东四县为一游击区；以遂川的井冈山山区为中心的遂川、万安、泰和三县为一游击区。

根据井冈山根据地的斗争形势的发展，9月25日，中央重新规定边界特委所管辖的县份为永新、莲花、安福、酃县、攸县、宁岗六县，这时边界特委所管辖的区域虽然基本上仍是前期所辖的范围，但由于改变了工作方式和采取了新的斗争手段，使根据地的割据区域和游击区域波浪式地不断向四周扩展。10月30日，永新、宁冈、莲花三县的地方革命武装一举攻克永新县城，从此，特委及永新县委、县苏维埃政府迁到永新县城。到1929年底，井冈山根据地的公开割据区域和游击区域，已由永新、茶陵、宁冈、莲花四县逐步推进到吉安、安福、万载、萍乡、攸县、桂

东、遂川、万安、泰和等14个县，根据地的人口为241.2万，面积为26930平方公里。使整个割据区域与游击区域和赣南、赣西南两特委所管辖的县份相衔接，并与湘鄂赣根据地相联系，同赣南闽西根据地相呼应，出现了湘赣边界斗争的新局面。

井冈山根据地再次陷入敌手

1930年2月24日，因受当时中央一些过“左”政策的影响，袁文才、王佐两同志在永新县城被错杀。

袁、王被杀之后，其部队除一部分被编入宁冈游击队外，有的脱离革命队伍返回乡里，有的则反水投降了敌军。从此以后，作为主力红军之重要军事根据地的井冈山方圆500余里，全部沦为敌手。后来，我红军曾多次力图恢复这个根据地，但几次打到黄洋界山脚下都未能上山。1933年，肖克率领湘赣红军十七师，攻打到宁冈的大陇。敌军上下夹击，部队从大陇退到葛田，遭到突然袭击，损失惨重而被迫撤离，直到1949年10月，井冈山才得到最后彻底解放。

延安中国女子大学述略

曾 瑞 炎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创办了中国女子大学（以下简称女大）。在两年零两个月的时间里，女大培养了上千名妇女干部，为中国革命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女大在抗日救国的高潮中诞生

抗战以来，许多爱国青年辞别父母，千里跋涉，突破日寇和国民党顽固派的封锁，纷纷奔向延安。这些人当中，大部分是青年学生，也有工人、公务人员和归国参加抗日救国工作的华侨青年，其中有一部分是女青年。

中国共产党十分重视中国妇女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1939年“三八”妇女节，中共中央通过了开展全国妇女运动的决议。为了培养妇女干部，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在延安创办中国女子大学。当时的延安，财政经济十分困难。为了支持女大的创办，毛泽东、董必武和邓颖超从他们参政员的薪水中捐款资助女大。周恩来也把大批图书捐赠女大。洛甫、王稼祥、刘少奇、陈云、邓发等中央领导人和博古、林伯渠等都积极帮助女大的成立。朱德、彭

德怀、叶挺、项英听到创办女大的消息，都非常高兴，表示愿意给以各方面的帮助。邓小平答应给女大一批马匹，张鼎丞答应把战利品捐赠给女大一部分，叶剑英、李克农都热心为女大募捐。延安及全边区的党、政、军、民、学各机关各团体给予女大极大支援，帮助解决教学、设备等方面的困难。尤其是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中央党校、中央妇委、抗大、边区党委、边区政府、市政府、马列学院、后方留守处等，给了女大很大的帮助。鲁艺的冼星海及音乐系、美术系的同志都给女大以各方面的关心和支持。女大还得到全国各党派各团体的关心和支援，很多朋友写信来殷殷垂询女大的情形，国内外同胞不断对女大捐款。

在中共中央领导和国内外同胞的关怀和支持下，女大于1939年7月20日下午，在中央大礼堂举行了开学典礼。

参加大会的除女大教职员、学生外，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延安的全体同志，有党、政、军各首长及各机关代表，有由前方回来的八路军、新四军代表，还有印度援华医疗队队长安德华。当毛泽东、周恩来、洛甫等走上主席台时，全场响起了经久不息的热烈掌声。

王明作为女大的校长就女大的创办宗旨、教育方针、现状以及将来，作了报告。毛泽东在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他指出：女大的成立，在政治上有着非常重大的意义。它不仅要培养大批有理论武装的妇女干部，而且要培养大批做实际工作的妇女运动的干部，准备到前线去，到农村、工厂中去，组织2.25亿妇女来参加抗战。假如中国没有占半数的妇女的觉醒，中国抗战是不会胜利的。妇

女在抗战中有非常重大的作用：教育子女，鼓励丈夫，教育群众，均须要通过妇女。当他以“全国妇女起来之日，就是中国革命胜利之时”结束讲话时，全场报之以热烈的掌声，高呼“女大万岁！”（延安《新中华报》1939年7月25日报导）周恩来在讲话中着重指出：自从“九一八”以来，广大妇女参加了救亡运动，直到如今。抗战的洪流，更是冲破了封建的男女关系的壁垒。今天的中国妇女，在抗战中起了积极的作用，如妇女界领袖宋庆龄、何香凝等女士的热心救亡工作；宋美龄、李德全等女士的对于抢救难童和保育工作均有极大的贡献。中国妇女热烈参加前线工作，如胡兰畦、丁玲等所组织的战地服务队，在前线艰苦奋斗，获得全国人民的称颂。浙江的妇女营直接参加战斗，袭击敌人，有了光荣的战绩。这些都是在抗战洪炉中锻炼出来的新女性，因此，妇女地位也大大提高。当着全国妇女起来，风起云涌之际，希望女大赶快培养造就大批的女干部，到全国各地去领导广大的妇女运动。

大会结束后，举行宴会和晚会。晚会演出了舞蹈、歌唱、口技、大鼓、秦腔、京戏、安徽调、广东戏等二十多个十分精采的节目，盛况空前，气氛热烈，正如《新中华报》报导时所说的那样：确为延安空前之奇观。

女大学生的学习和生产

女大校址，在延安北门外一带的土窑洞里，与中央党校一河之隔。校长原为王明（兼），后来由李富春担任，副校长柯庆施、林莎，政治部主任孟庆树，教务处主任张琴

秋，总务处长吴朝祥。

女大初创时，有学生近500人。全校共8个班，其中普通班6个，高级研究班和特别班各1个。普通班中，一、二班是妇训班，专门培养妇运工作的干部；三、四班是抗大的女生队归并过来的，曾受过一个时期的军事训练；五、六班是普通班。这六个班在女大开学时，统称为普通班。高级研究班培养较高理论的干部，特别班主要培养有妇运经验的工农妇女干部。

女大6月初招生，6月中旬开始上课。女大学生成份：知识分子占80%以上，工人占10%，农民占6%，其它4%；文化程度方面：大学程度的占10%，中学程度的占70%，其它为特别班的程度（即小学程度或略识几字）；学生籍贯：来自全国21个省，以河南、四川、江苏、湖北等省为最多，广西、云南、贵州等省较少，另外还有从海外来延的华侨青年；学生年龄：最大的41岁（1人），最小的14岁（2人），大多数在18岁—22岁之间。

根据毛泽东关于“我们要培养几千几百个妇女英雄，几百几千个妇女运动的职业者和博士”（郁文：《革命女战士的熔炉——延安中国女子大学》，《新华日报》1939年8月30日）的思想，女大制订了“以养成具有革命理论基础、革命工作方法、妇女运动专长和相当职业技能等抗战建国知识的妇女干部为目的”的教育方针。女大校歌歌词中写道：“我们要深入农村工厂，我们要英勇的走上战场，一个个锻炼得如铁似钢，争取民族、社会和妇女的解放。”女大的教育方法是理论与实践的统一，集体学习与个人专修并

重。女大的校训是：“紧张的学习，艰苦的生活，高尚的道德，互助的作风。”

女大开设了必修课和选修课两种。必修课包括基本理论和中国共产党基本问题，其中，普通班有政治经济学、中国革命问题、中共党史、社会发展史、三民主义、妇女运动、生理卫生等；高级研究班有马列主义、党的建设，余同普通班；特别班有识字课、政治课、妇女工作等。选修课有军事教育、外国语（俄、英、日）和新闻学速记技术、会计、医药等职业教育。女大教员多半是各机关、各学校聘请来的，专职教员较少。如昔日创造社名将李初梨，中央统战部副部长柯庆施，刚从苏联归来的艺术家、鲁艺副院长赵毅敏、著名女作家丁玲、中国音乐家冼星海、著名医生何穆等均分任各科教学。中共中央领导同志差不多都到女大作过报告，毛泽东、周恩来、邓颖超、博古等还亲自给女大学生讲授中共党史课。女大创办一年来，关于政治问题时事报告，就有50余次。

女大党的组织及政治工作，基本与延安其他学校相同，其主要任务，是保证和帮助学习任务的完成和加紧思想上生活上的锻炼。有一不同之点，就是聘请了有斗争经验的老同志担任各班的政治指导员。

在一般情况下，女大学生是半天学习半天生产。每天清晨4点半钟，学生们排队在校门外做早操，到延河边洗漱，然后三三两两在水边石头上看书。早饭后学生开始上课。课堂修在深山沟里，三面泥墙，一张房顶，十分简陋、朴素，主要是预备下雨时用的，天气晴朗时就把草地当作

讲堂。女大还与边区保育分会商妥，在女大成立了一个托儿所，专门收容女大教职学员的儿女。学生经常参加农业生产、修路和背柴等各项劳动。有时为了突击锄草或帮助秋收，学校就停课集中时间劳动。1939年8月，女大学生到离校13里远的高山上锄草。4天之内，锄完300亩地。有些同志惊讶地说：“真行啊，这些女同志！”同年10月，女大举行秋收动员大会，成立了生产委员会，组织全校师生完成了收割500亩庄稼的任务。1940年，女大为了顾及女同志生理上的特殊性，决定女大的生产运动向着以下几个方面发展：（一）农业方面，种菜、植树、喂猪、牧羊等；（二）商业方面，扩大原有合作社的用品部和食品部，并自制豆腐、豆浆等；（三）工业方面，设立手工业工厂，及编织羊毛物品，制造一般的丸药等。在年初，女大成立了手工业工厂。该厂有制衣部（又称缝纫车间）和制鞋部（又称制鞋车间）。制衣部里有缝衣机八台，并有十几位工人负责指导学生使用机器和裁剪。全校学生以班为单位，轮流参加生产，一个星期换一次（一天工作8小时）。生产期内除选修课外，一律暂时停课。每班两个多月可轮到一次，每班全年总计生产一个半月。女大的手工业工厂，除了满足本校师生需要外，还与边区财经部订了合同，从1940年2月到4月，缝制了近万套单衣，可得纯利4000元。制鞋部每月可制鞋300双。

1940年3月，延安各界举行纪念“三八”妇女节大会和庆祝活动。在中央妇委举办的妇女生活展览会上，十几幅女大生活的速写像，将女大学生快乐的生活描绘尽至。在

中央妇委表彰的 386 名模范妇女及模范妇孺工作者中，女大就占有 102 人（模范妇女 95 人，模范妇孺工作者 7 人），约占表彰总人数的 1/3。1941 年 3 月，延安“三八”筹委会主办的“三八”展览会在青年俱乐部开幕。展览会“妇女生产成绩”部分，女大学生的各种产品特别引人注目。

1940 年 9 月，女大第一期一、二、三班学生毕业了。他们通过一年多时间的学习，各方面的进步很大。特别班、陕甘班中的一些学生，刚进校时不识字，到这时已经能做笔记能写信了。朱德一回到延安就去参观女大。在欢送会上发表了演说，并与女大学生一起参加歌咏比赛和排球比赛。他对在校和毕业的学生提出以下希望：第一，希望毕业学生到华北去工作，华北 1000 万妇女在等待着她们；第二，学习各种职业技能，农业方面的、工业方面的都要学习，这样不但能领导和组织广大妇女群众，而且还能使劳苦妇女在她们的领导下参加各种生产。

两年多来，女大先后毕业 12 个班，培养了 1000 余名妇女干部。1941 年 8 月，女大与陕北公学、泽东青年学校合并成为延安大学，吴玉章为校长，赵毅敏为副校长，校址仍设在女大原址。

女大学生的社会活动

女大十分重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如学生选修新闻学，学校除聘请《新中华报》编辑部的同志来讲授新闻学一般理论外，还组织学生前去《新中华报》社实习编辑，去印刷厂参观排板、拼板等工作，使理论与实践统一起来。

女大定期组织参观团、慰劳团、征粮工作团等分赴各地开展各方面的工作。1939年9月1日，延安各学校放秋假15天。女大除了紧张的劳动外，还由各班推选5个人组成参观团，到高等法院和保育院参观。女大慰劳团携带着慰问品，分赴八路军模范军医院和边区医院慰问伤病战士。1940年11月日本工农学校在延安成立，该校日本学员喜欢棒球运动，女大学生闻讯后，把她们唯一的一副棒球借给了这所学校。

女大中的回民师生与抗大、中央党校、陕北公学、马列学院等校回民同志一起，于1940年2月26日，在延安北门外举行“延安回民救国会”成立大会，被称之为“边区少数民族建立自己组织的第一盛举”。当成吉思汗灵柩途径延安时，女大师生同延安各界一起，在北门外参加了边区政府主持举行的隆重的迎灵活动，并且参加了“蒙古文化陈列馆”和“成吉思汗纪念堂”落成典礼大会。

1939年底以来，国内人民开展了宪政运动，宪政问题一时成为全国人民注目的事情。在延安，1939年11月，毛泽东、吴玉章等发起成立延安各界宪政促进会。次年2月20日举行成立大会，吴玉章任理事长，毛泽东在会上发表了重要演说。1月7日，延安妇女各界代表90余人，在女大召开延安妇女界宪政促进会发起人大会。女大负责人林莎、张琴秋等和学生代表多人参加大会。大会由女大负责人担任主席并报告开会的意义。通过了简章和“告妇女同胞书”，还成立了大会筹备会秘书处。同月17日下午，延安妇女界宪政促进会在延安举行成立大会，林伯渠、邓发、

等出席了会议，延安城郊妇女踊跃参加。女大几百名学生把大会分配给她们的座位让给了那些扶老携幼的妇女，并向妇女们宣传宪政运动的意义。林伯渠、吴玉章等在大会发言，指出宪政运动的意义和妇女同胞应起的作用，女大及各界妇女代表在大会上都作了发言。大会选出了名誉理事和理事会，其中，林莎、张琴秋、吴朝祥等女大负责人，分别当选为该会名誉理事和理事。

1940年1月5日下午，从新疆归来的八路军战士300余人（即原西路军进入新疆的一部分），乘车抵达延安。林伯渠、王若飞等，以及女大、抗大等各校学生和各界群众2000多人前往南门外列队欢迎。8日下午，八路军总政治部在中央大礼堂召开欢迎大会，毛泽东、洛甫、王稼祥、陈云、邓发等中央领导人到会并分别发表了讲话。在晚会上，烽火剧团和女大学生表演了歌咏节目。

1940年8月到12月，八路军百团大战的胜利捷报不断传到延安。9月14日，女大与边区妇女救国联合会、延安妇女界宪政促进会联名给朱德、彭德怀和八路军参加百团大战的全体将士发去热情洋溢的慰问信。八路军冀热察挺进军团政治处主任蒲云照，在北平西郊的韩村战斗中壮烈殉国，年仅21岁。10月6日，延安青联在女大礼堂召开蒲云照追悼大会。抗大、女大、青联等各学校、机关和部队代表500余人参加大会。抗大总校政治部副主任胡耀邦、青联办事处韩天石先后对蒲云照生前为革命事业艰苦奋斗不屈不挠的精神，作了详细的介绍和赞扬。中央青委副书记冯文彬号召全体青年学习蒲云照的革命精神，并提出纪念蒲

云照的具体计划。

女大师生对香港报界工人同胞的反汪斗争给予了政治上的支持和经济上的援助。1939年“八一三”纪念日，香港《南华日报》、《天演日报》和《自由日报》三个报社的工人同胞反对汪派汉奸报纸的出版，毅然的罢工离职，得到全国人民和海外侨胞的热烈支持和援助。毛泽东等中共七参政员捐款，资助香港罢工同胞。陕甘宁边区总工会发起五分钱募捐运动，女大教职员、学生从他们微薄的津贴中，慷慨解囊援助香港罢工同胞。女大在给香港三报罢工同胞的慰问信中，热情地称赞他们英勇不屈的革命斗争精神，表示誓作他们的后盾。慰问信中说：我们一方面大声疾呼，号召全中国妇女起来扩大反汪逆反汉奸运动，坚持抗战到底，另一方面我们竭尽微薄，援助你们嗷嗷待哺的父母妻室儿女。

女大在国内外产生的革命影响

延安《新中华报》经常以重要的版面和大量的篇幅，刊登有关女大学习、劳动和社会活动的文章。重庆《新华日报》，仅在1939年八九月，就发表了《革命女战士的熔炉——延安中国女子大学》、《中国女子大学》等专题报道。中国人民的好朋友斯诺，拍摄了“女子大学的露天课堂”、“女子大学前的女哨兵”等珍贵历史照片。他说：“延安教育机构中最新的一个部门是女子大学，这是一座名副其实的‘亚马孙大学’（亚马孙是希腊神话中的女战士——译注）。”“在陕北人民的生活中，办起一座女子学校，这简直无异

于发生了一次地震。”女大也引起国民党的注意，国民党教育部长陈立夫密函国民党陕西省党部书记长郭紫峻，要他通过各种渠道，“探明其训练内容、学生籍贯、来源出身、将来工作企图及分布计划”（《中国现代政治史资料汇编》第3辑第88册）。为了同中共争夺妇女运动的领导权，在女大创办一周年前后，三青团中央决定成立妇女部，国民政府拟办妇女师范学院，国民党五届七中全会也提出要成立妇女部。

1940年5月31日，著名爱国民主人士、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简称南侨总会）主席陈嘉庚等人到延安进行了为时八天的参观访问。陈嘉庚到延安后的第二天就参观女大。朱德和康克清在女大亲自迎接陈嘉庚，女大中20多名南洋华侨青年参加了欢迎会。康克清介绍了创办女大的目的和已经取得的成绩。陈嘉庚在朱德、康克清的陪同下，观看了女大学生的生活、学习情况，以及她们居住的窑洞和露天上上课的情形。到女大手工业工厂参观了缝纫、制鞋车间。边看边提问题，对女大艰苦创校精神感受颇深。陈嘉庚对延安一地就办起那么多的学校，如此重视培养抗战人才，如此重视华侨学生尤感兴奋。他返回南洋后，向侨胞介绍了女大和整个延安的情况，并说：“余此次劳军，经延安所见，深感中国有希望了！”后来，在他所著《南侨回忆录》一书中，把参观女大的印象作了详尽的记载，在华侨社会中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女大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和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她们中有的同志殉国于抗日前线，有的同

志在解放战争中英勇牺牲。全国解放后，她们中有的同志担任了党和政府的各级领导工作，在各条战线上为党和人民努力工作。40多年过去了，当年女大的革命精神，在今天仍然闪耀着光辉，正如当年《新中华报》所指出的那样：女大是中国妇女的一盏明灯！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书名 = 中共党史资料 第二十三辑

作者 =

页数 = 1 0 0 0

S S 号 = 0

出版日期 =

封面
书名
版权
目录
正文